

炎黄春秋

第 **11** 期
2010年

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

上下互动：温总理谈话解读

舆论监督权与官员名誉权

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目 录

一家言

- 1 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 郑永年
9 上下互动：温总理谈话解读 余广人
14 市场经济呼唤政治改革 马庆钰

怀人篇

- 19 朱厚泽和他的“三宽” 吴 象
25 任锐：发孙炳文未竟之志
..... 任 均 口述 王克明 执笔

故纸堆

- 31 就右派问题审改结论致党支部信 李慎之

沉思录

- 34 舆论监督权与官员名誉权 郭道晖
36 重建知识分子的道统正当其时 朱 正

争鸣录

- 39 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萧功秦

求实篇

- 43 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谢承年
48 四渡赤水评价考 夏宇立

亲历记

- 55 周总理与1973年廖承志访日团 朱 良
59 我向中央告省委 梁文斌

访谈录

- 62 吴南生：特区应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
..... 张宝鏊 陈 枫
65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与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
..... 徐庆全

往事录

- 72 《芦荡火种》的幕后风云 陈徒手
79 “京剧革命”源头补遗 胡金兆

海外事

- 80 蒙古国政治转型记 思 源

编读窗

- 86 就国企问题答读者来信 何 伟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副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副 社 长：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徐庆全

社 长 助 理：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李 晨

副 总 经 理 兼 网 络 总 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吴 思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010—68525374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6.90元

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

● 郑永年

温家宝总理今年多次论述中国政治改革,这激起了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期望。在3月份的“两会”期间,温家宝就强调“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现代化事业就不会成功”。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时,温家宝再次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最近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的时候,温家宝再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且明说,执政党会毫不动摇地进行政治改革。

从政治改革论述的角度看,温家宝的几次讲话都继承了邓小平上个世纪80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权力高度集中导致领导人专制、滥用权力和腐败等等问题。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推进政治改革。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30年以后,温家宝重新多次强调邓小平所强调过的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在这30年期间,中国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变化,但的确说明了,30年之后,中国仍然被政治体制所困扰,政治体制仍然面临30年之前的老问题。

概括地说,在温家宝的讲话中,有四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以往改革的成果要用政治改革来保障。第二,目前所面临的改革困难要用政治改革来克服。第三,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温家宝非常强调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朱镕基任总理时也强调过,腐败会亡党亡国。这个危险很显然继续存在。第四,

更为重要的是,基本社会正义和公平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达成。温家宝强调,“社会公平比太阳还要光辉”。没有基本社会正义和公平,执政党就会面临执政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曾经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们不应当忘记,在这句话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标。现在很多人开始抱怨起邓小平来,这并不公平。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发动了改革,让中国杀出一条“血路”,完成了第一步。后一步,应当由现在的人们来完成。

一、中国改革的路径与绩效

中国的改革,选择的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的改革路径。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改革路径。

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自邓小平发动改革到江泽民主政期间(1978年到2002年),主体性改革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也有进行,但是属于辅助性的改革。从2002年十六大开



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讲话中强调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加强民主制度建设。

始,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目标的提出,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主体性改革。这期间,政治改革也是重要的,但仍然处于辅助性的地位。

经济改革经历了30年,已经确立了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开始于邓小平,但主要的任务是江泽民和朱镕基主政期间完成的。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

而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人们对国有和非国有、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争论很大。十五大正式提出“抓大放小”的战略和经济结构布局。“抓大”就是要学日本和韩国,建设大型企业集团;“放小”就是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私有化。“放小”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内部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不会得到很快的发展。“抓大”的理念也是对的,主要是要强化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能力,但没有能够有效实施下去。国有企业越做越大,但“走”不“出去”,调转头来进入国内市场,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竞争市场。这是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问题。

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在这个阶段,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前面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改革,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经济改革仍有空间,但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或者改善问题。总体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比较容易进行。

第二,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图为全会会场。

社会制度已经不适用,但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新的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实现。原有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是计划经济模式条件下的产物,尽管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已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通过社会改革重建这些体制是唯一的选择。

第三,是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寻找新的动力。这里主要表现为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最近的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特别是出口市场受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改变,可持续性是非常成问题的。

为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制度。如果看病、教育、住房等方面用不了多少钱,那就不需要多存款。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

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支撑。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能消费。由于缺乏社会制度的保障,中国许多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住房需要钱,因而必须把有限的钱存进银行,这就限制了消费。

建设消费社会除了可以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外,还可以带来其它方面的正面效果:一,有利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中国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差异过大,社会过度分化。这导致了少部分人的过度消费与大多数人的消费不足。如果要建立消费社会,首先就必须做到收入的相对公平。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努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二,消费社会的建设因此能够达成基本的社会公平,消除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三,鼓励经济通过创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得以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劳动者所得占GDP很小一部分。资本家或者企业主主要通过压低劳动者收入(还包括便宜的土地)来获利。要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就会给资方带来压力,造就创新的压力。如果没有任何压力,资方就没有动力来进行创新。四,可以减少外国压力和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一旦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出口的压力自然就减少,而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将会增强,就像当今的中国依赖西方社会一样。

第四,社会改革的第四个主要目标是为将来以选举民主的主体政治改革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从长远看,民主化不可避免。无论中国实现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基础。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

二、中国改革的现状与阻力

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目前进入了一个需要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

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或者说,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则反过来制约着改革和发展。

首先来看“无改革”。“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领导人或者社会不想改革。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局面。今天,方方面面的改革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无论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方向很明确,那就是市场经济。当时的改革力度也不小,尤其在90年代,政府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接轨。内部的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莫大的动力。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就是前面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红利”。

不过,近年来,经济改革方面已经举步维艰。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大公司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正在改变原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通过提高生产力和追求技术进步了。很明显,垄断型国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宪法和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无穷的实际政策的歧视,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平等性只

是一纸空文而已。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不容许,要么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融资,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家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从而到处盲目流动,大势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最近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情况,那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连同民间企业家流向了海外。因为全球化,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种趋势会加剧。

社会改革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本世纪初,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政府开始把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提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即成了前面所说的主体性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制度等方面都是政府要改革的。社会改革方面的政策话语早已经在台面上,包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不能说政府不作为,在所有这些方面,政府已经尽力。但是从社会的满意度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还是远远不够的。既得利益集团要么阻碍改革,要么改变改革的方向,要么挟持改革以图私利。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远远弥补不了经济发展对这些社会领域的破坏程度。

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改革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得权力资本直接主导了“社会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住房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国家不仅对投资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很可惜,在中国,这些领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国家代理人和投资者分享利益的暴富领域。首先,这些领域“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应付危机的“强制市场化”。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或者遇到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或者最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都是以牺牲这些社会领域来保GDP增长的。其次,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保GDP,不仅不阻止资本在社会领域到处乱闯(资本无限制地进入

社会领域),而且也加入这个行列,并经常成为主角。例如在住房领域,地方政府只有对扩张房地产市场有动力,而对于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显缺乏兴趣。最后,正如垄断央企在国企改革中坚如磐石的垄断地位,国家工作人员的福利体系或者“特权”体系也俨然成为社会领域“市场化”的推动力量。最有权势的阶层可以最大程度地享受市场化所带来的好处而不需要承受市场化之痛,他们理所当然推进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而对社会领域市场化的负面效应毫无感觉。当前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同时,社会领域已经过度市场化。虽然价格“双轨制”已然消失,但以行政垄断和福利特权为标志的另类“双轨制”,在社会、经济两个领域仍然并行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稳定”也很容易理解了。中国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解体也在加速。或者说,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的解体为代价的。社会解体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显著的表现是近来高涨的社会暴力,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暴力。暴力发生在社会和政府之间、社会和资本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这些角色之间的暴力已经充塞媒体。但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分散化的地方资本或者政府的暴力已经导致了社会个体化的暴力。中央政府政令和地方政府各个方面行为的冲突与脱节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和谐社会的同时,地方政府却在不断制造矛盾和冲突。当地方政府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要么导致地方权力的极权(土皇帝),要么就导致资本的极权。同时,以稳定为名义的社会控制,导致社会集体行为在很多场合变得不可能,社会个体就会诉诸个体暴力来对抗地方权力或者资本。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政府和资本的极度的不信任。政府部门生活在权力的城堡里面免受市场的冲击,资本有赖于自身财富或者“权力资本”,可以从容应付市场,但普通老百姓面对无情的市场力量则无可逃遁。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的不信任度加剧,社会的暴力程度也随之加剧。当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的时候,政府治理失效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无论政府做什么,都难以赢得社会的认同。当然,社会的不信任也是政府的政策失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

当社会暴力足以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已经开始逃离本土,用各种方式移民到被认为比较安全的社会。更令人担忧的是,当政府不能减少或者消解产生暴力的深层次问题的时候,只能强化暴力工具来强行控制暴力。这就很容易走上以暴制暴的道路。

中国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说明了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然而深化改革面临诸多困难。

困难之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他们在改革开放早期扮演过积极的改革作用,是克服老既得利益的主力。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既得利益集团现在已经挟持了改革议程。同时,他们更有效地追求着自己的私利。不过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挟持改革议程是因为执政党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执政党有没有利益集团化?这需要观察。不过,早有人(例如周瑞金先生)在呼吁“执政党领导集体要和既得利益切割”。的确,如果执政党的议程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挟持,那么改革就变得不可能,最终有悖于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更不用说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了。现实地说,任何国家都会面临既得利益问题,执政党也必然和既得利益有这样那样的关联。既得利益的存在也并不是说社会改革不可能了。

困难之二,是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是因为执政党一直是改革的主体。尽管改革如邓小平所言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执政党始终在引导和领导着改革。和其他政治体制相比较,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改革力量达到改革的目标。不能说执政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被弱化。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物质和组织动员能力已经大大强化,这可以从应付各种危机和举国体制下的政治工程的有效性方面看出。在世人的眼中,中国的体制是最具有动员能力的。如果动员能力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集体共识的缺失。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

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这种微弱的声音也经常导致社会上一些人对“这种声音是否代表中央”的怀疑。

三、中国改革的策略与未来

现状如此,应当怎么办?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有了危机才会有进步。现在面临很大的危机,这是进步的动力。根据我的研究,深化改革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在政治改革方面,要重新确立共产党的改革主体地位。党现在光行使统治权,而不是领导权。尽管因为财力的增加和各种技术的提高,统治权在强化,但领导权在急速衰落。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这需要执政党提高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

领导权的微弱和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选举民主。选举民主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是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要确立改革主体地位,其它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得到深化。现在领导主体的弱化往往不是因为来自社会的阻力,而是来自党内本身的阻力。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强调过的。例如党政关系。经过多年的改革,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

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凉”。这是执政党领导权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

第二,在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要从中央—地方改革寻找新动力。这几乎是中国改革的定律。中央集权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运作过程中权力会不断往上集中,而一旦高度集中,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被扼杀。

邓小平时代经历了两次大的分权运动。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早期,确切地说是在80年代。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导向,理想地说就是要把经济权力从政府分权到企业。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要实现还是不能忽视地方的作用。分权就成为当时政府的改革策略。正是四川和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找到了突破口。分权也是城市和工业改革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像“分灶吃饭”和“经济特区”等分权政策,很难想象城市改革的成功。

邓小平的第二次并且是更大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发生在其“南巡”讲后之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因为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和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出现了极大的困难,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动力似乎消失了。而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又表明政治改革可能带来风险。怎么办?邓小平又从地方找到了动力。“南巡”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而“南巡”之后的大规模的分权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莫大的动力来进行改革和发展。当代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和转型正是从“南巡”之后才获得巨大动力的。

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也是从中央—地方关系入手的。最典型的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这两大改革直接影响到中央—地方关系。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时期。

这里要特别强调改革1994年体制。1994年体制已经实行了很多年,现在有必要进行再改革。实行分税制后,财力迅速向中央政府集中。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但依赖的方向改变了,地方依赖于中央,而此前中

央财政高度依赖地方。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终于首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收税机构(国税局)。1994年税制的两个最主要的理由,一是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二次收入分配能力,即国家有更多的能力来改变区域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

经济集权的确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加。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所设定的目标,即减少社会收入差异,实现基本社会正义,并没有实现。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能力飞速增加,但收入差异也不断加速扩大。财政收入和基尼系数是同时上升的,并且上升得很快。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很难解释这种情形。中国很多学者假设国家的二次分配能够达到社会公平,因此国家能力越高越好。但所谓的“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之间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关联,而负面关系是显然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在分权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大多实行藏富于民、于地方的做法。但随着1994年分税制的实行,这种策略失去效用。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财政大幅度向中央倾斜,中国在过去很多年里越来越显现出“中央富、地方穷”、“国富民穷”的局面。中央向地方要钱,地方又层层向下级政府要钱。财富很快向中央政府集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保障了财富流向中央,很简单,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是由上一级政府任命的。

而“中央富、地方穷”的局面必然导致“国富民穷”。地方政府需要生存,需要发展,因此就要向“民”和社会要钱。先是向农村农民收费。各地的农村收费土政策曾经成为农民集体抗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农业税取消之后,地方政府就转向了农民的土地。现在土地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的重中之重。这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其中之一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在抬高房地产价格方面,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是一致的。地方政府提高土地价格,而开发商自然把土地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另外一个向社会要钱的方法就是地方政府

和企业资方合作。为了让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多交利润给地方,地方就拼命向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工资。压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工工资在近年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最近所发生的劳工潮只不过是前面压低劳动者收入的反弹而已。

更为严重的是集权已经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失衡。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一方面,尽管集权,但中央的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下去,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来抵制中央的政策,这尤其表现在“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的领域。另一方面,地方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越来越依赖中央。布满北京的驻京办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现在要撤销驻京办,但可能会不得要领,因为驻京办完全是地方对中央的制度性依赖的结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发生的地方企业“央企化”或者地方求助于央企的情况更是说明了这种趋势。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央企化如果得不到纠正,从长远看,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恶果。随着中国向规制型国家转型,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要受国家的规制。而央企化必然会成为规制型国家的非常有效的阻力。央企化表明,政府的规制越来越具有“左手规制右手”的性质。甚至政治和行政上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避免。很多央企和地方政府是同一行政级别,甚至前者的级别要比后者高。鉴于行政级别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地方政权必然和央企在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

更应当指出的是,经济集权并不表明中央有权力。中央集权常常是权力的部门化,是部门集权。国务院同样没有权力。实际上,权力越是部门化,国务院越是没有权力。

种种现象表明需要对1994年体制进行改革。中央、地方的权力和责任要进行重新分配。最

明显的就是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方面的政策。现在中央具有政策制定权,但政策实施权在地方。更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去。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在财政集权之后,也应该相应地担负起事权。不管怎样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要把国有企业转变成为公共部门。人们一直把中国的国有部门比喻成西方的公共部门,这是一大错误。西方的公共部门属于公共,属于社会和人民。公共部门受公众的监督,各国议会都有一整套对公共部门的监督和制约的机制。而中国的国有部门属于国有部门的代理人。这里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私有化”问题。国有部门的产权理论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是国家的代理人拥有实际的产权,利用国家权力追求私利。国有部门要真正国有化、公共化。如果国有部门可以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来追求利益,而其财富并不为全体公民所分享,那么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对国有部门规定一个边界。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本来的意义在于政府在涉及国家整体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领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是,现在央企所从事的很多经济活动根本不具有战略重要性。国有企业的触角伸向了每一个可以获得利益的角落。凭借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受益于其政治和行政权力,国有企业可以所向披靡,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能够阻止国有企业这样做。因此,要给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规定一个边界。国有企业不仅要退出一些不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而且要把这些经济活动下放给地方,进行民营化。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这和国有企业受政府的保护是有关系的。要深化市场改革,这一步必须走。当然,如果国有企业全面扩张,导致其全面主导国民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在西方,当“看不见的手”主导一切,政府失去对其规制能力的时候,经济危机必然发生。中国则相反。当“看得见的手”或者国有部门主导一切,非国有部门或者市场对其失去制约的时候,经济危机必然发生。这是又一个铁的定律。

第四,要向社会分权。如果光从中央到地方

的分权,必然演变成地方专制和大量“土皇帝”的出现。这要求向社会分权来制约地方权力。应当容许和鼓励各个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媒体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才能扮演监督的角色。

第五,在地方层面,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选举式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选举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选举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上级政府权威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这方面可以从联邦制学些经验。

从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选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族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第六,建设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国家政治制度。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人大和政协是代表机构。“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没有关系,那么代表人民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

论。司法不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这并不难理解。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它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映了法律的真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那么政治就要休止,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

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第七,改革策略问题。上面所谈的这些方面都是改革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如何实施这些改革,改革的策略变得重要。前面已经强调过,要消除既得利益谈何容易?这就要从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再用新利益制衡既得利益。这是邓小平改革的成功策略,可以继续。不能光看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也要看到中国的改革力量壮大得很快的事实。但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如何聚合,这是一个改革策略的问题。而策略又是个共识的问题。前面说过,现在没有共识。“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仍然是继续改革的真谛。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上下互动：温总理谈话解读

● 余广人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最引国人关注的一件大事，是深圳特区建立 30 周年庆典。为什么关注？原因大概有两条：一、在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深圳特区的成立，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她的发展历程，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借 30 周年的庆典，梳理深圳发展的历史，可以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参照。二、改革走到今天，已经处于无共识状态，人们期待庆典仪式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会对改革向何处去，有一个解读。

庆典仪式隆重，人们的期待也没有落空。庆典仪式前；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庆典仪式上胡锦涛的讲话，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强调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是共同的。尤其是温家宝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更是引起人们的热议。为什么会热议？是因为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心是相通的，那就是，坚定不移的改革的目标，应该落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上。

温家宝的讲话，使人振奋，但也有人感到困惑。困惑的理由是：在中央领导人当中，只有温家宝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集体领导的共识，还是个人主张？按照国人对现行领导体制的理解，温家宝提出的政改，应是中共高层的共识。可是，又给人们留下“怎么看不到行动”的困惑。所以，关注的人们在热议讲话的同时，不免也在猜测讲话的背后，有人甚至猜测更多一些。

猜测毕竟是猜测，无论怎么猜测，都不如讲话者本人的解释来得实在。让人振奋的是，温家宝竟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正面回应了这种猜测。

温家宝接受 CNN 采访

2010 年 9 月 23 日，温家宝接受了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CNN）“扎卡里亚全球扫描”（FAREED ZAKARIA GPS）节目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访问，此节目于美国东部时间 2010 年 10 月 3 日播出，随即引起热烈的关注和议论。在接受采访时，温家宝回应人们的猜测，另外也谈到不少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这里，把媒体登载的访谈译文转引如下：

Zakaria(以下称为 Z):你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是稳定，而且充满活力的吗？你是否担心出现所谓的“二次探底”，导致美国经济再一次进入衰退？

温家宝(以下简称温):客观地说，我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正在复苏，尽管这个复苏的过程有些漫长，充满曲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现实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我希望美国经济能够快速恢复，因为美国经济实力毕竟是世界上最强盛的。

奥巴马总统最近的一些经济政策，包括美国出口倍增以及对基础设施大量投资的计划，是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尽管这些政策来得稍晚了一些，但总算及时。

这让我想起了我决定 4 万亿投资刺激中国经济的时候。当时人们对这一政策有着各式各样的看法，但是现在的经济态势显示我们一揽子刺激计划是有效的，成功的。

Z:你的经济刺激计划，从占 GDP 的百分比来说，是美国计划的 10 倍，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是否存在这样的担心，如此巨量的投资将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政府投资了这么多钱，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呢？现在投资计划减弱了，有没有什么影响？政府的钱会不会不够？

温:从你的问题来看，我认为你并没有对我们的刺激计划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的经济刺

刺激计划有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 大规模的公共投资、结构性的减税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2. 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3. 科技创新以及发展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4. 改进社会保障体系。整个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并不是都来自于公共财政，政府只提供其中1.18万亿人民币，余下的会来自非公有市场以及金融市场中筹措。刺激计划的实行，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



温家宝总理接受 CNN“扎卡里亚全球扫描”节目主持人扎卡里亚的访谈

速发展。它帮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来快速发展的好势头，同时也让我们避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由于外部条件剧烈变化而产生大的波动。同时，经济刺激计划为将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对在你问题中提到的那些挑战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我从三个方面回答你：第一，中国确实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这也是我们提出要小心调整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管理通胀预期这一重要任务的原因。这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我对中国管理通胀预期确实存在担忧，这也是一直以来我着重妥善管理的方向，因为我认为腐败以及通货膨胀会对我国政权的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对中国通胀问题的看法。

第二，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地方政府会有一些财政金融上的风险。地方政府有融资工具，也有一定的债务。但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危机之后才存在的新问题，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已经存在。现在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渠道，累计了7.6万亿人民币的债务。地方一级的这些债务，仍然在我们可以管控的范围内。但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妥善地管理这些债务是很重要的，以免对公共财政和金融部门带来风险。预算赤字占中国GDP的比例为3%，而中国所有债务占GDP的比例是20%。也就是说，目前仍然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

第三方面，当前所有的投资必须要有利于我

们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不是阻碍。这一点关系到我们长期的发展前景，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Z:冒昧地问一句，你从金融危机中学习到了什么？你是否对美国宏观经济的管理失去了信心？一个中国朋友这样对我说：“我们就像课堂上的学生，听美国的教导，但是现在看看，可能这个老师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温：在金融危机面前，任何对国家，对全体人类有责任感的人都会从中学习。我学到最重要的一课是，在管理国家事务时，关注经济结构非常重要。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赢得了世界的赞誉。然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很早就表明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缺少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金融危机加强了我的这一观点。一方面，我们必须防止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仍然要强调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同时做好是很难的。

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内需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仍然处于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刺激国内需求可以巩固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机会，提高发展速度，稳定中国经济。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必须着眼长远，清楚地意识到在经济结构中的各种挑战。至于美国的经济，我始终认为它有牢固的基础，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科技和管理人才这两方面都有着强大的力量。200年来美国在经济发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其中有曲折往复，但是我相信，美国会克服各种困难，度过这一次金融危机，要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

Z:你曾经撰文纪念过你曾经的领导——胡耀邦。这篇文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其中你高度赞扬了他。回顾过去,你认为胡耀邦是一个杰出的中国领导人吗?

温:是的。我想我给他的历史做出了一个公允的评价。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第一,他大力推动了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这一讨论,他为中国解放思想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二,面对众多阻力,他毫不畏惧,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党政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第三,他采取行动,切实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Z:在你的演讲中,你提到,从经济上看,中国依然不是一个强大的创新型国家。有着如此多的言论自由限制以及互联网管制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创新型国家呢?难道不应该取消这些限制吗?

温:我认为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你并不了解中国。在中国,有4亿左右的互联网用户和8亿左右的移动电话用户。他们可以接入网络,表达他们的观点,包括批评意见。我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对政府工作的尖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我经常说,不但要让人们享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只有人民能够监督和批评,政府才会做得更好,公务员才会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当然,监督和批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国家才会有秩序,秩序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Z:温总理,说实话,我去中国的时候,发现很多我要上的网站都被屏蔽掉了,非常难以获得资讯,似乎任何挑战共产党政治地位的言论都是不允许的。比如胡耀邦,直到您写的文章出版,在《人民日报》上从未被提起。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限制——对互联网监控的这些设备,让你的人民很难真正有创造性,去做那些你想让他们做的事。

温:我相信,我和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有这样的信念,那就是中国会有持续的进步,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是无法阻挡的。我希望你

能慢慢看到中国正在持续的进步。

Z:在过去几周,你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演讲,在深圳的讲话真的把我镇住了,你说“不仅要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在我们上一次专访中你的观点。但是很多中国人说过去六七年间,经济体制倒是在不断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多少。那些听你的演讲的人,他们说“我喜欢温总理的讲话,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啊”,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温: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多年以前由邓小平提出并推动的,我想任何一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对这一点深入思考并付诸行动。上次见面之后我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更深入的思考,我的想法是,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应该要和取得政权的过程中不一样才对。最大的区别就是,政党的活动应该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政党的政策和主张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上升到宪法和法律的高度。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地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

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Z:货币问题最近又成了热点,让我这样提这个问题:在得到中国的保证后,人民币在过去两年只升值了1.8%。中国对人民币再多升值一些难道不感兴趣吗?

最近,中国通过压榨普通工人,对出口进行了隐形的补贴。这样就会有通胀的风险,造成你刚刚提到的缺乏平衡性。因此,人民币汇率要再提高难道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温:我想你的观点仍然是美国的观点,或者说,美国国会中一小撮人的观点。中美两国经济联系紧密,双边贸易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已经超过600亿美元,中国已经购买了超过9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没有人会相信中国的领导人没有紧跟美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一些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国会里面的一些人,对中国缺乏全面的了解。他们将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政治化,特别是两国贸易不平衡这一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

我感谢你给我这个专访的机会,因为你让我能够更进一步地解释实际的情况。有关汇率和中国贸易顺差,有三个要点往往是大家都不了解的:1. 中国并没有主动追求顺差。我们外贸的目标是在各国交易中维持平衡和可持续贸易,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支付科目中能够达到基本的平衡。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和行动的。在200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9.9%,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8%,2010年的上半年的数字是2.2%。2. 一个国家贸易顺差的增长和它的货币政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启动了改革汇率的进程,从那时算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了55个百分点,同时,主要经济体和中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幅度地贬值。中国对外贸易的急速提高也是在这一时段。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这么一段时间,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这一现象,是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第三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你恐怕也知道,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中国在加工贸易上有顺差,但在一般贸易上存在逆差。交易物品上中国有顺差,但是在交易服务上有逆差。中国在和美国以及欧盟的国际贸易中有顺差,但是在和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的交易中存在逆差。很多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在美国已经是不生产我想也不可能再重新生产了的——那些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即便美国人不从中国买这些产品,你们也会从印度、斯里兰卡或者孟买购买。这并不能解决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我回忆起你曾经举过有关iPad的例子。在美国一个iPad售价是299美元,但是加工iPad的中国工厂只能从中获得4美元的加工费。

还有一点可能你和国会中诸君都不太了解,在华的5万美国公司中,2万2千家是出口公司,制裁中国的出口公司无异于制裁美国的公司。

Z:上次我们谈话的时候,我问你当时你在读

什么书以及什么书比较有趣。那在过去几个月有没有什么事、有没有什么书让你印象深刻呢?

温:我的书架上经常摆着的是有关历史的书,因为我相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外的历史书我都很爱读。在我出差的时候,我一般会随身携带两本书,一本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另一本是《沉思录》。我并不是同意这两本书中的所有观点,但是我相信古人的理想和思考会为今人提供思考的食粮。现在有太多自夸自卖的回忆录,我并不喜欢读。我相信一个人应该留给世界的是真相——那些真实的东西,但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终将消散。

Z:最后一个问题,温总理,你的坦诚让我感动。你刚才提到你不管国内党内的阻碍有多大你都要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你对于腐败和通胀会动摇社会稳定的忧虑,以及对胡耀邦领导能力的赞扬,即使他是一个危险的“自由化”领袖。你相信中国即将上台的新一代领导人,会和你有共同的愿景吗?他们会不断努力深化你正在力推的事业吗?

温:你可能认为这是今天最难回答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这很容易。我从两点回答你有关未来的问题。1. 正如中国老话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对中国未来领导人超过他们的前任我深信不疑。2. 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谢谢你的专访!

Z:这是我的荣幸,谢谢你温总理。

上下互动才能形成改革共识

温家宝在这次访谈中,更加系统地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所指出的通胀和腐败可能影响中国稳定、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这两条,应该是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可是,如何将温家宝的诉求形成一个共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则让人颇费思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一文中认为,中国的政改滞后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中国不是没有改革的话语,而是改革者缺失改革的具体政策和实行政策的能力。由于中央改革权威

的弱化,中国社会已经犯上了一种“改革疲惫症”。谁都在谈改革的重要性,但结果是什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相信改革者的改革话语呢?第二,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改革力量达到改革的目标。如果动员能力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集体共识的缺失。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实际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早就开始怀疑党中央的权威。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这种微弱的声音也经常导致社会上一些人对“这种声音是否代表中央”的怀疑。第三,正如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政治改革的困局也说明了中国的既得利益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既得利益力量大得很,一旦改革触动它们的利益,它们可以阻止改革共识的形成,可以阻止改革共识转化成为有效

的政策,更可以阻止改革政策的执行。

郑永年呼唤中央威权,“执政党”“要重新确立自身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以形成改革共识,这自然是有道理的。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改革因此才能取得如今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这个角度来说,温家宝接受采访所谈,以及此前多次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回应的是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不需要特别呼唤,只要回应民间的诉求,威权自然而然就重新确立。改革需要共识,庙堂之高的共识需要,江湖之远的共识也更加不可忽视。而上下互动,使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共识一致起来,“改革疲惫症”才能治好,温家宝所呼唤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进行下去。

(责任编辑 洪振快)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09 第 2460324 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09 第 2460325 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服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 2010040348 号

市场经济呼唤政治改革

● 马庆钰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期间,我国在各相关领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探索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尤其在经济领域,对旧体制的改革所带来的增长速度堪称奇迹,获得了国内外不少赞誉。然而,在看到巨大进步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我国的改革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中国市场经济的现状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以保证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避免改革成果的“得而复失”,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我们有必要对我国改革已经形成的原则方法和正在追求的政府管理模式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反思,以便于对下一步的改革战略和重点作正确调整。

一、我国对经济与管理之关系模式的探索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在这两者之间的取舍和选择,经过长时期的利弊权衡和激烈碰撞之后,早已尘埃落定。在从 1992 年至今的多年努力后,没有人否认,无论在经济文化上,经济制度上,还是在经济体制和机制上,中国发展的巨型列车已经离开计划经济,基本走上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在这个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个相应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相应的创新,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

提出这个问题的假设是,一般认为,经济类型不同,所要求的包括政治和行政在内的管理类型也就相应不同。计划经济是国家权力主宰的资源配给过程,因而就可以有一套以人治为基础的集权管理制度;市场经济是一个由供求关系主宰的交易过程,因而就必须有一套民主法治的管理系统。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的管理经验,基

本可以证明这个假设的真实性。

例外的情形是,开放改革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实践所摸索出来的做法,使这个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受到了挑战。仅就经济增长而言,追求市场经济的中国,以一种富有特色的管理组合,用粗放和近乎原始的生产方式,利用人口红利的阶段性优势,在低起点基础上,取得了 30 年持续增长的不俗成绩:年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 9.6%,2007 年 GDP 超过德国排名世界第三,2010 年 GDP 肯定会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即便将 2009 年人类发展指数中国居第 92 位的世界排名(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9 年 10 月 5 日发布的《2009 年人类发展报告》)考虑在内,即便将 2009 年人均 GDP 中国位于世界第 100 位的排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考虑在内,即便将中国“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质量和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失衡与矛盾考虑在内,我们也应当承认,不仅纵向自比,新中国成立后的头 30 年与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在经济与社会进步上不可同日而语,就是横向互比,也很少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上能够与我国相提并论。

我们的魔法是什么,或者说我国在管理创新上的贡献是什么?早在 2004 年,就有国外高盛公司的一个顾问总结中国增长经验,并冠以“北京共识”的概念公开发布。随后被不少国内外人士怀着不同心态,广为传播和大加渲染。这个被吹捧热议的中国秘笈被总结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政府干预经济和国有垄断来推进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使不少国内外人士相信,在“计划经济加集权管理”,和“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两个公认的组合模式之外,还有一个嫁接和折中方式,这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的第三种模式。这是中国的管理探索和

贡献。

二、对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模式的反思

面对国内外的吹捧和称颂,我认为有关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尤其是处在执政党和政府关键岗位上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最需要的是保持足够的理智和冷静。因为,一种经验模式一旦被固定下来,其对于我国发展前景的影响将是巨大和深远的。第一,它将成为带有根本性的管理价值导向;第二,它将成为经济与社会管理制度构建的标准形式;第三,它将成为下一步政府改革规划议程的依据;第四,它将成为今后中国市场经济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说到底,这个经验模式关系到未来的制度选择,决定着人民的生活质量。为此,就有必要对这个嫁接的模式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于让它更加完善和更具有积极、健康和进步的实践价值。

管理模式的实质,就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权力介入的方式和干预的程度。管理者无一例外地追求效率,所以往往倾向于在资源配置中施加权力影响。中国有着很长的计划经济实践和悠久的人治历史传统,因而在和市场打交道的时候,常常是拾遗补缺不足,而越俎代庖有余。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权本身的性质就成为决定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也就是说,相对于政府管理权来说,有没有民主法治的约束条件,其运行结果将大相径庭。

在成熟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中,市场经济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之上,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公共权力将不能随意插手市场的资源配置,即便是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政府强化监管、增加投资,甚至接管濒危企业的“救火”措施,也都严格控制民主程序之内进行,这就保证了政府权力的规范和政府相关政策的稳妥与科学。

相比之下,在一个民主法治不够完善的环境中,公共权力使用者出于“人性自私”的本能,很难保证不用手中的权力去干预市场过程,并通过干预来满足自身意愿偏好和获取自身的利益欲求。这个趋势的极端表现是,公共权力最终将市场改造为自己的附庸和工具,迫使市场经济扭曲

和最终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如果真到了如此地步,那么,对于平民百姓而言,一个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甚至要比一个传统落后的计划经济更糟糕,更可怕。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说中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与社会制度,那是违心之论;而将中国划入“权贵资本主义”之列,则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客观地说,在我国“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的现实当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这些现象可以概括为五个特征:一、权力垄断市场加剧贫富差距;二、权力干预市场谋求腐败交易;三、权力干扰市场制造市场混乱;四、权力代替市场阻碍政府职能转变;五、权力缺少约束随意占用公共资源。

比如国有企业垄断问题。因不当收入超过2亿元而被问罪的中石化董事长、部长级高级公务员陈同海的名言是“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在这个毫不掩饰的骄横傲慢后面,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垄断国家资源,从事特权经营,私自内部分利,谋求丰厚待遇的特殊利益群体。比如我国“7个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见《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11月25日何伟文章《“国进民退”五位》)

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如果说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说法不足为信的话,那么来自财政部的数据就应是权威的,它的近期统计显示,我国10%的家庭的财产占到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最低收入的家庭财产总额仅仅是全部居民财产的1.4%。(人民网北京2009年12月9日电)而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专家的调查统计研究,目前我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官方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官方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见王小鲁:《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总第31期,2007年7月)在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大约0.5的“高度不平等”程度。

又比如公权异变问题。官员队伍的廉洁从政正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腐败公务员的级别越

来越高,腐败的人数越来越众,腐败的手段越来越多,腐败案值越来越大,腐败者的道德压力和羞耻感越来越轻。2009年,因腐败而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就有深圳市长许宗衡、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米凤君、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国开行原副行长王益、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等等。根据透明国际2009年公布的腐败指数,中国在180个被统计国家中排在第79位。

除了直接以权谋私外,有的地方党政机关还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用公共权力为公务员群体谋求“集体福利”。2010年5月份媒体曝光山东省日照市根据党委常委会决定,在“可低头看湖,可抬头观海”的市区“绝版”地带动工修造3500多套住房专供市直机关公务员。此次住房福利等级为市级领导享受200平方米,处级150平方米,科级以下120平方米,价格比同地段商品房每平方米低30%~50%。此举被当地老百姓戏称为“国内地市级最牛”的低价官宅建设计划。(见《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9日报道)

又比如国家管理机关的运行成本问题。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2006年8月10日公布的一组数字:当年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款招待费是3700亿元,公务用车费3986亿元,公款出国考察费2400亿元,合计超过1万亿元。假定这当中有一半是必须的,那剩下的一半也已经占到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17%。如果再加上机关和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各类会议和培训支出,机关修造豪华楼堂馆所和更新办公设施的支出,以及部分离休高级公务员的特需支出,我国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要高达30%以上。而这个比例,在日本是2.4%,波兰是3.8%,英国4.1%,韩国5.0%,印度6.1%,法国6.5%,加拿大7.1%,俄罗斯8.2%,阿根廷8.7%,美国9.9%。(见拙著《中国行政改革前沿视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而在我国,政府自身的支出浩大与公共服务支出的缺斤短两已经形成鲜明对比。

再比如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由于管理权力自身的习惯,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长期处于只说不

练、转而不不变的状态。政府还经常跨过自己的职能边界,进入了市场职能的空间。2009年3月,河北省廊坊市一位领导的招商口号是:“房地产是好的投资项目,房地产商来投资,赚了是他们的,赔了是我们的”。(见《北京晚报》2009年12月16日张兴军文章《部分政府部门存在官僚主义习气》)而为此荒唐话语做的实践注解发生在杭州。最近该市政府部门出资设立消费奖,用真金白银奖励在杭州商场的购物者,已有人将他们的做法叫做“政府在市场当中自作多情”。

胡乱处理与市场关系的不仅是他们。2009年5月湖北省公安县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全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一年要完成23000条本地香烟消费任务,管理办公室每月检查完成进度;未完成用烟计划的单位,由财政部门直接扣减该单位公用经费;凡不抽本地卷烟的,发现一次扣减该单位公用经费1000元。(见CCTV《新闻1+1》2009年5月4日播出的节目《红头文件因何“走红”》)无独有偶,2009年11月,四川洪雅县也以政府文件的方式,要求机关干部必须在家中阳台上,人均栽种2棵三角梅,督查发现未栽种者,将受到通报。洪雅被群众戏称为“满城尽栽三角梅”。(见《华西都市报》2009年10月22日报道)

以上所举例子虽然挂一漏万,却已经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模式存在严重问题和重大风险。这就告诫我们,如果想避免中国掉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如果想保证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性,如果要向国内外证明“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中国就必须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努力,为“集权管理主体”戴上民主法治的“马笼头”。非此,中国式管理就无法与市场经济匹配和兼容。

三、政治改革是改革成果保护与未来持续发展的命脉

回顾既往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管理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改革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实际上,改革在中后期已经显露出后劲不足、进展缓慢的端倪。伴随经济改革发展,除了在行政领域反复进行一

些技术性的、浅表层的动作之外,缺乏足够的勇气和动力去寻求针对权力运行体制的深度改革突破。民间对这个现象的描述是:经济改革轰轰烈烈,行政改革凑凑合合,政治改革闪闪躲躲。因为得不到政治发展的支持和保护,导致行政改革推进效率大大降低和市场改革成果面临侵蚀变质的危险。

而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渐进改革原则”、“适度改革原则”以及“中国特色原则”等,在现实当中逐步演变为保守改革原则、有限改革原则、选择改革原则、主观偏好原则。包括许多学者在内的一些人津津乐道于中国的“边际改革”、“增量改革”、“经济优先改革”等经验,却对这些经验本身所培养出来的社会保守性和投机性失却察觉,对于这类实践所造就的“扭曲性体制”和“路径依赖”的危险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对于在此庇护下逐渐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没有引起足够警惕,对于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阻力和改革时机的逐渐丧失一直缺乏清醒的认识。

对此,中国所有赞成改革和奉行改革的人们,无论是领导者还是专家学者,都需要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还原改革原则的本来意义。所谓“渐进改革”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地不断向前推进的改革,而不是避难就易、避实就虚的停止改革甚至倒退改革;所谓“适度改革”是着力到位、恰到好处、恰到好处,而不是浅尝辄止、半生不熟的夹生饭改革;所谓“系统改革”是不留死角、全面照应的改革,而不是有扬有抑、有行有禁的选择性改革;所谓“中国特色改革”是主张普遍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改革,而不是强调“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一种传统情绪逻辑下的偏见改革。

时至今日,中国式管理的经验积累、成果积累,以及问题积累和矛盾积累,都共同期待着关键改革的出台。中国的改革,在按照改革者的设计走过了简单项目后,必然要进行复杂项目;在经过了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后,肯定要触及政治改革;在完成了对客体的改革后,接下来将轮回回到对改革者自身的改革。这是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应然轨迹。在这个决定可持续性的关键改革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集权管理主体”建立民主法治的约束制度与机制。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除了继续做好机构调整、职能转变、审批改革、干部问责、绩效评估、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已经展开的任务外,改革者还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着手针对自身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治的真正完善,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精神,切实将公共预算制度的建立,将地方自治新体制的建立,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将对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待遇的改革,将对党政领导结构关系模式的调整,尤其是针对各级主要政治和行政首长以及人民代表群体,循序渐进地建立以民选公决为基础的权力约束制度,纳入下一步中国改革的实践之中。这是“中国式管理”绝对不能缺少的改革必修课!

我国改革的可持续性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迫切需要来自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综合改革战略的支持。改革就如发射天宇的火箭,期望它飞得高、飞得远,就得要有源源不断的动能供给。如果说我国的经济改革是第一级火箭,而行政改革是第二级火箭的话,那么政治改革就好比第三级火箭。在过去的30年中,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已经带动中国飞入从未有过的高度,使中国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客观而论,不仅现有的改革不足以穷尽解决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所有矛盾,尤其是对公共权力使用者的规范与制约的问题,而且,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的成果也离不开来自民主法治的政治运行机制的保护。否则,已获得的改革成果就有可能遭受旧有政治与行政文化的蚕食,已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有可能被官商利益联盟所瓦解,已形成的正确改革与发展方向就有可能因为病态管理模式的裹挟而走形脱偏。有鉴于此,中国的改革领导者迫切需要审时度势,果断实行更加全面和富有勇气的自身改革战略,在我国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的能量和张力臻于极限的时候,及早点燃政治改革的第三级火箭,从而为中国发展的全面、健康和可持续性增加源源不绝的动能供给,争取在2020年前后,使我国能够有一个更加科学、民主、法治的政治与行政体制。我国既往30年经济改革成果的保护需要我们启动民主政治改革,我国未来发展的持久永续需要我们启动民主政治改革。诚如8月份

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时所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就没有梦想中的未来；“不改革，

就是死路一条”；只搞别的改革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最终还是死路一条。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我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	38.00	7.00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秦晖金雁	38.00	7.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颐	28.00	6.00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徐孔	29.80	6.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主编	148.00	12.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我与《第二次握手》	张杨	32.00	7.00
张闻天图册	张培森主编	260.00	10.00
张闻天在 1935 ~ 1938	张培森主编	17.00	6.00
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张培森著	20.00	6.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新三级	张琦主编	48.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	26.00	6.00
吴江文稿	俞可平主编	200.00	18.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	刘刚 李冬君	58.00	9.00
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正	26.00	7.00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	39.80	8.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道	29.00	7.00
人生的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邓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若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煌	21.00	5.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于光远	于光远	36.00	7.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张广友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锐	18.00	5.0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代购代邮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使用了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和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全面系统论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

《苏共亡党十年祭》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一场突破禁区与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身处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大讨论的亲历者，以第一手资料回顾 30 年前的讨论内幕。

《李锐反“左”文选》1957—1978 年的 20 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三野名将、四野名将》本书作者发掘了许多史料、揭秘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大胆还原高级将领的本色人生，并配以百余幅珍贵照片，展示了将军们的生命境遇。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作者为直言付出的代价是：二十一年右派，其中十年劳教、工资四去其三；十年返乡务农、工资全无。如此无悔，良心价值几何？读这本书，可以算出良心的底价。——吴思

《问史求真集》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北京市内乘车路线：公交车 13 路、21 路、32 路、65 路、68 路在三里河东站下车，西行 50 米路北，西华饭店院内。

联系电话：010-68532048, 68539058

朱厚泽和他的“三宽”

● 吴 象

2010年5月9日清晨，朱厚泽病逝于北京医院。厚泽享年八十，应称高寿。但在我们十来个谈得来的老头中，他是最年轻的，最壮实的，最活跃的，最多才多艺的，最有亲和力的，为什么说走就走了呢？我怆然茫然怅然木然者数日，痛感生命的脆弱与无奈。

一 多思考，少说话

1985年7月，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接到调令，晋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北京多好，中国人谁不向往？朱厚泽对此却忧虑重重，不大愿意。好朋友开玩笑说他“升官”，他自己却说是“跳火坑”。

厚泽对我说，从改革开放到他来京，中宣部部长换了五任。胡耀邦是一任，他那么大的气魄，平反了那么多冤假错案，相信会有办法创造新局面，但要调去当总书记，谁也挡不住。张平化是一任，他是井冈山时代硕果仅存的县委书记，当过多年省委书记，论资历、论水平，都是一流人选。但真理标准讨论，他就是“凡是派”，首先过不了关。王任重是又一任。他当过多年省委书记，后任中南局书记，是毛泽东器重的人才，还提出过“学习毛泽东，超越毛泽东”的口号，但始终超越不了，也跟不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步伐，为时不久也只好退下。第四任是邓力群。这个人后来写过一本书——《十二个春秋》，点名批判了60多个人，被称为“左王”。朱厚泽就是接他的班。他是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不当宣传部长还管着宣传部长。厚泽曾对我说，他那位顶头上司对交接工作非常认真，抓得很紧。这一阵是汇报会，过几天又是什么课题的准备，下一周又是审查影片，接着还有理论培训研究，总是把我安排在他的邻座，观察我的反应，最后总是首先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无论如何死不开口，只回答：刚刚来，先了解情况，学习学

习再说。连续多次，他无计可施，也不好定什么规矩要我“萧规曹随”。

过了一个多月，朱厚泽正式单独上班。部里不少工作人员习惯于“新官上任三把火”，以为朱厚泽一定要布置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要宣布一些新的规定。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见人谦和有礼，常主动点头打招呼，却没有什吩咐、什么要求，例行的工作会议也改成了座谈会，便于大家自由发言，极少向下发什么文件通知，对上面交下来的事则迅速认真处理。

二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朱厚泽就这样担任宣传部长，半年几乎无声无息，没有吭气。到1985年底连胡耀邦也有点沉不住气了，便找他去问，厚泽回答：“听到的反映是我这个人‘没有动静’，‘不吭不哈的是怎么回事呀？’”耀邦说：“那就逐步地放开一点嘛。”后来，又让胡启立、王兆国给他捎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交书记处讨论，讨论以后我们大家支持你。放开点干嘛！”

但他想，如果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整理成报告，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反而可能引起大的争论，对大局的稳定不利。但他又想老是鸦雀无声也不行，不如东说一点，西说一点，微微风，毛毛雨，慢慢来，努力学会“在议论纷纷中正确引导，在众说纷纭中择善而从。”

1986年3月8日，在音协饭厅里用聊天方式讲了一次，提到了“宽松”。

第二天，3月9日应邀参加出版家协会代表大会，原来不准备讲话，大家说不行，我们坐好了就是要听你讲话，实在推辞不了，只好又讲了一次，比前一天范围“宽”，涉及“宽容”、“宽厚”。

一个月后，《光明日报》开全国记者会，又把他请去，热烈鼓掌要求他讲话，结果又讲了一次，讲得比前两次更多了一点。杜导正用录音整理了

一个详细的记录稿给他,他改后就扣下了,连内部也不让发。

1986年7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邀请他参加,他才把“三宽”连在一起发表了正式讲话。他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20周年,‘文革’结束10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却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走向更加成熟。”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与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的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容、宽厚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原来想法不太一致的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著名的“三宽”讲话原文就是如此,普普通通,并不神秘。

第一次在音协那次讲话,后来《文艺报》竟登在头版,有些文艺家下乡也传达,多方面反应强烈,惊动了书记处的人。反应最强烈的是谁?万里。他非常赞成,有次书记处开会还指着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说:“你就说不出这些话来。”习仲勋他们都赞成,反对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次是全国性的会议,又是把“三宽”连在一起说,言

简意赅,通俗深刻。散会不久,“三宽”精神已传遍了神州大地。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三 “三宽”意味着什么?

1986年党中央准备在秋天召开六中全会,讨论制定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这是继农业方面五个1号文件、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又一个推进全面改革的战略措施。耀邦亲自主持起草工作,厚泽积极参与,不断思索如何围绕这个全局性问题做好宣传部的服务工作,主要是沟通上下,把下面的情况反映给中央,把中央起草过程中的意图传达给大家。当时国内形势平稳,但高层一些政策方针上的分歧也逐渐显露。有些人前一段搞“反精神污染”,因为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多数人的质疑,只好草草收场。他们又在酝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想把已经有所松动的思想垄断重新收紧。他们要的是“三紧”、“三严”,但不便明说。“三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三宽”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什么深远的意义?这似乎还有待探讨。厚泽逝世后,我想到几点粗浅看法,现提出供批评、商榷。

一、“三宽”不是一般的理念,而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确切、突出、全面、完整的体现。家庭联产承包创造了出人意料的奇迹,长期压在全国上下心头的温饱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亿万人民几年来亲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势不可挡。另一方面,僵化、半僵化思想势力还很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虽解除,“兴无灭资”口号还普遍存在,还有种种有形无形的束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冲突,不利于改革大局。中央的文件、决议是根本的战略性的工程,当然重要,但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做成的,更不是短期内可以贯彻见效的。而“三宽”只有三句话,好懂好记,提纲挈领,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关键。转型时期不同观点的矛盾是必然的普遍的客观存在,不承认不行,采取宽容态度,问题就解决了一半。第二,强调以人为本,用宽厚直接呼唤人们内心善良的感情,以宽厚的善意化解误会、化解恩怨、化解敌意,问题的另一半也就更好解决了。第三,强调党要改造、提高自己,创造宽松的

环境、氛围,发扬民主才能领导好改革开放大业,也就是说,不能以权压人、以势欺人,而必须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这些不都是很普通、很简单的么?但三方面紧密联系,互相支撑,互相促进,成为体系,确实表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伟大精神,这也可成为改革开放内在动力不竭的源泉。

二、“三宽”是“双百”方针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厚泽讲话第一句就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20周年,“文革”结束10周年。强调了这条“之”字形的道路曲折而又相连,这是颇有深意的。“双百”方针虽然由于整个国家环境、局势的大变化而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不能因此抹杀它是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正确方针。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文艺复兴时期,但“双百”方针使人回忆起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回忆起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回忆起唐宋各代各类文化繁荣兴盛、争奇斗艳的局面。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整个经济、政治、社会的平稳发展。“双百”方针也与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有其渊源。现在提出的“三宽”,与“双百”方针内容所指、范围宽窄可能有差别,其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可以直接继承的。其影响所及,必将汲取民族古老传统文化中积极的精神元素,在亿万人民群众中发扬光大。过去那个错误的口号“兴无灭资”,积年累月地呼喊,不知道制造了多少糊涂观念,加重了多少思想混乱。现在的“三宽”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日后必将开花结果,成长为菩提大树。

三、“三宽”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日趋成熟的标志。我已臻望九之年,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大多崇尚革命,鄙弃改良;总认为革命才能彻底改造社会、造福人民;改良不过是“温吞水”,解决不了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这股潮流曾经风靡了全世界,身历了国际、国内的变化,经过冷静的反复的反思,才醒悟到战争、暴力首先是对人民最大的灾难和痛苦。以和平文明取代战争、暴力是人类进步的历史趋势。世界各国任何革命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后鲜有自觉自愿还政于民的。何况当初马、恩对此就没有讲得很清楚,列、斯更不用说。我党在战争时期倒是自己有自己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理论联系实

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可惜后来特别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完全走到了反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敢于提出并实行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不能不归功于邓小平扭转乾坤的伟大气魄,尽管他仍有旧体制的痕迹。这次渐进式改革,由于接受历史上诸多的痛苦教训,对传统因素采取分析态度,坚持了一些好的做法,如一切经过试验。对计划也不完全排斥,只是强调把指令性改为指导性,使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三宽”从弹性与刚性比较着眼,强调以柔克刚,可收水滴石穿之效。“三宽”应视为渐进式改革趋向成熟的标志。像杜甫所写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四、“三宽”是东方古老哲学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朱厚泽在“三宽”的讲话中最后说:“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三宽”是思想文化的理念、政策,又绝不仅仅是思想文化理念、政策,也绝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理念、政策,而是一种更高的概括: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无所不包的哲学精神范畴、意境。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家倡导的“和而不同”。当然,世界充满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矛盾的斗争和存在,就没有历史的进步。但是,我们曾经信奉的斗争哲学,未免太偏激、绝对了,好像矛盾的解决,就只有我吃掉你、我消灭你这一种方式。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岂不更好吗?1979年我到安徽工作,记得万里同志说过一句话:“‘兴无灭资’这口号贻害无穷,使人变得愚蠢、野蛮,‘四人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竟有人相信。这是要把中国引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换一个字,变成‘兴无学资’就对了,就变成鲁迅主张的拿来主义了。学也不是盲目的一切照搬,还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

四 朱厚泽与“三宽”浑然一体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接着离开了中宣部。1月28日,邓

力群带着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忍之来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朱厚泽在简短的告别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说着站起身向台下鞠了一躬:“我谢谢大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他又补了一句:“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台下响起更热烈更持久的掌声。

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下台了,一年半时间不到就下台了,是作为“三宽”部长下台的。

下台至今23年。离开中宣部,无论在农研中心还是在总工会,他都受到同事们发自内心的欢迎和高度尊重。几位著名的老学者杜润生、于光远、李锐、胡绩伟,特别喜欢听他对问题的分析、解剖。1989年离休后,他时间更充裕了,读书思考,行走民间,求知求真,结交年轻人,比工作岗位上更充实、更紧张、更愉快。他收到太多热情的邀请,几乎应接不暇,每年有200天以上要外出奔忙。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出口成章。“三宽”是一种精神理念,是一种人格魅力。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可以说朱厚泽是“三宽”的化身,无论和朱厚泽说什么问题,都会使人感受到“三宽”精神的启发,“三宽”与朱厚泽浑然一体。凡同他接触过的人,都受到“三宽”潜移默化的感染。因此,朱厚泽部长下台了,“三宽”精神却不会下台,因为朱部长深入民间,到处走动而传播扩散于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不停息地继续滋长。

被公认为演说能力超群的朱厚泽,常常是说话最少的一个,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聆听。他“述而不作”,思想深刻,但下笔谨慎。他一生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可能不超过20篇。那么多精彩的讲话未留下记录实在是可痛心的损失。上世纪90年代起,原本喜爱美术的朱厚泽开始热衷于摄影,外出时总是“手不释机”。2006年,两位敬仰他的青年摄影家从数以万计的摄影作品中为他精选出版了一本叫《东张西望》的摄影集。令人惊讶的是,照片没有任何图片说明。他的女儿朱玫说:“他认为,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习惯于思想观点充分碰撞。”

厚泽确实称得上是多面手。中学时期,就爱好足球、网球,又是游泳健将。晚年对网球和游泳仍不能忘情。他还喜欢唱歌,年逾古稀,老友相

聚,只要邀请,他常不吝一展歌喉,特别有几首保留节目,更被朋辈赞为专业水准。2002年秋,我们到四川西昌参加一个研讨会,还一起去访问过川滇边境荒僻遥远、道路崎岖的泸沽湖,在独木舟上听摩梭族姑娘给走婚恋人唱的情歌。他把歌词问清楚记下来学会了,韵味悠长,取代“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为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有次我们谈到汽车零件,他竟然讲得头头是道,说出许多专业的细节,像个资深的高级工程师。我惊讶地问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他回答做过几年烟厂的厂长,还对贵阳几个相当现代化的制造厂作过调研,对工业多少知道一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什么就学什么,遇见什么就学什么,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他研究的范围既广又杂,对科学技术格外关注。1976年他独自在下放的农村陋屋里成功地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上世纪90年代,年过花甲的他已学会上网,成为中国第一代网民。2005年,75岁的朱厚泽开通了博客,在开博日志中写道:“这是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进入网络空间的开始,这也是一个试验,是对生命活力的一次体验。”

当然,他未必最热衷但毕竟从事时间最长的还是政治、政略和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正如他自己在《山之骨》的短文中所说:“无奈赤诚的良知乘时代的大潮被卷入风暴漩涡”,他在一生从政生涯中常有惊人之语、惊人之举或惊人的超前决策,要不他怎么会在打破论资排辈、改革开放的时代被破格提升为省委副书记,不久即成为省委第一书记,又不久成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部长呢?因此,他也就成了保守势力忌恨的目标、打压的对象。但这正养成了他多才多艺而又铁骨铮铮,至“三宽”的完整提出而成为一座不倒的思想高峰。

五 环境和时代造就了思想家

任何人的成长和成就都离不开环境和时代。毫无疑问,朱厚泽的禀赋极高。但应该说,仍然是改革开放的环境和时代,造就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家、思想家。

他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而是一介“山野村夫”、乌蒙汉子。但是,他的家族、他的父辈与著名

共产党员王若飞颇有渊源。朱厚泽是贵州省织金县人,1931年生,他父亲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的教育家黄齐生(王若飞舅舅)老先生,与王若飞等在贵阳同学于贵州开民主风气之先的达德学校。朱厚泽也曾在这个革命摇篮读过书、教过书。他的亲人中有地下党员,革命烈士,进步民主人士。朱厚泽耳濡目染,自小便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的熏陶,为一生做人处事打下了最初的好基础。

他在清华中学受到比较完整的现代化教育。这所学校不是一般的中学,校长周贻春原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抗战初周贻春南下经贵阳去昆明筹办西南联大。省教育厅长说那边去的人不少了,恳求他帮助贫穷落后的贵州办一所最好的中学。周慨然允诺,便从疏散到大后方的清华大学高材生中物色了一批教员,在风景如画的花溪河畔创办了这座享誉西南的名校。不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朱厚泽有幸在战乱的后方受到系统的教育,因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他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领导地下青年联盟一直坚持到贵阳解放。虽然后来还到贵州师院学过地理、历史,但清华这一段打好了基础是最重要的。

他年轻时遭遇大的曲折、起伏,得到人生难得的磨砺。新中国成立后,朱厚泽以本省地下党的后起之秀活跃于建国初期贵州各项革命斗争与建设战线的前列。先是从事青年团工作,后转到工业战线,先后出任贵州当时最大的公私合营企业贵烟公司总经理以及化工、经委等部门领导。1964年5月,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长。就在这几个月后,一场急风暴雨把他席卷而去,几乎完全淹没。“文革”十年动乱,中国几代人刻骨铭心,难以抹去痛苦的记忆。而1964年10月开始的贵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贵州以外的人却很少知道,实际这就是一次“文革”的“预演”。“左”的错误路线的蛮横、残酷,已暴露无遗。中共贵阳市委首当其冲,被诬为“反革命两面政权”、“小台湾”,市委领导班子几乎全部被批斗打倒。朱厚泽被诬为“修正主义分子”,罪状主要是在60年代初期做了几次商品经济理

论和政策的报告,说过“买棺材、买花圈也要计划吗?”这便成了铁打的罪证。后来他被下放到最穷苦的农村去劳动,一去就是八年,整日与“干人”为伍。贵州人以穷著称,最穷的穷人就叫“干人”。朱厚泽住的小土屋,孤零零地座落在田坝中央,四壁泥巴土墙,挖了一个小窗孔,室内黑压压昏暗少光,然而他身居陋室,照样发愤求知,攻读了马列,自修英语,体察社会状况,剖析体制弊端,和农民建立血肉联系,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终成大器。

朱厚泽是一个想大问题、出大思路的人。这句话是《贵州日报》前总编辑刘学洙说的。他说,朱厚泽对报纸的指导,总是不说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说“发育”这个词。因为贵州太落后,许多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状态,简直谈不到发展商品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发育商品经济。1984年夏末,中央要求各省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贵州省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草稿)尚未出炉,池必卿让朱厚泽向全会先作口头汇报。他没有用那页提纲,紧紧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四句话展开,突出了要在思想观念上充分认识商品经济的不可避免,讲话生动而深刻,与会人员无不动容。会后池必卿与几个常委交流看法,都对他的观点作了充分肯定。后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下达,一对照完全符合文件精神,还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同、赞扬,认为贵州的方案有自己的特色,是调查研究的产物。这年经济增长过快,中央及时提出要进行宏观调控。厚泽却根据贵州的实际做出了不同的处理,后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就此访问了他。他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国,有的地区发展很快,有的滞后,差别极大,中央看到问题采取一些必要的紧急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时我们研究了贵州的情况,工资总额不仅没有超,而是根本没达到;银行存款不是贷光了,而是根本用不出去。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往前走。也就是说,哪个龙头漏水,就关哪个龙头,不要遇到新问题就关总闸。”

1984年1月4日至8日,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刘学洙随行采访。4日那天,胡耀邦把西

南四省市主要负责人都找到花溪宾馆来座谈发展战略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随意互相插话。先是分析各省特点,总书记先问贵州。厚泽不像有些同志,老是强调贵州穷,要求中央照顾。他从容地说:“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听了很高兴地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边,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第二天继续座谈,耀邦提出要把不发达地区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地位。厚泽当时有段精要插话:“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正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二三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干流支流都要开发,应先开发支流。干流开发了,而支流生态没有解决,不能保护干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紧接着他又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治理支流,屏障干流,开发支流,促进干流。”这简短的插话引起强烈共鸣,杨汝岱、廖伯康立即表态赞同,耀邦充分肯定。这是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之前二十年的事啊!

回忆这些二三十年前的资料,我深深地感到,朱厚泽出任中宣部部长之前可以说已经是位改革开放的思想家了。如果朱厚泽只是个好的省委书记、好的中宣部部长,也许会同样提出“三宽”的主张或政策,但不一定能采取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宣布。思想家毕竟想得深、看得远。不下文件、不开大会,完全是个人建议、商量口吻。也就是不靠权力、威势、地位,只凭理念本身的真理性、渗透力,真是以德服人,让人心悦诚服,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考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那几年国内外的大小风波,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联崩溃、东欧变色震惊了整个世界,人心振荡,反应不同,思想陷入混乱,但经济、政治、思想之垄断必须彻底改革却逐渐成为共识。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教训痛苦而深刻。我认为厚泽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整体认识在

倡导“三宽”时达到高峰,“三宽”不仅仅是文化理念、文化政策,而是消除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的根本前提、根本手段、根本方针,正如“和而不同”不是无原则苟同,而是主张宽容不同意见在辩论和竞争中取胜。“三宽”是涓涓细流,看似柔弱,但日夜不断,坚持不懈,力量最强,最能以柔克刚,水滴石穿。

1999年,极少发表文章的朱厚泽在《方法》杂志发表著名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一文,指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靠单一的国有经济,不行。一切交给国家、政府去包办,不行。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不要把国家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进而去崇拜那个国家主义。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

近些年来,在多个不同场合朱厚泽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朱厚泽说:“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有些观点不少人都说过,但朱厚泽说起来仍有他独到之处。改革30周年前后,他常遇到“关于现代化中国路线选择的思考”之类的访谈或座谈。他的回答很简洁:“这二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

亲友们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朱厚泽思考的是金融危机和北京奥运会之后受到关注的“中国模式”。他还和从前一样,深入关注现实问题而不轻易下结论。他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和代表,是一颗珍贵的钻石,晶莹剔透,闪闪发亮。越是阳光不足的地方,越显得光芒四射,璀璨辉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任锐：发孙炳文未竟之志

● 任均 口述 王克明 执笔

任锐，原名任纬坤，是我的二姐。孙炳文和任锐结合是在1913年，刘心武的祖父刘云门先生是他们的证婚人。那时，孙炳文28岁。

早在辛亥革命前，孙炳文就加入了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武昌军兴，他被举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一切宣言文件、往来函电都出自他手。民国后，同盟会在北京办了张《民国报》，他是总编辑，编辑、记者里有梁漱溟等人，我二姐参加编辑该报《妇女专刊》。大家志向一致，共同进退。二姐和孙炳文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因志同道合而情投意合，自由恋爱，没有媒妁之言，就结为伴侣了。

1913年，他们所参加的铁血团暗杀袁世凯事败，孙炳文被通缉。为躲避追捕，他们从北京回到孙炳文家乡四川南溪县。刚回四川时，孙炳文曾在南部县第三师范学校当老师。他在南溪办过贫民夜校，也在成都、遂宁教过书。

1916年春，孙炳文在川南见蔡锷，相谈甚洽，留作随军参议。之后到朱德部任参谋，与朱德相识，结为金兰之交。在朱德军队工作一段时间后，1919年，孙炳文去成都，在四川造币厂当厂长。那段时间，他薪水不错。二姐一次睡觉醒来，看见自己手上戴着一副漂亮的金镯子，很是惊喜。一问，才知道是丈夫给她买的，趁她熟睡时，悄悄地给她戴上了。

孙炳文跟朱德商量好准备去国外学习后，1921年，他和我二姐带着孩子们离开四川，先往河南新蔡老家，看望我父母，住了些日子，再往北京。《朱德自述》里回忆到这一时期时说：“1916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

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

二姐他们这次到北京后，孙炳文在《民报》当了些日子主笔。

朱老总谈到跟孙炳文一起出国，说：“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孙炳文做北京的《民报》的主笔，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熟悉。不过，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北大毕业以后，就到四川在队伍里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学生。后来，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来，船票买好。在九月初，我们就乘‘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船，从此远航开始了。”

孙炳文和朱德出国前，曾在我大姐夫黄志烜的安排下，带着宁世（孙决）在北方旅行。黄志烜是中国第一代煤矿工程师，是中国最早的华人矿长，那时他正在鸡鸣山煤矿工作。他把朱德、孙炳文和孩子孙宁世接到鸡鸣山煤矿，住在他家。然后派人陪他们往大同云冈石窟等地旅行游览，回鸡鸣山又住他家。他带朱德和孙炳文参观了煤矿，了解工人的生存状况。

朱德和孙炳文1922年去欧洲后，二姐带着孩子们住在北京。她进入北大读书，把孩子陆续都送进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新学孔德学校。那段时间，我父亲带我去二姐家住了很长时间，住在东华门附近的瓷器库。还有我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那儿。孙炳文回国时，我虽然很小，但和五姐都得称他“浚明兄”。我三姐夫冯友兰到北京时，也住在那儿。

在欧洲，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入冬孙炳文回到北京后，介绍我二姐也加入了中共。1926年春孙炳文去广州黄埔军校任职，我二姐怀有身孕，带孩子们留在北京，继续在北大求学。北京“三·一八惨案”后，



朱德(左)、孙炳文 1918年2月在四川泸州

二姐和孩子们也去了广州。

国共合作和北伐时期,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等,还曾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他还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郭沫若做了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4月6日,孙炳文接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令,让他到武汉去,担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4月10日,他和我二姐带孩子们,并有秘书张斗南等工作人员随行,离穗赴港。12日的香港《大公报》披露了他去武汉任职的消息。13日,他们同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褚民谊等人一同登上法国轮船,启程北行上海,准备走水路去武汉。出发时,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清共,但孙炳文和二姐一点儿都不知道。然而,跟他们一起登船的褚民谊,是国民党右派,已秘密得知蒋令。16日到上海下船时,褚民谊引导巡捕将孙炳文逮捕。

那时,陈群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跟杨虎一块儿主持上海“清党委员会”。这些国民党右派很仇视抓来的孙炳文等左派人士,向蒋介石报告,希望枪毙:“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

办,如何处置乞钩示遵行。”蒋介石毫不含糊地批复:“叛徒严惩。”4月20日,孙炳文被腰斩于上海龙华。

昨天还是共事的同志,一起北伐革命,思想倾向不同而已,何至于为了实现一党专政,就同室操戈,下此毒手?对此,二姐毫无精神准备,死讯传来,悲愤交加。她走上街头,见一些电线杆子上挂着人头,都是共产党人。

孙炳文遇难20天后,朱德在南昌给我二姐写了一封信:

纬坤:

鉴闻浚明凶耗传来,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

朱德

五月十号

来信交南昌河东会馆十六号

1927年7月,二姐在武汉写下《孙纬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之后,她走上街头,慷慨演说,愤怒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坚信,任何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14年后,二姐给孩子写下了那首深沉悲壮、传诵至今的诗篇:

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当时,二姐最小的女儿出生才几个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生存艰难。为了能让孩子生存下来,不得已,她把这小女儿送给了我大姐任馥坤。小女儿随了我大姐夫黄志烜的姓,取名黄粤生。多年后,“文革”后期,粤生为以妹妹身份给姐姐孙维世平反,改叫了孙新世。

二

1927年11月下旬,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两个孩子,回四川南溪安排家事。宁世、济世两个大点儿的孩子,安顿在武汉。后来二姐带孩子们都去了安徽桐城浮山公学。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我父亲把济世安排到那儿了。孙炳文牺牲后,曾

与朱德、孙炳文、章伯钧等一起去欧洲的房师亮，愿照顾故人遗孤，曾给我大姐夫黄志烜写信，说他父亲在浮山办有学校，让把我二姐留在武汉的两个孩子送去。1928年农历四月八日，父亲送济世到了浮山公学。

那以后，二姐知道济世在浮山受到房师亮照顾，很是稳妥，便跟房师亮联系，受邀前往。当时在四川南溪，以前与孙炳文为敌的豪绅，正勾结地方驻军，想加害二姐。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从南溪到武汉，接上宁世，同往浮山。房师亮很照顾烈士遗孀和孩子们，他父亲房轶五先生安排我二姐做了图书馆管理员和教师，并安排了孩子们的学习。一年后，房师亮携妻子同赴德国再次留学，二姐和孩子们因此离开浮山，房师亮夫妇把她们护送到了上海。流亡欧洲的邓演达，来函拜托朋友照顾二姐母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二姐出任明浚小学校长。后来几个孩子陆续都安排在开封、北京上了学，我三姐夫冯友兰资助维世读了北京的贝满女中，宁世还曾到日本去读大学。

邓演达回到上海被蒋介石杀害后，二姐回了河南。那之后，她很多时间都在开封或新蔡老家。1932年秋，她去北京办了一所“北辰中学”。她任校长，三姐夫冯友兰为支持帮助她，出任董事长。除了他们俩，学校的教师和干部，都是邓演达生前建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这所学校办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内。二姐约请冯友兰和别的同事一起开会，谈她对办学的想法和意见。当时只办了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校内很有民主气氛，师生融洽。学生们因此很活跃，办演讲赛、学科讨论会，出墙报，成立班会、学生会，还编印校刊。因为学生少，收费又比较低，半年后就开支困难了。因经济来源不足，不得已学校停办了。

1935年，二姐从开封带着我和维世去上海，安排我们学了两个多月话剧。学完后，我们三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起回到开封。过几天，维世回北京上学去了，我和二姐留在开封，我在静宜女中读书。

秋季的一个星期日，二姐要带着我出门。我见她从行李中提出一只挺大的瓦罐。那瓦罐差不多一尺半高，尺来粗，封着口。见她把瓦罐抱在怀里，我问这是什么？二姐说：“这里面是你二姐夫

浚明兄。”我很吃惊，这才知道，二姐把孙炳文的骨殖装殓在瓦罐里，从上海带到开封来了。现在她要让二姐夫人土为安。原来，我们这是要去安葬二姐夫。

二姐只带着我一个人，抱着瓦罐，雇了辆人力车，出了开封城宋门。我们往东走，又向南拐，跨过陇海铁路，又穿过白塔村，再往南就到了一片叫做“四川义地”的墓地。二姐一路伤感地跟我说浚明兄，说他是共产党，是好人，让我别忘了杀害他的人。那时二姐生活艰苦，没有钱。孙炳文是四川人，二姐却无力送他回归故土，只好把他的骨殖埋到了不要钱的四川义地。在那里的一处边角之地，二姐请人给挖了个坑，不太大，但挺深的，将瓦罐埋葬进去，盖上了土，又堆起个小坟头，还立了一块很小的碑。二姐面对那块碑，跪了很久。我随着二姐，给孙炳文磕了头。

三

从小，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二姐。她总悄悄跟我说共产党好，讲人人平等的道理和共产党实现民主的理想，讲劳动神圣、年轻人应该能吃苦耐劳什么的，还嘱咐我别出去说。

抗战爆发后，我先随二姐参加了她组织的妇女救护队，后进了东北军130师的一个剧团，参加演出抗日剧目，又到陕西周至县教东北军新兵唱歌。后来父亲约我到西安，送我去了延安。那时二姐和维世已经在延安了。她们母女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同学，又在马列主义学院一起学习。母女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大家都很尊敬她。于是，因为维世叫她“妈妈”，其他学员也就随着维世，叫她“妈妈同志”。

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一段时间，宁世也在延安，我们经常见面。二姐的孩子都有才华，有能力，大家都喜欢他们。朱老总在1939年2月17日写给与他和孙炳文相熟的四川老友张从吾的信中说：“浚明亡后，其全家均能继续革命。孙泱即宁世现在我处工作，有父风，颇过之，母不及。继世在河南亦是干才。维世(女)亦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到延工作，特此告。”

后来二姐被派去四川工作，维世跟我一块



任锐、孙维世、任均(左起)1930年代的合影

儿,流着泪把她送上汽车。第二天维世忽然就去苏联了。二姐先在璧山县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五保育院工作,呕心沥血地照顾战争孤儿们,后来累病了,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1939年12月3日二姐给我的信里说:“我因病已从保育院回到重庆来了。那里工作时间太多——工作每日十二时,夜间还得起来一两次,给孩子们盖被子——我经不起,所以病了。现在已痊愈,请勿念!”

二姐回延安后,是托人告诉我她回来了的。一天,一个同志对我说:“你姐姐回来了,叫你去呢。”我一听,喜出望外,赶紧跟我们延安平剧院院务处借了匹马,背个小红布书包,快马跑去看二姐。我和二姐在延安时,父亲曾经给我们寄过一次钱,300元票子,我们俩一块儿给花了。那时洗衣服没有肥皂,大家都用淋下的炭灰水洗衣服。木炭的灰,泡在水里,泡出碱来,就可以洗。我们还用它刷牙洗头。父亲寄来钱,我们可高兴了。二姐给我买了肥皂、牙膏,还买了一块布,让我做了一条蓝裤子,穿上美得不得了。

二姐在统战部工作时,住在杨家岭,我常去。一天下午,我从乔儿沟走十几里路到了杨家岭,人家却告诉我二姐已经调到南门外边区政府去了。那时没电话,二姐没法儿通知我她换地方了。我又从杨家岭走十几里路到市场沟去找二姐。我老去二姐那儿,边区政府那院里住的董必武夫人

何莲芝、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还有冯韧等几位大姐,也就熟了。尤其是天暖季节,我去时,常遇见她们在院中。那时何莲芝大姐养了只猪,在窑洞里哼哼唧唧进进出出的。她是长征到陕北的老红军,对人特别和气,见到我总是说:“你来玩儿嘛。”每次都是,“你来玩儿嘛”。过了几十年,“文革”结束后,在北京八宝山举办孙维世告别仪式时,她也去了,见到我,还是说:“你来玩儿嘛。”她非常怀念我二姐,每次见到二姐的小女儿粤生,总会谈起我二姐,总会难过地落泪。

建国后,一次在北京广安门医院看病,忽然一个老太太叫我:“仍浚!”我一听,这是叫我的名字“任均”,是陕北口音。我不知道她是谁,问:“您是……”她说:“你是仍浚。鄂(我,陕北音)是刘志丹婆姨。鄂认识你,你不认识鄂。在延安,你去看你二姐,鄂常看见你。鄂认识你。”我想起,二姐当年指着一间窑洞给我说过,那里住的,是刘志丹的夫人。

四

1945年秋,二姐的三子名世从国统区转到了延安,住在南门外边区政府他妈妈那儿。我每周都去那里,大家见面。那时,宁世去了东北,维世还在苏联,我和我丈夫王一达在延安平剧院。组织上为了照顾二姐身体不好,身边又没有孩子,就让名世留在延安工作。但二姐说不用,前方更需要人。名世便被派到牡丹江炮兵部队去了。

名世走前那几天,二姐牵肠挂肚,给他缝缝补补,没休息好。送走儿子,二姐就病倒了,一个人在窑洞里躺了好几天。我知道她的心情很不平静。与小儿一别数载,相聚仅月余,却又命他去冲锋陷阵。母子情深,焉能割舍?何况这是最小的儿子。孩子此去山高水远,何日才能再聚膝下?二姐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1946年秋,名世牺牲在东北战场。

那年,有一次我去找二姐,准备晚上一起看演出,碰上柯仲平同志去看我二姐。柯仲平是诗人,那时在陕北搞民众剧团,发展秦腔,还当过我们延安平剧院副院长。我们一起吃完饭后,二姐不想去看戏了。柯仲平却还想去。他为人热情,说:“我和鲁妹一道去哦。”二姐管我叫“六妹”,他便也叫我“六妹”,但他是南方口音,把“六妹”说成“鲁妹”。路上,他跟我提起,二姐了不起,他很佩服。他说,前些天梁漱溟到延安时,去看望我二姐,被二姐严厉批评了一通,说他“你对不起炳文,对不起共产党”。

民国初年,二姐和梁漱溟都在报馆里,跟孙炳文一起办《民国报》。梁漱溟用了一辈子的名字“漱溟”,就是那时候孙炳文给他起的笔名。那时,大家投身革命,向往民主共和。后来社会变迁巨大,梁漱溟潜心佛学、儒学,搞乡村建设,渐自走向思想独立,孙炳文则与朱德、周恩来一起成为中共重要干部。蒋介石清党时,把孙炳文抓住杀害了。二姐与梁漱溟,已经多年不见。1946年梁漱溟为国共和谈的事情,到延安劝和时,去看望了我二姐。他那次去延安,急着想出和谈成果,就主张让一让,不打仗,受一个政府领导。当时那种条件下,这使人觉得他是想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地盘。虽然他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这样的。

当时跟二姐同住边区政府院里的冯韧大姐说,梁漱溟去那里看望我二姐时,二姐哭了,哭得很伤心。她一定是见到梁漱溟后,想起他们年轻时和孙炳文在一起的日子了。曾经那样志同道合,都不喜欢独裁专制,而今能否殊途同归?冯韧大姐告诉我,二姐哭着说梁漱溟“你对不起炳文”时,梁漱溟一直低着头,难过的样子,没说什么话。

那年10月,维世从苏联回国。二姐在延安听到传说,说维世走到途中什么地方,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了起来。她怕这是真的,急匆匆来找我,焦虑之极。作为母亲,她十分担心女儿性命,哭得非常厉害。她哭着说,她要是没了维世这个宝贝女儿,她简直就没法儿活了,维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找蒋介石拼命去。那时,我看二姐的肺病已经不轻了,就劝她别着急,不会出事儿的。

过些天,在胡宗南进攻前,延安准备疏散的时候,二姐前来帮我收拾东西。那时,延安平剧院

的人都住在延安北门外中央党校六部,我和二姐就在那里的我家窑洞告别了。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带好组织关系,别弄丢了。“组织关系”是写在纸上的党员证明,那时候人员调动,都自己带着。二姐让我拆开棉袄衣襟,把组织关系藏在棉花团里,再缝上。她嘱咐我,万一遇到敌人,宁可把这张纸咽进肚里,也不能让敌人拿到。她还让我到哪儿都在意着点儿,一定要没病没灾的。跟我分手后,二姐就从边区政府出发离开延安了。过了些天,我和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刘竞雄一路步行14天,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到山西后,我们住在扈家沟,听说二姐曾在附近的三交搞土改,维世回国后,也到三交来,陪着母亲参加搞土改。但是二姐病重,她们就离开了,我没见到。

五

没想到,再见到二姐,竟是在她弥留之际。1949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心想,二姐和维世一定也来参加这个会。我在会上到处找她们,可是找了几天都没找到。会快结束了,也打听不到。我知道二姐身体不好,心里非常着急。一天刚散大会,我看见邓颖超同志还在台上,就不管不顾,径直跳上去,跑到她跟前,问:“邓大姐,您知道我姐姐和维世她们现在在哪儿吗?我一直找不到她们。”邓大姐见是我,说,你姐姐病重了,住在天津天和医院,去了一个月了,维世也在那里照顾她。宁世先前也在那里,后来要去东北工作,走了,就维世一个人在那儿陪着了。

我赶紧跟住在清华的三姐联系上,4月9日,一块儿坐火车赶到天津去看二姐。在天津的病房里,我和三姐看到了二姐和维世。二姐已十分消瘦,脸上苍白没有血色,也没有皱纹,看上去竟年轻。维世轻轻叫妈妈:“妈妈,三姨和六姨来了。”二姐睁眼看见我们,但已病重说不出话。她拉住三姐的手,看了半天。她和三姐是抗战前分手的,十几年没见了。她又拉住我的手,攥紧了,盯着我看,看了许久。我看见一行泪水,从她眼角流下,不停地流,知道她不愿离开妹妹们,舍不得我这个小妹妹。看着二姐,我的心都要碎了。

第二天——1949年4月10日上午,二姐就

去世了。我这才明白，她在等我们。我跟二姐在延安分手前，她还从延安南门外走好几里路，到北门外党校来看我，怎么会忽然就没了？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二姐一辈子历尽辛苦，奔波革命，可是我知道，她多爱她的家啊！她爱父母，爱姐妹，爱丈夫，爱孩子。1939年时，她在给我的信里写道：“六妹！我经常地回忆着离开我们长逝的母亲的生前的一切：她的艰苦，她的贤明，她的智慧，她的勇敢，她对父亲的多情……父亲有信没有？他老人好吗？我写过一封信去，也没有回音。不知是他来的信我没收到？还是我去的信他没收到？想到这个年高的老人，我也有些心酸！他这一生，女儿对他的孝养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姊妹已经离散！尤其是你和我，回去孝养他老人的机会太少了！六妹！希望你赶快把他老人的情况告诉我……我本来准备给你寄钱去，因为工作中止，又要稍缓时日。鲁艺毕业后，打算怎样？接大姊、三姊信没有？知名甥（名世是我的外甥）近况否？此子半载不通音讯，念之凄然！”

1946年名世牺牲后，组织上担心对二姐打击太大，一直没有告诉她，也不让任何人告诉她。

在晋西北，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大姐告诉我时，也叮嘱我别跟二姐说。现在，胜利了，二姐却自己去寻找名世去了！我趴在二姐床边，哭得死去活来。

组织上把我和三姐安排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内部招待所。但是多好的东西，我一口也吃不下去。我和二姐的感情，不光是亲姐妹的感情，还有这么多年以来，二姐对我的影响，和我们在革命队伍里产生的更亲近的感情。

4月12日，天津市的领导同志黄敬，从天津送装殓二姐的灵柩到北京，我们随那列火车回京。4月13日，组织上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公葬，安葬了我二姐。那天去了好多领导同志，和一些亲属。维世、我、我丈夫王一达、我三姐和三姐夫冯友兰，都去了。二姐在延安工作时的领导林伯渠同志主祭，早年曾跟朱德、孙炳文一起去欧洲的二姐的老友章伯钧先生报告我二姐参加革命初期的事迹。

后来，周恩来给二姐题了墓碑：“任锐同志之墓 周恩来敬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立”。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成立十周年，回报作者大赠书活动

值此我机构成立十周年之际，为了对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关注的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现推出“回报作者大赠书”活动。每名作者均可获赠三册市场上任何出版社出版的任何您喜爱的图书！并免收邮寄费！详细情况请登录网站：<http://www.bookhk.com/>，或拨打热线电话：400-680-8368（长途免费），或发邮件至：bookved@126.com

出版社继续约稿

国内正规出版、公开发行，或海外正规出版、公开发行

- **书稿内容** 1. **文史类**：回忆录、自传或其他人物传记、社会纪实作品等； 2. **社科类**：社会科学、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等研究著作； 3. **文学类**：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作品； 4. **小说类**：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败等长篇、中短篇小说； 5. **美术类**：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绘画作品；毛笔、硬笔、篆刻等书法作品。
- **书稿要求** 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个人专著由单独的作品或若干篇合集组成，字数应达到6-8万字以上；多人合集由2-10名作者的作品组合而成。
- **出版发行办法** 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分别面向国内以及海外公开发行。其国内公开发行的，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

24小时全国投稿热线：400-680-8368（免费长途电话）

我们每年运作500余部图书，新书欣赏、网上订购，请登录：<http://shop.chinesezj.com/>（学习新知书店）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邮编：100025）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综合编辑部（收）

电话：(86)10-81118378、81118398、86878777、58429718 传真：(86)10-89506878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伽悦、文馨、高晶、汪鹭（编辑）

详情请浏览网站：<http://www.zuojiba.com>（中华出版热线），或<http://www.bookhk.com>

就右派问题审改结论致党支部信

关于李慎之同志右派问题审改结论

李慎之，男，一九二三年八月生，江苏无锡人，家庭出身高级职员，本人成分学生。一九四六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出党，由行政十一级降为行政十七级。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对李慎之同志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审，结论如下：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李慎之同志对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等方面的问题考虑很多，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困惑不解，对如何防止发生类似问题冥思苦想，对共产主义事业忧心忡忡，并且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设想。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就自己经常考虑的有关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群众运动以及干部和新闻政策等问题发表了大量言论。这些言论绝大部分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本意是想通过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由于李慎之同志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很深，在分析某些问题的立场方法上往往发生原则性的错误。但是全面地分析李慎之同志当时的言论，还不能说他在根本立场上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在肯定“党的道路是对的”“中国党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问题”，以避免我们党出现苏联的错误。

李慎之同志参加革命以后，特别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的二十年来，各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好的，这也证明他在一九五七年所犯的错误是思想认识的错误，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对党的。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划分右派分子的规定，一九五八

年不应该划李慎之同志为右派分子，决定撤销一九五八年“右派分子李慎之的政治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行政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此问题的材料应当抽出销毁。

新华社国际部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

新华社党组

曾 涛(签字)

穆 青(签字)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

政治部副主任

汪家桦(签字)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

同意

李慎之(签字)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在右派问题改正后给党支部的信

伯坚、延宁、向明、先速同志^注：

在我的“右派问题审改结论”上签字“同意”一个半月以后，我才认为可以向你们写这封信。

首先，我还是要重复我一月二十三日对向明同志说过的话：同志们为给我“改正”，在短促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我永远是十分感激的。

但是，由于我至今未能理解的原因，在整个“审改”的过程中并没有征求我本人的意见，因此，我对“结论”也仍然有不理解的地方，其中有些我当时已经向向明同志提出来，而且作了相应的修改，有些我当时觉得不便提出来，这不但是因为我马上要出国，时间十分紧迫，更重要的是

我极不愿意造成一种似乎与组织上不一致的印象。说实在的,当年划我为右派时,就从来没有人同我核对过任何材料,征求过我的任何意见。我第一次知道我自己的结论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开除我出党的支部大会上,在那种环境下,我实在没有听懂几个字,以致二十年来我从来也说不清楚自己的罪状到底是哪几条。但是我仍然举手赞成把我开除出党,并且在自己的结论上签了字,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表示自己与党一致。更何況,现在党是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呢?

当然,也有人说,政治结论是关系到政治生命的大事,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已经看惯了世事的变幻,并不那么重视写在纸上的几行黑字,因为我青年时期也曾得到过不少看来不坏的鉴定,然而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归根到底,决定我们大家命运的只有历史的不可抗拒的逻辑。

同志们现在肯定我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是“忧心忡忡”,一直为如何防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问题而“冥思苦想”,但是因为我“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很深,在分析某些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上往往发生原则性的错误”,最后断定我“在一九五七年所犯的错误的思想认识的错误,而不是根本立场的错误”。

也许确实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吧,我一生都认为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占有更为可贵,因为“为寻求真理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总是比不担风险的占有它要高得多”。二十多年来,我可以说明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用逻辑和事实来分析和检验我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的思想,探究为什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根据他老人家自己的提示,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会成为党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现在党改正了对我的结论,说我不是右派分子,然而还是有错误,不过,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看来,历史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的忧虑,但是我也还是在思索:在肯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在我的思想中造成的“原则性错误”的同时,我则认为如果不解决民主问题,公有制本身还不能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是不是也是错误呢?我提出的“真理的认识”与“权力的渊源”的

命题是不是还能成立呢?当年那些大公无私的揭发、义正词严的批判又剩下多少真理呢?再进一步言,我们的民族为什么竟然不能依靠科学的逻辑,甚至仅仅依靠常识,就在当初根据苏联的教训推知并且防止一场长期的灾祸,而非要等到多数人身受其害以后,才开始有所憬悟呢?要是照我自己的分析,我的封建思想其实要比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得多。在一九五七年确定要划我为右派分子而要把我拿出来揭发批判以后,我常常读《礼记·檀弓》中“申生受赐而死”的那一段文章。虽然从理智上说,我实在无法发现自己思想里从前提到推理的错误,但是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和忠诚,我还是承认自己犯了“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自己给自己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时我感到我是一个人格破裂的人,我的感情同理智分了家,我第一次对党说了假话,虽然是顺着党的意旨说了假话。当时,我在我办公桌的台历上痛苦地写下了一句:“The best element of my soul has been burnt away”,虽然一九五八年的结论说我“悔改真诚”,这一回的结论又肯定我“特别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的二十年来,各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好的。”其实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不足道的人,二十多年来,我竭尽一切力量维护我那已经破裂的人格。但是在历史面前,我个人是软弱无力的。我并没有像当初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以至不惜牺牲生命的共产党员那样斗争。我顶多只能像一只萤火虫一样在漫漫长夜里以一点理性的微光照着自己在黑暗中游行。我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手上没有别人的血,也没有别人的泪,但是我自己心上的创口是永远敞开着的,流着我自己的血。

一九五七年以后,大约有五年的时间,我内心唯一的希望是:“但愿我想的一切都错了”。道理很简单:若是我错了,国家当然就会好起来。我还记得一九五八年在十三陵劳动的时候,在大坝合龙的那一天,看着那些欢呼跳跃的青年,我的眼里忽然流下了泪水,脑子里浮起了鲁迅的句子:“让我一个人来负起因袭的重担,顶住黑暗的闸门,好放青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可是后来,我终于认识到我的希望大概要落空,同志们也许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内心的痛苦并不亚于划我右派的时候痛苦。

结论说我在“鸣放期间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其实如果以五月一日为鸣放的期限的话，我的“右派”言论大多是在鸣放以前说的。偌大一个新华社，大概还有人记得，在鸣放期间，我倒是新华社一个最大的保党派，其原因不知是不是也可以归结到我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主要是所谓负责任的思想。王伟同志大概还记得我在鸣放期间同他的谈话。我认为，我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干部，我就要对党的工作负责，我不能把责任推诿到别人或者组织的身上。我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接受批判与处理的。许多同志知道，我的言论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原话，但是我从来没有想推诿过自己的责任，虽然我曾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来细细思索，为何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到了我的嘴里就成为反动语言。

一九五七年的时候，我曾经得到一项特殊的荣幸——在全社大会上自我批判。当时的社领导叮嘱我，要我通过“现身说法”来“消毒”，来向群众表明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在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大罪以后是怎样对待党的判决的。我现在还记得台下许多同志同我一起啜泣的情景。五十五号文件下达以后，我曾以为这一次也会像历次运动后平反错案一样，给我一个在全社大会上消除一下我当年播下的奴隶主义毒素的机会。我所想的并不是为我个人的名誉，而是希望通过我的教训，在今后的中国千秋万代再也不出现我这一辈人所遭到的悲剧。虽然我的民主思想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我和千千万万人的遭遇和命运所关系到的难道不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吗？当然，现在看来，我的希望已成了奢望，但是我仍然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正是在一九五七年人们失去了法律和道义的一切保障以后，才有可能发生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六年以及其后一系列更大的悲剧。

我还记得向明同志那天颇动感情地对我讲的话：“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几个二十年”。我知道我一生中最好的二十年已经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我并不后悔。一个像我这样立志献身于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的共产党员，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又有机会了解那么多的情况、接触那么多的问题，怎么能不产生那些思想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

狱？”在这波涛汹涌、浊浪滔天的二十年间，我又怎能想象自己置身于第一个旋涡以外呢？我所希望的是，这样一段历史不至于白白地过去，而会给我们的民族留下真正的教训，让年青的一代真正能“走向宽阔光明的地方”。

喋喋不休地说了不少话，请不要认为我要对我的结论提出什么异议或者保留。不，我完全没有那样的意思。不过我已年近六十，快到退休的时候了。新华社可以说是我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国际部尤其是我投入了青年时期全部的精力与心血的，寄托了我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全部理想与希望的地方。而新华社特别是国际部又历来被认为是思想比较开通、比较活跃的地方，据吴冷西同志最近在一次会议上证实，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所以到新华社国际部来征求意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国际部的同志也还是愿意更开阔一下视野，了解一下一个从他们队伍中开除出去的人是如何看待反右派运动和这一次的改正的。

专此 即致
敬礼！

李慎之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注：伯坚、延宁、向明、先速指陈伯坚、李延宁、高向明、郭先速，为当时新华社国际部负责人和右派问题审改小组的负责人。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本刊扩版调价启事

为了刊发更多读者喜爱的文章，应读者和作者要求，从2011年1月起，本刊正文从88页增加到96页。每期定价8.00元，全年96.00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10年8月

启 事

2009年精装合订本 100元，简装 95元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舆论监督权与官员名誉权

● 郭道晖

近年常常因为新闻媒体或互联网、出版物揭露了某些地方党政官员的丑闻恶行,就被其以侵犯名誉权或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为由,派公安人员跨省抓捕批评人、检举人。如辽宁某县公安干警到北京拘捕《法制日报》记者,河南灵宝警方到千里外的上海抓捕王帅。最近又发生“渭南书案”——陕西警方到北京抓捕揭露三门峡移民贪腐现象的《大迁徙》一书的作者谢朝平(在社会舆论的强烈抗议下,已被取保释放)。前些年甚至有深圳某基层法院作为原告,以某杂志报道其判案不公、存在“猫腻”为由,起诉报社侵犯其名誉权。这在发达的法治国家简直是匪夷所思。

这些事件涉及越权、侵权等违反法程序和侵犯公民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实质权利问题,本文暂置不论,现单就侵犯公民和媒体对党政机关和官员的监督权问题,说说如何看待公民、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同被批评、曝光的党政官员的所谓“名誉权”的“矛盾”。我认为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对待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公权利(舆论监督权)与政府公权力的克制义务的关系问题。

公民的公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是公法关系

在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上,应当以公民权利为本位,党政机关及其官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当为权利主体服务并受其监督。这个主从关系不能颠倒。在公民和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利过程中,党政机关与官员更要坚守这一原则。公民和媒体在行使新闻与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时,固然应当力求真实、准确;但是,对官员和党政机关而言,则首先应当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被监督对象的地位,虚心听取批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批评明显失实,也完全可

以运用信息发布平台,作适当的澄清。作为公权力者,政府和官员本是处于强势地位,公民(包括媒体及其记者)一般是弱者,从政治伦理上说,按照“保护弱者”的宪政原则,法院在审判中也应加以区别对待,以有利于对官员的权力制约和对公民的权利保护。公民和媒体对党政机关与官员的批评,即使有些失实,官员也应当有宽容的雅量。何至一见批评就抓捕或诉诸法院?

问题更在于,从法理上说,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与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的“名誉权”之间的冲突,不应看做私人之间或私权利与私权利的冲突,而应看做公民的公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的冲突。这里,私权利是指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以及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知识产权等;公权利则特指公民与媒体的政治权利,包括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即不应简单地归于民事纠纷的私法范畴,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公法关系。

在专制国家,臣民批评官家,常被视为“犯上”、“大逆不道”。这种遗风流传下来,在我国曾经长期有所谓不许“矛头向上”、“反对领导”。“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更将它定为“恶毒攻击罪”。

新时期我国宪法已确认公民有言论自由和批评、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并规定被批评者不得打击报复。

在民主法治国家,官员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其执行公务因而享有的权威与名誉,也是人民赋予的。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批评监督,从根本上说,也旨在维护公权力的集体权威与名誉。人民也可以撤销其授予政府的权力,收回对他们在公职上的“名誉”的信任(即所谓“公信力”)。因而,面对人民群众对官员或官方执行公务中的失职或不法行为的批评监督,后者的主

要职责是平等对话,接受质询与批评,正确的虚心改正,不实的加以解释,而不是进行名誉权的诉讼。公民在行使批评监督这一公权利时,不慎有失实之处,也应享有免责权。

再则,官员作为人民的仆人,对主人应抱谦恭、克制与宽容的态度。这在法国《公务员总章程》中称为“克制保留义务”,即公务员因职业上的特殊需要,其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度,比一般公民要受更多的限制。公民针对官员与官方的公务行为的批评,应当比针对其私人行为有更多的保障。

即使批评、检举事涉官员个人私生活乃至个人隐私,有失实之处而伤害了官员的私人名誉,其受责程度也应比一般公民私人之间的名誉权纠纷为轻。因为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其公务活动固然应当公开化,其个人隐私权也应比一般公民小。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接待美国一位州长来访,他谈及某报因揭批某明星隐私,涉嫌诽谤,被判罚款200万美元;而批评某州长涉及其个人隐私(非公务行为)时严重失实,有损其名誉,法院却只象征性地判处罚款1美元。理由是如果批评官员受重罚,以后谁还敢批评政府?

政府及其官员无权提起名誉权诉讼

至于政府机构是否可以作为诉讼主体提起名誉权的诉讼?在美国,从未给予政府机构以私法上的名誉权。1923年芝加哥市政府起诉《芝加哥论坛报》诽谤它在证券市场中的信誉,州最高法院判决说:“这一国家的任何最高法院从未认为或表明,对诽谤政府言论的控诉在美国法律中有一席之地。”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某案判决中更进而宣布:诽谤政府的言论不能作为政府的制裁对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曾公布《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规定“对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在报刊上发表后,如果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当在同一报刊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果部分属实、部分不实,被批评者应当在同一报刊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打击报复,则应

受到党纪、政纪和国法的制裁。”

司法机关应做舆论监督的后盾

至于司法机关在舆论监督中的地位与作用,列宁早就指出,舆论监督必须同司法监督结合,以司法监督为后盾,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效果。一旦报刊披露的问题严重到仅靠舆论得不到解决时,就要通过司法机关来起诉和判决。他认为报刊是司法诉讼的重要来源。据此,1919年3月,俄共(布)的八大党章规定,凡是人员或机关,其行为被报刊刊载者,应于最短的时间内在同一报纸上作认真的合乎事实的反驳,或者检讨已经改正的缺点错误。如果届时不见这样的反驳或检讨,革命法庭便对该人员或机关提起诉讼。这些要求表明法院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支持。(当然,到斯大林统治时代,苏联的司法机关已异化为镇压人民的机器。)

反观我国有些地方党政当局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某些司法机关不但不作公民和媒体行使监督权的后盾,反而异化为地方贪官污吏的“家丁”、打手。有些地方党政领导人动辄动用警力,进行暴力拆迁,抓捕批评检举人和上访者。人民司法机关本应是人民维权机关,过去说它们是“专政机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错误说法;不料想现今有的地方司法机关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对人民专政的机关”!

保障舆论监督权,新闻改革刻不容缓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舆论监督的前提,是新闻媒体生存权之所系。联合国大会早在1946年就宣布:“新闻自由当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力维护的一切自由的关键。”在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草拟了两个文件草案,一为《新闻自由公约》,二为《国际更正权》。后来将两个文件合并,称为《国际更正权公约》,于1952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于1962年生效。可以说,新闻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现代民主国家,公民言论能否充分自由表达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但是,中国有些地方党政部门对新闻自由还

重建知识分子的道统正当其时

● 朱正

读了资中筠的《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载《炎黄春秋》今年第9期,以下简称“资文”),心情很是沉重。它回溯了从古代到当代的历史,如实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近几十年里的遭遇,以及现在的处境和表现,这些无一不使人感到沉重。

资文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大致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一是重名节,讲骨气;再一个就是“颂圣文化”了。可是,在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古代,“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

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而现代呢,“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

在这种体制之下,“家国情怀”是不能允许的了。圣天子在上,国家事用不着尔等操心。有人说了一句“政治设计院”,就犯了滔天大罪。天下是你打下来的吗?你有什么资格“以天下为己任”!至于说到忧国忧民,新社会政通人和,弊绝风清,

存在误解乃至恐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就草拟过新闻法,但被当时一位元老级领导人否定,理由是怕被人钻空子批评共产党。前些年有关主管部门的权力者甚至说:“如果制定新闻法,我们就不好管了!”

当下新的文字狱不时重现,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受到打压。而宪法确认的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却极少立法保障(只有人大代表选举法和实际上是限制自由的集会游行示威法)。事关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宪法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专项立法拖延不决,特别是不能有效地维护公权利,激励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监督权力、遏制腐败的积极性。

当务之急是必须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保障公民、社会组织 and 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和出版自由,规范和保障公民和新闻记者行使公权利的行为。为此应废除某些党政部门和地方当局越权擅自制定限制、打压新闻出版自由的那些非法规章、红头文件乃至口头“指令”;尊重和保障编辑、记者的采访、表达和传播等权利与自由,制止某些地方

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煽动暴力和宣传淫秽、泄露国家机密,以及造谣、诽谤、侵犯公民隐私、名誉的言论之外,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总之,要使新闻媒体切实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要通过立法界定舆论监督与名誉侵权的界限,规范和保障公民和新闻记者行使公权利的行为。

前总理朱镕基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的题词曾指出:媒体应当成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要使媒体从单一化的“党的喉舌”转化为“社会公器”。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执政党的政治领导,而在于解除新闻封锁和“舆论一律”的局面,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监督党政权力的工具。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形势大好,并无可忧之事。谁说有可忧之处,那就是否定成绩,刮“黑暗风”,不划为右派分子也得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

“名节”,“骨气”,也是必须批判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自尊心,把他们改造成为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奴颜婢膝的驯服工具。著名数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说:“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患,无形的损失。”(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在知识分子看来,这是隐患,是损失;在权力者看来,这正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思想改造运动,正如资文所指出的,是“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自信。”“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具有自主权。”就这样,精神传统的三个特点消灭了两个,当然只剩下“颂圣文化”一枝独秀了。

“颂圣文化”与时俱进,也有了不同于以往新的表现形式。资文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的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在“知识界”出现了这样的“景观”,就不能不承认,思想改造运动,至少在这一部分人身上,是达到了权力者既定的目标的。

从晚清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清醒地看到中国和外国差异和差距,决心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来批判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陈独秀说,《新青年》杂志的宗旨,“就是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这里,他不直接写“民主”和“科学”,而写外文的音译,因为这不是中国固

有文明中所有的概念,是从外国引进的。资中筠曾经在好些篇文章里表示拥护这种主张。例如,在《重建精神的家园》一文中说:“‘五四’一代新人倡导建立‘新文化’,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一针见血地刺到了中国精神文明的要害和西方文明的精华,从旧文化脱胎到新文化似乎找到了方向。”(《斗室中的天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一文中又说:“以‘五四运动’为高潮,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这两样恰好就是西方文明的精华。有人说还应该加自由和个性解放,我认为民主的概念就包括自由在内,反正不管你说自由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所有这几样东西确实是精华。”(同上书,第45页)

民主的对立面就是专制。科学的对立面就是愚昧。赞成专制和愚昧的人当然不会认为民主与科学是精华,而是竭尽全力抵制和反对。只看鲁迅那一本薄薄的《热风》,就可以看到他们或以国粹为由,或以爱国为由,拒斥“西化”不遗余力。这样的纠缠至今不绝。资文一针见血地指出:“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

抵制“西化”,也有其当代形式。资文就指出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出现的“国学热”。一个代表作是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用新的字句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五四”以来,被陈独秀、鲁迅、胡适、傅斯年等人批得体无完肤的尊孔读经主张,一时间也甚嚣尘上。国学院、国学夏令营,电视屏幕上讲《论语》,甚至办起了让小学生专门去读四书五经的学堂。看他们的广告,似乎外国人也在尊孔读经哩。他们也不再“用国粹”这个名词,而把它叫做“东方文化”或者“亚洲价值观”了。由此推论开去:儒家学说将领导未来的人类文明,21世纪是中国世纪,等等。资中筠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一文中给它浇了一盆冷水:“这话千万不要相信,没那么回事”(前引书,第34页)。在《重建精神的家园》一文中指出:“实际上融为一体的,足以与今天统称为‘西方文化’相对的‘东方文化’并不存在,所谓‘儒家文化圈’连整个东南亚也无法涵

盖,所以这里‘东方’只指中国。”(同上,第6页)更早,她在《东西方国家关系中的文化因素》一文中说:“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东方文化’或‘亚洲文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就不属于同一文化传统。单以‘东盟’国家来说,至少有佛教、穆斯林、天主教和儒家等多种文化传统。另外,这些国家的西化程度也各异。无论如何很难以一种‘亚洲文化’来概括,遑论‘东方文化’。”(《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在《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一文里,她更尖锐地指出“亚洲价值观”“这一口号反对民主、保护腐化的实质”(同上,第306页),用种种新的口号来反对西化的人,其实际目的,就是资文所说的“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揭露这种主张的实质和危害,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资文中说到“一穷二白”这事:“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说得很好,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补充一则资料:有人(好像是李光耀,记不确实了)说过,他不是在白纸上作画,而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雨过去,就会洗刷干净,不留痕迹了。他这话有说对的地方,也有没有说对的地方。有些政策措施层面的东西,例如人民公社,例如农业发展纲要40条,确实像画在瓷砖上的画,消失了。但是还有不少的“画”是人木三分地保留了下来,例如,“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的人口政策,例如对文物和文化的摧毁,特别是对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破坏,对人的素质的损害,这恐怕就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回归到正常的、健康的状态了。

资文中还提出了一个“用脚投票”的问题。这些年里,一些出国留学的学生,学成之后,就留在外国工作,不再回来了。“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人才外流,总是国家的一个损失。她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一文中说:“全球化的过程中人才国际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过去是外国为我们培养人才,回到国内来做贡献。现在中国在很多小孩失学的情况下,那些父母为之倾家荡产、老师呕心沥血培养的最好的重点中小学的学生,那些奥林匹克

数理化竞赛的得奖生,最终都会出去,很少是回来的。这里不讨论道德取向、价值观念等问题,客观现实是,我们闭关锁国几十年,开放以后却赶上为发达国家输送人才,不能不是讽刺。从人口比例上看,会不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这是令人担忧的。”(《斗室中的天下》,第38~39页)有什么办法避免这个人才流失的问题呢?她在《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一文中说:“这里的关键是营造一种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而不是单纯鼓励回国。良好的环境涉及一系列的机制、政治改革和观念的更新,也不仅是对个人个别项目的慷慨拨款能解决问题的。一句话,只有加速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扭转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流向。”(《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第302~303页)这意见太对了。拖延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不会有创造力得以发挥的环境,一些人就只好选择“用脚投票”了。这环境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工作条件的问题。举一个许多人都知道的例子:物理学家李政道,是在美国那样的工作条件下,才取得了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而他的老师、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留在国内,却什么成绩也没有留下来。李政道没有回国,是得还是失呢?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嘛。

我以沉重的心情读完了资文,又以沉重的心情记下了阅读中的这些感想。不过也不想泄气。资文结尾之处,语重心长地写了一段话:“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这样努力吧。

(作者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 萧功秦

《炎黄春秋》今年第10期发表了李维民先生《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一文，对拙文《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革命》（今年第4期）提出批评和商榷。李先生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原因，并非我所指出的“在危机沉重压力下，清王朝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变革”，而是因为清末改革“搞得太晚，太慢，太假了”。恰好拙著《危机中的变革》一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的主题即是谈清末改革，我为该书写的《再版序》解释了为什么专制帝国的改革难以成功，可以作为对李维民先生批评的回应。相信这场一百年前的充满矛盾与困境的、复杂而丰富的改革运动，会引起当代国人浓厚的兴趣。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学术界，在论述清王朝变革失败的问题上，以往占主流的观点是：保守的清王朝统治者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又遭受了八国联军入侵的灾难，然而，此后的清末统治者却并没有改革的诚意，在巨大危机压力下，才不得不进行虚假的新政。日俄战争中，由于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统治者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实行预备立宪。由于清王朝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使国人失望，于是立宪派发动四次请愿运动，统治者仍然无动于衷，此外，清廷还将民营股份公司收为国有，破坏了人民应享有的筑路权，于是，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不受掠夺而奋起抗争，发起保路运动，并最终转向排满革命。在以往的主流叙述中，清末改革似乎就是一场假改革。

然而，我的观点，正好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对立。多年以来，根据我对清末变革史的研究，事实上，戊戌变法是一场由涉世未深的青年皇帝与一批同样缺乏官场政治经验的、充满书生激情的少壮变法人士相结合而发动的不成熟的激进改革。

严复在对变法运动失败寄予深厚的同情的同时，他也指出，康梁改革“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可以认为，导致变革悲剧的激进主义，恰恰可以解释为保守的积重难返的官僚体制的因果报应。它引起了保守派的全面反动，并由此引发庚子事变的奇耻大辱。

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后事实上也确实成为清末新政的最积极推动者，说她没有改革诚意实在是太冤枉了她。她在庚子后几乎丧失了原来的固执与自信，经常以泪洗面，她在召见张謇入对，张謇问她“改革是真还是假”，她回答说，“因不好才改良，改革还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说？”当张謇谈及改革中的腐败与人心散乱时，她也百感交集随之而哭。平心而论，她对新政的期待与改革真诚，是出自于对满族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忧虑。

应该说，晚清新政也确实有着重要成就。新政已经有了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新政主持者制定的各项现代化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长达11年的清末新政给中国带来的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比起出师未捷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一位1906年访问中国的日本学者就曾对北京市容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出“即将超过东京”的惊叹。丁韪良、李提摩泰对新政的由衷赞美与乐观，固然会使我们后人觉得有点幼稚肤浅，然而，正是从这些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人眼中，新政时的中国变化之大，与它僵化不变的过去相比，确实足以令他们欣喜了。

新政早期阶段可以称之为开明专制主义时期，虽然它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较弱，但却保持着王朝权力对改革进程控制的有效性。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第二阶段，中国人对日本立宪的误读，对清廷构成一种强大压力，造成了从开明专制的集权模式向激进的立宪分权模式的急剧转变。



慈禧太后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

虽然，从长远来说，中国现代化的走向是政治民主，但在现代化改革初期，这一分权立宪转变恰恰是这场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对帝制不满的人们，从此可以借助于资政院与谏议局的平台，持续地发起激进的速开国会运动，冲击着政府所剩无几的统治权威。预备立宪不但没有增加统治者希望的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反而强化了统治者与受治者之间的认同分裂，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扬汤止沸，而且是火上加油。

保路运动发生在距今正好一百周年之前。事实上，如果不带有偏见，必须承认，后发展国家修建铁路，商办铁路政策是很难成功的，清廷的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政策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合理经济政策，盛宣怀与四国银行签订的铁路贷款，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且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优惠低息的商业贷款，并非什么卖国条约，然而，由于排满民族主义的冲击，使这一原本合理的现代化铁路政策却被解释为卖国之举，并“歪打正着”地成为一场不成熟的革命的导线。

如果说，以往的主流话语从反满民族主义或阶级斗争范式来看待变法与新政，那本书的侧重点，则是对传统官僚帝国面对变革中矛盾的应对之道的冷峻审视，这一视角对正在进行新的变革的21世纪的改革者，无疑会提供更直接的启示。

二

人们发现，一般而言，一个专制集权的帝国通过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成功的概率并不很高，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大清帝国，均是在承受西方挑战与民族危机的重重压力之后，先

后陷入改革的泥潭无以自拔，并被改革引发的革命所推翻的。非西方的传统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变革似乎是一个特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但避免了革命，而且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中国之后，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然而，从结构上来考察，日本的成功，恰恰在于日本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传统日本是由二百多个独立自主的藩国构成的、类似于西周分封制的国家。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集权帝国从改革走向革命的极高概率性，其原因是什么？传统国家的集权体制与分散的多元模式，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我发现清末的改革失败并引发清王朝的崩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末改革的悲剧在于，当统治者在臣民中享有比较充足的权威资源时，统治阶层总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当帝国被列强打败并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时，例如，当清帝国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如此严重的危机之后，才会在焦虑感的压力下，进行“狗急跳墙”式的变革。然而，此时的王朝统治者或者由于缺乏审时度势的改革人才，或者由于战争失败后的民族危机加深，而丧失了统治所必需的权威合法性。一旦在危机状态下进入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号召力，并成为革命的催化剂。由于帝国统治者缺乏最起码的权威资源来对时局进行调控与整合，只会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与危机，于是一切为时已晚。

其次，帝国改革之所以困难，还在于人才缺乏。在专制危机条件下的改革，远比承平时代更需要高明的政治领袖，更需要一个能阔视远想的强势人物来引导国家渡过风险，并把国家引向有希望的未来。这样的政治家应该具有足够的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国际经验。然而，旧帝国官僚体制习于所安的保守性，似乎总是对这样的人才，起着逆向淘汰的作用。在危机到来以前，以“承袭旧章”为主旨的帝国体制，早已经把此类人士当作异己者过滤一空了。能在这种体制下生存下来并游刃有余的，恰恰是平庸之辈。当统治者把目光转向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并让他们担当改革大任时，此类人却没有最起码的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经验，这构成专制集权帝制改革的另一个两难命题。

从中国清末的政治格局来看，当中国最需要彼得大帝式的统治者时，无论是光绪皇帝，康梁变

法人士，还是庚子事变后颇有真诚改革意愿的慈禧太后，或两宫驾崩后执掌王朝大权的摄政王载沣，都根本无力承担危难中的改革重任，更不用说中国无法应运而生伊藤博文那样的政治家了。慈禧太后出于第四次垂帘听政的权欲，居然让明知无能的载沣执掌大权，这位摄政王不但判断能力差，意志力薄弱，外交知识贫乏，智力平庸，而且还出生于一个神经很脆弱的家族。根据这个家族后人写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摄政王一紧张起来就会口吃。当慈禧太后突然撒手人寰时，帝国的命运就已经可想而知了。

第三，清王朝的改革战略选择确实存在着重大失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1905年以前的集权的开明专制模式更为合适，而在日俄战争刺激下而进行的预备立宪，恰恰是当时主流士大夫官绅的一种观念误读后的政治选择。而这种分权立宪在政治认同已经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只能是雪上加霜。预备立宪导致大众的政治参与欲望突然膨胀起来并得以合法地与清政权分庭抗礼，而脆弱的清政府对此已经无力控制。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君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发育，是在社会共识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分阶段扩大的，而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参与扩大，则是在民族危机与社会不满日益强烈的压力下，被迫地扩大的。而危机压力又恰恰造成社会认同日益分裂，扩大政治参与不但不能达到消解社会不满的功效，反而会对这种不满起放大与传染效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渠道却成为社会不满者攻击执政者的合法场所。危机中的统治者对此几无招架之力。

当然，清朝崩亡决不是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这一点所能解释的，它是特殊条件下的多种因素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统治者合法性危机下进行的现代化挫折，改革综合征引起的社会不满，传媒的急剧发展引起的传感效应，在关键时期统治者新旧交替出现的治理能力整体水平低下，满汉矛盾与排满民族主义在军人中的传染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被革命者利用来传播革命种子。

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大多数集权官僚的专制体制一旦进入改革，反而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陷入进退两难，并难以避免被革命推翻的厄运？

概括地说，一元化的专制体制比起日本多元

体制来说，一旦在改革中陷入危机，其内部大一统的结构，往往缺乏应对危机的多元调适能力。真正能实现稳定变革的社会，其内部需要一种“多元整合机制”。即一个社会内部各要素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的整合。更具体说，对变化的环境的有效适应，除了政权力量或国家管控与干预力量之外，还应有地方、个人、社会伦理、意识形态创新力、民族凝聚力、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流动方式等等，这些文化、思想、法制、教育、社会领域的多元因素，均在无形之中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整合，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减轻了中央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的难度。它们在支持、协助国家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方面，功不可没。

人们可以发现，在明治转型期的日本，日本社会就是由许多小规模、多元的、自治的细胞构成的大共同体，上述多元整合机制，是具有自治传统的日本藩封体制先天所具备的。当中国的科举制持续压抑着创新人才，使中国缺乏足够应对新环境挑战的社会精英时，而在日本，不受大一统体制约束的武士阶层中，却能层出不穷地涌现出现代化改革所需要的新式精英，其中有对日本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海运王、留学生、政治家与精英人物。例如岩崎弥太郎、板垣退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均出身于各藩的武士家庭，正是这种多元体制培育了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他们转化为现代化的精英。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多元整合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地方与民间个人具有多元的微观试错的机会。地方、民间社会与个人，在国家之外，自主地面对着环境压力，不断地进行着微观的调适，国家作为引洪主渠之外，社会中的多元个体，则发挥着毛细血管般的涓涓细流的作用。而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恰恰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社会内部先天缺乏的。如果说，日本至少有二百多个藩国与无数的武士这样的自主细胞，作为试错主体，那么，不幸的是，清代的专制中国，慈禧太后则成为全国唯一的试错主体，她的权欲使她对清王朝的崩溃要负最大的责任。洋务运动的若干现代化成果之所以获得，只不过是湘军精英转化过来的沿江沿海封疆大吏们，运用了从大一统专制集权体制中截留下来的可怜的一点自主权而已。中日整合机制之区别，中日改革命运之不同，由此

可以得到解释。

于是,缺乏“多元整合机制”的中国就陷入了如下恶性循环:危机促成了迟来的改革,迟来的改革又在危机压力下越来越加大幅度,从而又进一步导向更深重的危机。转型期社会矛盾比改革以前还要多并还不断累积,社会失序就会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不满,随着各种矛盾的“发酵”,这时,“革命”便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心理诉求”。在中国,既然满族统治者是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族,这种不满就会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满人的恶”,要清除这种恶的根本的手段,就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

到这时,陷入改革泥潭的清王朝,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会陷入所谓的“沙堆效应”:哪怕如同沙粒般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加之于高高的沙堆上,就会使庞大无比的沙堆在连锁的滑坡反应中突然崩塌。

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乌合之众的、无组织、无领袖、无准备、一盘散沙式的各省新军一旦起义,就会出乎意料地取得成功。一旦发生革命,处于充满仇视的汉人的汪洋大海中的满族人,如同处于孤岛般充满恐惧,因为旧势力自信心太弱,几乎在失去抵抗力的情况下就自我解体。例如,辛亥起义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云南省,全省新军起义胜利时,因革命而战死者只不过一百多人。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统治者如此弱不禁风,再也没有一场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样,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满地的烂桃子一样轻而易举。与其说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中止了清末改革,不如说是清末改革自身的失败,是以排满革命的方式作为表现形式的。

历史的吊诡并没有结束,迟来的专制改革必将导致同样不成熟的革命。虽然在后世看来,辛亥革命具有推翻帝制的伟大历史意义,但革命“不留神”而成功,而“乌合之众”般的无组织的辛亥革命者,注定无法重建有效的新秩序,于是不得不让权于自己的政治对手袁世凯,由此也可以理解了。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事实上,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更为多灾多难时代的开始。此后的民国内阁危机、二次革命与内争,军阀割据与统一国家的日益碎片化,都可以从晚清帝国改革失败中得到解释。

百年以后的今天,专制帝国改革之所以比多

元传统国家改革更难以成功的原因,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大清王朝体制下,中央王朝国家是唯一试错主体,而且,王朝国家受儒家官学意识形态教义束缚更大,人们更难从这一教义中摆脱出来。受官学化的儒家正统观念控制的官僚角色是固定化的,他们人数众多,却只会按一种方式思维,非如此他们一天也无法生活于官僚群体之中,其中很难产生改革所需要的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此外,中国的大一统官僚体制又对全国进行着严密有效的控制,使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被它视为非法的地方的或民间的反应。民间与地方的自主能力无法在体制内发育出来,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强有力地抑制社会的自主试错与创新,王朝体制拒绝任何微观领域的试错,这就形成强烈的路径锁定状态。任何温和的创新与变革尝试都会被压抑在萌芽状态,当问题越来越严重,百姓越来越不满,统治者再想进行真诚的改革时,一切已经为时太晚,而受治者们则认定,只有根本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更为不幸的是,而这样的革命本身又会带来另一种悲剧,即弱势国家的悲剧。一场百年前的新政改革的失败,以及革命的两难,对于丰富改革政治学的历史经验资源,应该说也有启示意义。

几年前,记得一位青年研究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事实,也不仅是知识,而是要培育我们一种知人论世的能力。我终于了解到历史是训练、培育我们思维的一种最重要方式。”善哉斯言,历史就是要培养我们“知人论世”的能力,这句话道出了历史学生命力所在,我想,这也应该是新政治史的目标与努力的方向。

清末变革以悲剧告终,并且是20世纪更大悲剧的起点,只有悲剧时代的人们,才能对人生与社会产生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是那些幸福而质朴的小民族所不可能有的珍贵精神资源。民族的苦难,可以成为史家研究人性与历史的最好的原材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代不幸可以造就深刻的史学家与思想家。清末新政只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开端,以后有更多的悲喜剧等候着史家去发现其意义,去展示自己的思想穿透力,时代不幸史家幸,请记住,我们民族就生活在历史的富矿脉带上。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 谢承年

湖南零陵地区(1995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7~9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委根据党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地县区乡成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简称“处遗小组”),书记亲自抓,由一名副书记任组长,下设安置组、组织处理组、政法组、信访组、综合组,共抽调1380多名工作人员,从1984年开始,历时两年半时间,对全区“文革”杀人事件进行了逐个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对遗留问题作了严肃处理(简称“处遗”工作)。我作为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文字综合的执笔人,想把时隔20多年且如今档案中难以寻找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可惜我当时保存的一大捆资料,包括一些珍贵资料,被人当做废纸卖掉了,这里凭自己的记忆,对当时的情况作个简要的记叙。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惨剧

调查表明,零陵地区杀人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五:

一是错误估计形势,轻信谣传。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总认为阶级敌人“火烧冬茅心不死”,随时随刻梦想复辟变天,伺机反攻倒算,人为制造恐怖气氛。1967年8月上中旬,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

组”(当时当地最高领导机构)先后两次召开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会议,主要领导把会上反映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作了引证,如“‘四类分子’要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要把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土要回去”等等,强调狠抓阶级斗争,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要狠狠打击。各区社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时,不同程度扩大敌情,渲染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有两个公社以“阶级敌人报复杀人”(不实)为由,杀害4人。此后,全县到处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全杀光,中农杀一半,地富当骨干”,加之在这段时间,有四个区搞出7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更加紧张。8月17日,清塘区造反派头头主持召开千人大会,动员部署杀人,说:“阶级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会后,开始成批杀人。在清塘区的影响下,杀人风迅速蔓延开来。调查证实,前面所谓“‘四类分子’先杀党,后杀干”之类的话,只是传闻,并无证据。

二是法制遭到严重践踏。当时党政机关瘫痪,无政府主义泛滥,极“左”思潮盛行,无宪法和法律可言。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连国家主席也不能自保,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当有些干部和群众提出“杀人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依法办事”时,有的领导干部回答:“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道县柑子园公社公然挂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因有人指出“最高”二字有夺中央机关的权之嫌,后来才把“最高”改为“高级”。工作组同志询问一个当时杀人凶手为什么杀人,这个凶手竟然说:“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江华的堂弟就是在“文革”杀人时被杀的。江华同志1982年回家乡零陵地区视察工作时,针对“文革”杀人事件说:“这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三是把杀害“四类分子”看做是革命行动。从杀人动机和出发点看,全区杀人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杀“四类分子”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阶级敌人复辟,保卫毛主席打下的红色江山——这是当时最时髦最响亮最革命的口号。宁远县有个农村女青年,把自己的婶娘(地主分子)抓来杀掉。有人问她:你是你婶娘一手抚养长大的,你怎么杀得下手?她回答:我要革命!据该县“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说,这个女青年凶狠残忍的表现远近闻名,年纪三十好几还没有嫁出去。零陵县马路街公社有个大队治保主任,他参与组织策划杀人,主张斩草除根,把“四类分子”和子女统统杀掉,说:“把‘地富反坏’全部杀掉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四是派性斗争引发所致。当时,“道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与“道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革联”)这两大派组织斗争激烈。“革联”抢了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据守二中,用武力控制县城。“红联”称“革联”抢枪是“反革命政变”,并从县委机关大院退居到农村。随后两派发生冲突,“革联”开枪打死“红联”两人。“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进而宣扬“武装部枪支被抢了,公检法不管事了,阶级敌人活动猖狂,贫下中农要吃亏了”,“要采取措施,先把敌人管制起来,对个别坏的要发动群众斗争处理几个”,由此引发杀人事件。

五是领导未予制止或制止不力。在杀人事件中,有怀疑的,有犹豫的,有抵制的,也有顶着“阶级敌人的保护伞,‘四类分子’的孝子贤孙”的骂名挺身而出保护的。道县有个村支部书记,把本村50多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锁在村祠堂里,安排人员站岗送水,把他们保护起来没有遭到杀害,这些人非常感动,称呼村支书为“再生父母”。但是从调查情况看,这种现象不多见,总体上是领导干部未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全区杀人面广、被杀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就是明证。道县在驻湘支左部队47军明令禁止杀人前,主要领导没有讲过制止杀人的话,没有采取制止杀人

的措施。当一些干部汇报杀人情况,请求他们采取措施制止时,他们是这样说的:“道县的问题就出在枪杆子上,杀几个‘四类分子’是小事,军分区领导和47军代表来了,把枪收缴了,武斗制止了,一切都好办了”。“现在机关干部都走了,枪也被抢了,公检法也散了,我有什么办法,哪里管得了那么多?”这个县有个大队的民兵把本村24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关押起来,杀与不杀犹豫不决,民兵营长请示公社主要领导,回答是“分子与子女要区别对待”,结果把“分子”杀了。

江华县“抓促小组”组长、县武装部政委主持召开县“抓促小组”成员会议,针对本县出现的杀人事件,讨论制定了“五条意见”,内容有:对解放17年来一直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而不能压制、指责和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主持会议的领导将会议通过的“五点意见”,以《特急电报》向零陵军分区党委汇报,请求指示,但后来未见答复。

8月21日,零陵军分区某副司令员与6952部队某连长到道县调查杀人问题时,他先后三次讲话,没有明确提出制止杀人。他们返回军分区后,将调查情况用《社情电报》报告了47军。8月26日,47军以电报(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形式转发零陵军分区关于道县杀人问题的《社情电报》时指出:“我们认为,对‘四类分子’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与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能争取‘四类分子’子女。”47军的《电报》在各县传达以后,不少地方把《电报》精神理解为“对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可以杀”。从各县杀人情况看,杀人时间集中在当年9月(道县除外),也就是说,47军开始发出的电报,没有起到有效制止杀人的作用。8月29日,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采取措施制止杀人,9月中旬基本得到制止,其他县杀人事件到10月底陆续结束。零陵县零星杀人持续到第二年7月。东安县于1968年7~9月,采取刑讯逼供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22人。

二、杀人事件的善后工作

1980年12月6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来零陵视察工作,当地委书记邓有志汇报零陵地区“文革”杀人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好时,胡耀邦同志说:“1967年7、8、9三个月,全国不少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康生、谢富治他们搞起来的。现在已经13年了,这样的事情不要声张了,处理完了就算了,慢慢让它平息下去。对没有处理的要处理完,主要是把受害者安排好。”地委书记说的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好”,指的是按照省委1979年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问题的5号文件精神,做了大量工作。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不断深入人心,被害人遗属上访越来越多,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地委认为,“文革”杀人问题涉及面广,牵涉人多,情况复杂,而且岁月已久,根据党中央关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总目标,必须做到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按照地委的指导思想和“处遗领导小组”以及道县有关领导的要求,我执笔起草了《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意见》,经省委批复,形成省委[1985]12号文件。湖南其他地市“文革”期间不同程度发生杀人问题,省委批转这个《意见》,要求各地市贯彻执行。根据省委12号文件精神,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安置遗属。首先,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发给遗属“平反通知书”,从政治上为“文革”中被错杀人员平反。其次,经济上给予补偿。以县为单位,统一标准,发给遗属抚恤金;被抄抄的财物,坚持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根据中央办公厅[1984]24号文件精神,按财物当时价的四分之一给予补偿;对被迫外逃人员,以乡政府名义写信,欢迎他们回来,发给安家费,按规定划给责任田、责任山、自留地,无房住的补给建房费,所劳动工分未参加分配的按当时分配额补偿;因杀人遗留的孤老孤残人员,由民政部门每月定期发给生活费;生活特别困难的,发给困难补助费。道县四马桥乡有个遗属,“文革”杀人时被鸟枪打伤,身上中了八颗铁砂弹,一直留在体内,平常隐隐作痛,工作组发给他1000元去医院做手术,使

他解除了长达18年的痛苦。通过平反和安置工作,使遗属精神上得到抚慰,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第二,处理责任人。据调查,全区参与策划、部署、指挥杀人者及凶手近两万人,按《刑法》有关规定,属故意杀人,应判重刑。对于这一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如果处理过多过严,势必产生不安全因素;如果处理太少太轻,一方面遗属反映强烈,另一方面与当时全党整党关于对在“文革”中动手打人的党员给予必要的处分的规定,发生矛盾,也就是说,打了人,给处分,杀了人,可以不给处分,这同样会产生不安定因素。为此,经过认真研究,在对杀人责任人处理问题上,制定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和“组织策划指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受‘左’的影响者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的原则。具体是:为首在公社以上范围内组织策划部署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挟私报复,谋财害命,以夺人妻女为目的杀人或强奸轮奸杀人的;奉命为首组织策划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上级明确提出制止杀人后,仍然为首组织成批杀人的,追究刑事责任。凡追究刑事责任的共产党员,一律开除党籍。为首部署策划杀人和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奉命组织策划杀人,情节后果十分严重的;积极参与策划、批准和亲自动手杀人的,奉命杀人或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一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对奉命组织策划杀人不是为首,奉命充当凶手,能认罪认错、取得群众谅解的,不开除党籍,表现好的免于处分,对其中不认罪认错、表现不好的,给予党纪处分,包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杀人后入党的,清除出党,但对当时未成年、属从犯、共同杀人不是主犯的,被迫杀人情节较轻,能认罪认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表现好,取得群众谅解的,保留党籍,给予其他党纪处分;杀人后转干和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取消干籍,撤销职务;凡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不得进入领导班子和安排在要害部门工作。

按照上述原则和规定,全区共追究刑事责任

201人,其中判无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对挟私报复、杀人后强奸轮奸其妻女的判处死刑13人,不在此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600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160多人,整党中不予登记340多人,撤销职务420多人。从处理的情况看,至今没有发现错案,证明这次处理符合省委12号文件的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这里顺便提及的是,零陵地区“文革”杀人期间,地、县两级首先是地方部队后来是支左部队主持工作的,应该说他们对杀人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当事人已调离零陵地区,我们把有关材料抄报所在部队处理,记得1985年底广州军区整党办公室两位军人来零陵,在军分区有关同志陪同下,听取了我们的情况介绍和意见,以后怎么处理,不得而知。

第三,愈合伤痕。在“处遗”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个非常重要但难度很大的工作——愈合伤痕。当时,一些群众和责任人对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做法不理解,想不通,说“杀几个‘四类分子’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这么做是‘长阶级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个别的甚至说悔不该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斩尽杀绝。而一些遗属要求开追悼会,给死者披麻戴孝,重新垒坟立碑,提出多抓重判,甚至杀人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认为,能否消除积怨,愈合伤痕,事关“处遗”工作的成败。为此,我们花大气力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学法。一方面举办责任人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使他们懂得,“文革”杀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宪法和法律所不容许的,一定要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另一方面组织遗属学法,引导他们看清楚,“文革”杀人是在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能冤冤相报,把怨恨传给下一代。

二是坚持疏导方针,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责任人,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清除“左”的影响,主动认罪认错,取得遗属和群众的谅解,做遵纪守法的公民。对遗属,首先对“文革”给他们造成的不幸表示同情,引导他们把账记在“四人帮”身

上,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鼓励他们向前看,顾大局,消除积怨,和衷共济搞四化。我们还召开遗属和责任人一起参加的大会,双方代表典型发言,谈认识,挖根源,表态度,进一步拉近他们的距离。

三是实行“三包”责任制,即由村组干部包人、包做思想工作,包帮助他们开辟劳动致富门路,一些重点对象由县区乡领导包干,促使遗属思想情绪稳定下来。通过这些工作,较好地达到了消除积怨、愈合伤痕、促进团结、和衷共济搞四化的目的。道县营江乡车边村遗属田志苟,“文革”中父亲被杀,“处遗”工作为他父亲平了反,被查封的财物得到了补偿,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理,还帮助他经营一个渔业生产技术项目,他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摆酒吃团结饭,还招待放专场电影。他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我们都是受害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后要互相体谅,加强团结,共同努力把车边村建设好。”这一年,他被村民推选当上了村长。

三、艰辛的信访工作

我深深感到,零陵地区“文革”杀人就像撕裂的一道伤口,很难在短时间内愈合。尽管我们做了大量艰苦、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开展“一帮一”和“交朋友”活动,一些遗属的心依然没有平静下来,他们不断上书上访。省委12号文件传达贯彻后,一些遗属对其中“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意见很大,说“什么粗,什么宽,什么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正在这时,道县有个遗属得到一本上海杂志,里面刊登了一篇关于道县“文革”杀人的文章——《疯狂的七月》,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往伤口撒盐,他们的情绪又一次爆发出来,奔走相告,互相串联,赴省赴京上访,强烈要求严惩凶手。

1985年9月中旬,道县102个遗属到北京上访,他们先去国办信访局,然后去中办信访局,后来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接着要进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被中央警卫局劝退,第二天清晨,“美国之音”报道了此事。几天后,我们接省委办公厅通知,到中央办公厅汇报处理遗属上访问题。那天晚上,我们一行6人(地委分管副书

记、分管副秘书长、地委落实政策办主任、地区检察院分管副检察长、我和道县县委分管副书记)被引进中央书记处一个小会议室,中办副主任周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作了关于做好遗属上访工作的讲话。我们按照周杰副主任的讲话精神,认真进行了研究,在当时整党工作繁忙、工农业生产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努力做稳定遗属的工作。

10月上旬,道县84个遗属到北京上访,他们聚集在胡耀邦总书记住地附近的街道上,堵塞交通四个多小时,中办信访局和国办信访局的同志告诉我们,耀邦同志刚刚几天前搬家,连他们也不知耀邦同志的新住址。我们从遗属口中得知,道县有300多人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给遗属透露耀邦同志的住址,同情和支持遗属上访。我们随即确定几个干部,硬是像瞎子摸鱼一样寻找道县籍人做遗属的工作。我们苦口婆心把遗属规劝回县后,再次被通知进中南海上次那个会议室,基本上还是那些人,增加的是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监察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按照周杰副主任的要求,我们主要汇报了“处遗”的政策和遗属的要求及处理情况,最后周杰同志从广西“文革”武斗杀人,讲到内蒙古清查“人民革命党”杀人,介绍他们处理的经验,要求我们从大局出发,从首都的安定出发,认真贯彻落党的政策,切实做好“处遗”和遗属稳定工作,为明年开始实行国家“七五计划”创造良好环境。

10月中旬,我们发现一些遗属搞串联,准备再次集体赴京上访,我们在抓紧做稳定工作的同时,向省委办公厅报告了这一动向。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极其重视,连续两次打电话给地委书记唐盛世同志,要求迅速做好工作,把遗属稳定在当地。当晚,唐盛世书记在道县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所有地委副书记和道县县区乡党委书记参加,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钟,接着连夜回到各自岗位,做劝说工作。上午11时召开碰头会,发现好些人眼睛布满血丝,有的没有吃早餐,有个工作组的干部因长时间精神紧张和工作劳累,昏倒在路上。通过工作,遗属较好地稳定下来。

1985年10月中下旬的一天,省委书记毛

致用在省委常委会会议室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处理零陵地区“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当我们汇报当时道县主要领导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杀人时,毛致用同志站起来说:“一定要处分那个×××,不然遗属有意见,上访稳定不下来!”当汇报公安部《啄木鸟》杂志打算刊登道县“文革”杀人的文章,可能引起遗属思想波动时,会议确定由省长刘正负责,向公安部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请他们不要刊发这类文章(《湖南日报》一位资深记者曾向我索要资料,打算写一部约30万字的《道县“文革”杀人传奇》,也因此作罢)。当汇报全区安置遗属的任务很大,还需要必要的经费时,当即表示增拨200万元。

此后,随着进一步的工作,全区特别是道县的遗属逐步稳定下来,并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作者系湖南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欢迎订阅2011年 《同舟共进》月刊

邮发代号:

46-56

专题策划

·聚焦“既得利益集团”·

深化改革要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
再谈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既得利益阶层”与“利益受损阶层”
从毛泽东读书笔记表达的忧虑谈起

既得利益集团何去何从

清朝: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

议政论坛

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

我们的社会信任是否出了问题

诚信是立人立国之本

前沿观察

南海角逐宜顺势而为

往事历历

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反省

人物春秋

陈独秀:龙性岂易驯

灯下话旧

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在1964

有关钱学森的假故事

文化广角

论文化在政治之上

“打江山”与“坐江山”的逻辑

——走马中原看历史(札记之一)

舟边絮语

忽然想到——讲一回真话

那些因名获罪的人们

黄苇町

周瑞金

王贵秀

肖滨

刘山鹰

陶短房

茅于軾

杜平

钟沛璋

赵刚

杨天石

王开林

冯锡刚

叶永烈

梁晓声

鄢烈山

陈四益

孙玉祥

2011年起可直接汇款到本刊发行部或到当地邮局订阅

每期定价8元,全年定价96元(港澳地区240元)

2009年合订本定价108元(含邮费)

2010年合订本即将推出,定价108元(含邮费)

地址:广州市明月二路66号同舟共进杂志社 邮编:510600

电话:(020)38308908

传真:(020)38308918

四渡赤水评价考

● 夏宇立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土城作战失利，渡江北上入川受挫。为了摆脱严峻的不利局面，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处的赤水河上，由东至西，由西至东，来来回回作了四次横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渡赤水。

我们先来回眸其主要经过：1月29日，中央红军退出土城战斗，在猿猴场到土城之间，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开进。2月2日，其右纵队红一军团围攻叙永县城不克，撤出战斗，继续西进。7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集中。接着，进行了休整和整编。由于土城作战的严重伤亡，为了维持战斗力，部队缩小编制。

2月中旬，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简称，下同）发现川军和滇军分由南北方向压来，留驻不利，决定回师东进，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寻机歼敌。18日，中央红军遂由太平渡、二郎滩开始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入贵州。24日，进占桐梓。26日攻占娄山关，击溃黔军两个团，并于27日击溃黔军六个团，再占遵义。28日，击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歼其一部。遵义战役“计共俘（敌）人在二千以上，（缴）枪一千以上”，（《野战军总司令部关于遵义战役战绩的通报》，1935年3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遵义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3月4日，中央红军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5日，中央红军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敌人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

山准备突击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之周浑元纵队未果。接着，中央红军主力进至西安寨、泮水地区，再次寻歼周浑元部未果。此时，中共中央和朱德、毛泽东进一步确定了“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的战略方针，继续部署对敌作战。就在此时（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建议，首先得到了朱德的赞同，并在随后的军委会议上，与会绝大多数人不顾毛泽东的反对，一起表示支持，会议作出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然而，会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又说服了大家。11日，军委遂以朱德的名义颁布命令“不进攻打鼓新场”。12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毛泽东、王稼祥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15日，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起对薛岳兵团主力周浑元纵队作战，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敌三个师猛攻。红军血战终日，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场，并于次日转兵西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一次进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川黔滇边部队向川南进击。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以红军一个团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而以主力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即四渡赤水），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计划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破敌军封锁。当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驻守该地的周浑元纵队发起攻击，虽经激战，仍未获进展。27日，中央红军改以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红军东向并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南进至乌江北岸。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接着，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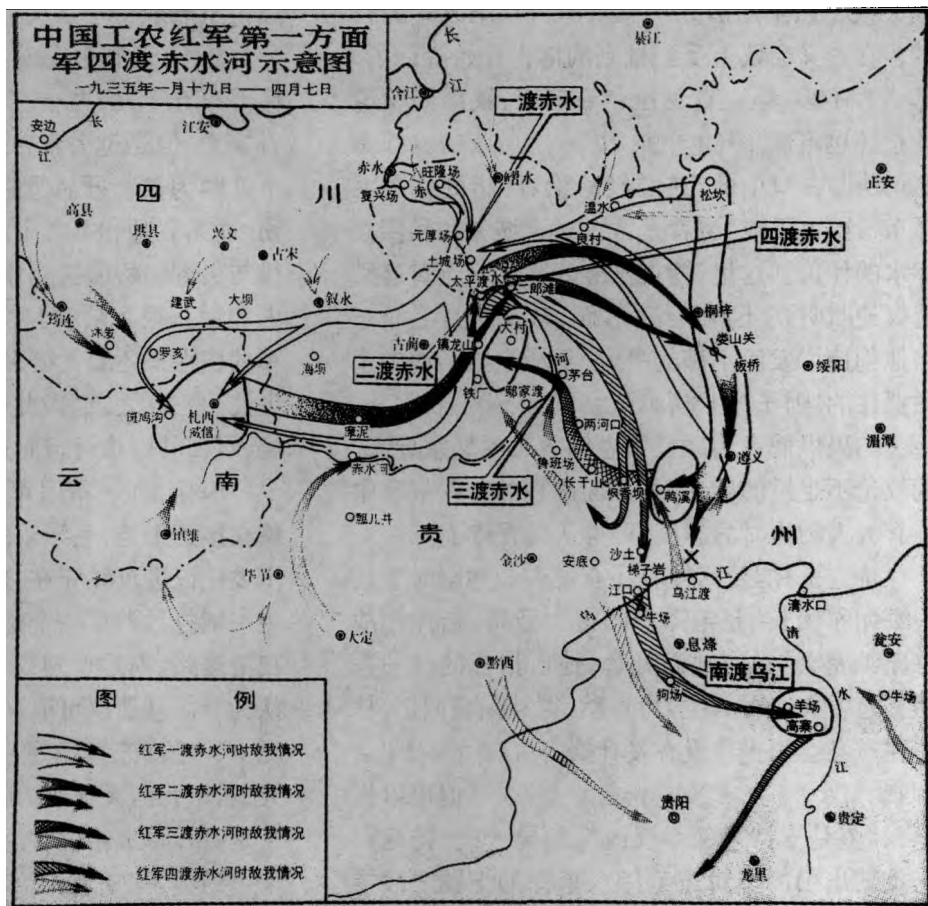
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向贵阳逼进。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把蒋介石的“追剿”大军甩在乌江以北。

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一部。6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于贵阳附近平场以南地区,全力伏击薛岳部两个师未果。此后,中央红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进军云南,于27日进入昆明西北地区,接着转兵向北,5月9日渡过金沙江。

以上所述,这就是四渡赤水前后的大致经过。

通观四渡赤水的全过程,已经很清楚,处于劣势的中央红军在数倍于己的敌军之中艰苦转战,并最终摆脱了敌军,这的确了不起,值得大笔褒扬赞颂。

然而,话又说回来,当年红军在转移中,面临强敌的围追堵截是经常的,而红军通过自己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来实现自己的战略转移目标和任务,又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只能面临失败的结局。而像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这样成功摆脱敌军的例子,在各地红军中也不胜枚举。比如,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孤悬长江以南,深陷敌军丛中,还不是靠自己千回百折地转战,最后长征到达陕北?徐海东等领导指挥的红二十五军是一支不足三千人的小部队,还不是靠自己灵活机动和英勇顽强,打得强敌靠边走,第一个进入陕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还不是以无坚不摧的意志和毅力、始终高敌一筹的谋略,迭挫强敌,完成长征的?所以,胜利完成长征的部队都一样,都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都有一段不同凡响的征战历程。况且,上面所说的三支红军部队,在长征中



四渡赤水示意图

同中央红军比较,显然还都有着两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其一,损失相对较少;其二,沿途都还创建了新的根据地。

此外,笔者在研究四渡赤水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对四渡赤水倍加尊崇,极力神化。例如,有的将其称为“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5 页);有的称其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5 页)。还有那 60 年代唱红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征组歌》,其中歌词气势如虹:“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不仅绝不恭维,甚而批评有加。亲眼目睹中央红军土城之

战失败，以及随后几次三番的行动难以达到目的，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博古开始说话了，其语言不多，但一针见血：“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转引自《毛泽东传 1893~1949》，第346页）博古口中的“狭隘经验论者”指的就是毛泽东，这“也不成”也就是博古对土城失利和四渡赤水的评价。这里，博古虽然表露了一点对遵义会议遭批评的不满情绪，然而，却又正是毛泽东给他创造了发泄不满的平台，毛泽东给了博古企图抓住的“辫子”和“痛脚”。

如果以博古为原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议论不足道的话，那么下面出现的一些战事中的有关人物当时的态度，可得认真看待了。

首先是林彪，紧接着还有他人。林彪时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是毛泽东的得力爱将，指挥作战思路缜密，常常有独立见解，他所指挥的红一军团又是中央红军的主力。虽然，据聂荣臻回忆，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什么言”（《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但可以肯定，林彪是支持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人，支持毛泽东重新出山的。对于毛泽东指挥的土城之战惨败，目前没有发现林彪的议论，但是土城之战中，让林彪率部颠来赶去，部队伤亡惨重，也可以估计到林彪当时心里也是够窝火的。当然，让林彪公开直接表示不满还有一个过程，然而，这个过程来得并不漫长。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兵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唯一的一场作战胜利，毛泽东多少减轻了身上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卸下了兵败土城的包袱，进而情绪上有些激动和陶醉。在胜利面前，他欣然命笔，吟诵了一首著名的词章——《忆秦娥·娄山关》，其中的妙句佳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失为千古绝唱。

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正式恢复军内职务。在胜利鼓舞下，毛泽东希望再打一个大胜仗。于是，次日，朱德、毛泽东发布了《关于首先消灭萧、谢两师的作战部署》，决心打击国民党中央军部队。萧、谢两师，即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嫡系之萧致平第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该二师为蒋介石“追剿”部队中的战斗力较强部队。这个决定，其实有很大的盲动成分。遵义

战役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作战对象大部分为黔军，而其中在遵义和乌江边上打击的吴奇伟部第五十九、九十三师两个师，虽然也是蒋介石嫡系，但是过去都曾遭到红军打击，其中第五十九师为被全歼后重建，士气和战斗力大受损伤。而第五师和第九十六师则不然。况且，遵义战役与吴奇伟两师的战斗，大部分只能算击溃，俘虏和缴获很有限，同时，红军自身的伤亡比起敌军的伤亡来还要大得多。仅以红三军团为例，损失几达三分之二。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打一场硬仗，其困难可想而知。

因而，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在接到朱德、毛泽东的命令后，于10日郑重向军委建议进攻驻守在打鼓新场的黔军一个师，认为一则打敌黔军一个师有把握，二则可以为前进扫清道路。对这个建议，毛泽东很生气，可朱德则认为“林、聂建议可取”。朱、毛发生分歧。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搬出了刚就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希望张闻天支持。可张闻天也一时无法决断，于是召开军事会议讨论。

到会者20余人。会上，毛泽东向大家表示，打鼓新场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是大家认为毛泽东的理由不成立，最后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环视全场，孤立无援，可仍然气呼呼地顶起牛来：“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立马回敬他：“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也不满意：“不干就不干吧。”毛泽东又甩出一句：“好，我不干！”愤然离席而去。

会议接着就撤销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刚刚就任军内职务，不出一个星期就被撤销，境遇可想而知。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意见被差不多全票否决，这对毛泽东的思想打击，不能说不大。但是，毛泽东究竟是非凡人物，他当然不甘心，并很快又有了破解之道。当初他请张闻天，是希望张闻天当裁判，在支持他的前提下来解决好与朱德的分歧，结果反而弄得鸡飞蛋打。此时，毛泽东想到了另一位。他，就是周恩来。毛泽东的路子果然走对了！

据“文革”期间周恩来叙述：当天夜里，毛泽

东又“提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页)

果然,周恩来四两拨千斤,给毛泽东解了套,挽回了毛泽东的尴尬局面。第二天(11日),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颁发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取消了前一天会议的决定,并将向打鼓新场方向运动的红一军团召回。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聂荣臻和朱德,以及原来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被否决,那么,他们又作何想呢?

这回的波折,既让毛泽东见识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也再一次让他明白了权谋的极端重要性。接着,他以军情紧急、人多议而不决会耽误军机为理由,向周恩来和张闻天提议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得到了他们的赞成。这个新三人团的组成,很耐人寻味。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参加三人团,并为负责人,名正言顺,不值得奇怪,并且,周恩来的处世为人,决定了他便于争取,此次关于打鼓新场的最后变故就是证明,因而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为最佳人选。毛泽东是组成三人团的提议者,他要参与,是必然的,这也很正常。问题是其中有王稼祥而无朱德,却令人费解。王稼祥并不太懂军事,而朱德则为职业军人,中革军委名正言顺的主席、红军总司令、中央政治局委员,凭着这三个头衔和他的资历、能力和水平,却位列三人团之外。

成立新三人团后的第二天(1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前敌司令部决定中央红军进攻鲁班场之敌。鲁班场位于打鼓新场以北40公里处,驻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三个主力师。其中,谢、萧两师共七个团,万师下辖两旅六团,总兵力13个团,比乌江边上作战的五十九、九十三师共六团兵力超出一倍多。周浑元纵队中的谢、萧两师为蒋介石嫡系,其战斗力自不必说,而其中第十三师尤其有特点。这个部队是一支很老的部队,最早的时候与黄埔第一师一起为蒋介石所倚重,它原为鄂军,官兵军龄长,作战经验丰富,现任师长万耀煌为湖北黄冈人,与林彪同乡,年龄上要长林彪半辈,是一位身经百战、深通谋略的骁将。

该师早已归于蒋介石嫡系,运动作战并不见长,但极善防守,过去在大别山长期与红四方面军交锋。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时的作战特点一是运动战,二是攻坚战,最为著名的战术是围城打援,攻坚作战不论其战术运用还是其攻坚能力都在中央红军之上。尽管如此,红四方面军在与敌第十三师作战时,只要它处于防守状态,从来就不敢掉以轻心。而如今的鲁班场,周浑元纵队已经到达四天了,兵力集中,工事碉堡齐备,要迎战弹药不多、缺乏攻坚手段的红军,并不困难。

战前,刚一得知鲁班场战斗决定,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当即(13日)向前敌司令部表明了反对态度,同时提出建议:“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可是,毛泽东并不以为然,彭、杨建议被否决。

15日,中央红军集中红一、三、五军团和干部团,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从三个方面向鲁班场发动进攻作战。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因为决策者毛泽东热切盼望打一个好仗。由于敌军兵力集中,工坚地利,并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但始终无大进展,又遭反击退出。激战至黄昏,全军伤亡惨重,疲惫不堪,又得知敌援兵将至,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通过一天战斗,已经摸清了红军的实力,他在以一部固守阵地的同时,亲率一部向东北迂回林彪右后翼。战局趋于危急,红军不得不撤退。此战的结果,一种说法是:红军毙伤俘敌400余人,自身伤亡达1500余人,其中阵亡480人。还有另一种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清理牺牲的红军烈士遗骸达一千余具。总而言之,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得不偿失之战。

这是毛泽东的又一次“走麦城”。上一回土城失利,毛泽东认为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回他吸取教训,集中了兵力,而且几乎是集中了中央红军的全力来打一场攻坚战,可不幸的是,还是进入了一个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误区。

鲁班场作战失利后,中央红军于16日向西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然而,随着作战的惨

败和大批的伤亡,人们心里的疙瘩越系越紧。林彪、聂荣臻不满。当初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和朱德等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是“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既然打黔军一个师驻守的打鼓新场是“啃硬的”,那么,这里打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驻守的鲁班场,又是什么呢?朱德不理解,尽管战前他不得不照样下命令。王稼祥不满。彭德怀、杨尚昆更为不满,因为战前,他们早就表示了不同意见,却遭到了否决。

在四渡赤水期间,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非议,还远不止在进攻鲁班场这一件战事上,也远不止上面提到的高层人物。

20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红军长征·文献》,第289页)而就在同一天,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根据20日前的敌情,我军应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二、为迷惑敌人,应以九军团单独向西急进至扎西地区迷引滇敌。红一、五军团继续向回龙场及其以西引川敌郭(勋祺)师向古(蔺)、(叙)永,然后脱离该敌向雪山关前进,掌握赤水河及其上游渡河点,在适当时机一、三、五军团渡赤水河,由毕节以东打回黔西大定境内,求得与敌王家烈、薛岳决战。三、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四、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鲁班场的战役原则上不应打。”(《彭德怀年谱》,第118页)

彭德怀的意见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当前部署的考虑,这种考虑,明显与中革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导的意见大相径庭,核心为:军委意见为“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河东岸”,彭的意见是“继续西进”,引敌迷敌,相机渡河,在“黔西大定境内”求得与黔军、中央军“决战”。

又有作战原则方面的意见:“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同时,也批评前段时间轻易地盲目地与敌优势兵力作战,从而难以形成自己的局部优势,并造成作战章法紊乱,“攻坚乱碰”。

此外,还有更为具体的批评,点了其中的两

个战斗:遵义战斗、鲁班场战斗。批评既尖锐又切中要害。鲁班场之战的错误不用说,就是遵义之战,这个在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发起的数次作战中唯一的一次胜仗,也并非没有失误。

彭德怀的报告,刚好说明了这位当年高层次的当事人,对四渡赤水的点评。当然,说者有心,听者也有意。毛泽东自然也就对彭德怀记下了一笔账。

四渡赤水结束之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毛泽东指挥的不满,已经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为了直接表示不满态度和达到纠正他所认为的错误的军事指挥,他连续实行了三个步骤。

首先,4月23日,他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对目前的军事行动作了一般性建议后,着重指出:“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不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向云南进军。(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这是林彪、聂荣臻首次对部队走“弓背路”的不满之词。发电之后,林彪意犹未尽,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人,竟然放言高声严词批评:毛泽东指挥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41页)

接着,林彪以个人名义,又给中央三人军事小组写信,直接提出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第三,据聂荣臻回忆,在会理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6页)

十分明显,林彪此时已经公开地表示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失望。

此外,作为军事指挥员之外的高层领导人,也不同程度地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批评。刘少奇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曾任驻红三军团中央代表。《黄克诚自述》中说,刘少奇“曾向中央提过建议,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我曾经同刘少奇在一起交换

过看法,彼此意见颇相吻合。”(《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黄克诚的话虽然很简单,而且是因后来会理会议上刘少奇遭毛泽东批后作为一种替其辩解的目的和语气谈起的,但是,它还是记述了刘少奇的态度,“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同时,黄克诚表示,他与刘少奇“彼此意见颇相吻合”。

《杨尚昆回忆录》里也叙述了他和刘少奇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其中说道:“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刘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据杨尚昆说,这份电稿彭德怀没有签字,最后由杨尚昆和刘少奇两人签发。

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批评者,还有总书记张闻天。除了上面提到的主持召开军委会否定毛泽东的意见的事例之外,他还直接批评毛泽东发起鲁班场战斗“是未加考虑的”。同时,他对部队整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杨尚昆语)很不满。在会理会议上,据与会者回忆,毛泽东当面奚落张闻天,“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参见《杨尚昆回忆录》,第136页)正是因为张闻天在四渡赤水期间及其后来对毛泽东军事指挥问题表示了严重不满,毛泽东才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央总书记如此出言不逊。

十分清楚,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的军事指挥,的确遭到了众多高层当事人的不满和反对。这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被誉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一位“用兵如神”的军事统帅面前,怎么会出这么多的不和谐声音?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如潮的赞颂,而是恰恰相反呢?难道真的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恐怕不那么简单。相反,它事出有因。一个根本的原因,除了四渡赤水期间,连续“乱碰乱撞”,打了一连串的败仗、窝囊仗,再就是带来了部队的极大消耗和战斗力的损失。

这个期间,中央红军兵力的损失,人们很难了解到真实的具体数字,但是,从对已知有关材

料的分析上,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中央红军第一次进入遵义地区后,在此休整,并进行整编,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候中央红军的人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和《红军长征史》记述为3.7万余人。应该说,这是接近实际的。这个3.7万余人,除了少数为在遵义地区的扩红补充外,绝大部分为中央苏区来的老兵,战斗骨干。湘江战役中损失的,绝大部分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刚刚扩充的新战士,其中的减员主要为离队或逃亡。应该说,经过在遵义期间的休整,部队更加精干了。可是,接着的土城作战带来了重大伤亡和减员,从而也直接导致了一渡赤水后不久于2月初期在扎西地区的再一次整编。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在回忆中这样说到扎西整编:“渡过赤水后”,“红军在行进中落伍的人数比较多”,“一个月前,在遵义附近的懒板凳进行整编时,三军团已取消了第六师的番号,缩编为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这次扎西改编,为了编足各个战斗单位,取消了师一级的组织,再次缩编为四个团,直属军团部指挥,可见在转战中损失之大”。(《杨尚昆回忆录》,第124页)

扎西整编时,红三军团将两个师七个团缩编为四个团,取消了师的编制,军团直辖团。五军团和九军团也整编为军团直辖团,各辖三个团。只有红一军团保留两个师六个团。接着二渡赤水,于2月下旬在娄山关、遵义地区进行遵义战役,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

仅以红三军团为例。请看遵义战役两天后(3月2日)彭德怀、杨尚昆向军委的报告:“三军团在娄山关、石子铺、遵义城及28日老鸦山诸战役中减员很多,需要大量补充方能维持四个团。现十团、十一团每连只能编四个班,十三团可维持原编制,但每连亦只有50~60人,十二团每连尚编五班,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损失惨重,望军委即刻补充,以便继续战斗。”(《彭德怀年谱》,第117页)

红三军团2月初在扎西整编时四个团齐装满员,其中第十团为主力团,据黄克诚说,当时该团“有2500多人”(《黄克诚自述》,第148页),一场作战之后,现在“每连只能编四个班”。第十三团

在遵义会议期间为三军团第五师,土城之战中伤亡太大,第五师一个师缩编为第十三团,可经过遵义战役之后,该团“每连亦只有50~60人”,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岂不一目了然?!伤亡之重,损失之大,减员之多,可见一斑。

减员之大,武器弹药之缺乏,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仅以黄克诚回忆的一场战斗为例。四渡赤水之后,中革军委和毛泽东计划好在贵阳附近组织一个战役,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主力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三军团和五军团与国民党军“稍一接触”,“就垮了下来”,“队伍也给冲乱了”。(《黄克诚自述》,第151页)可见,战斗力已经消失得所剩无几了。并且,这还不过是刚刚开始,下面的转战和消耗仍在继续。

那么,红一军团又如何呢?红一军团为主力中的主力,是毛泽东重点保护和依靠的对象,然而,难以乐观,它的损失同样巨大。请看林彪、聂荣臻5月9日致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电,其中说道:一军团“减员甚大,目前既无补充希望而战斗又日益紧张,如继续现实不便作战,我们意见拟将两个师合编为三个团,取消师部,直接受军团指挥,多余干部编入教导营,编成一教导团,此外侦察、工兵、炮兵各编一连,将来有兵能补充时,干部均在,较易扩大。”(《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43页)一军团“减员甚大”,已经到了“实不便作战”的程度,过去为两个师六个团,现在只能“合编为三个团”。

至于五军团和九军团的损失情况,则和一、三军团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军团长期担负后卫,倍加艰难,损失更大。九军团在四渡赤水之后,因乌江浮桥已拆,敌人追踪而来,同时需要独立担任牵制敌军的任务,只得在北岸转战,其处境至为艰险,损失程度更不必说。一、四方面军两军会合时,五军团只剩两千人,九军团则更少,不足千人。

作战“乱碰乱撞”,行进弯来绕去“打圈子”,尽走“弓背路”,部队大量伤亡减员,所以,林彪那种“会把部队拖垮”的担心并非危言耸听。难怪高层指挥员们怨声载道,普遍滋长不满和失望情绪。

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人数,一直是个谜。尽管有的说有三万多,有的说有四万

多,但是,笔者有相当多的根据可以判断,人数当在1.2万~1.5万人之间,决不可能再多。不然不可以理解,何以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抽调了一个师直属队、三个整团共计3800多人全部补进了红一、三军团,可是,两个月后,在这两支部队单独北上时,加上中央机关人员共计也才不到7000人。

不可否认,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阶段,正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又一个损失最严重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它比湘江之战还要严重。这个期间,损失的人数,尽管从数字上相较湘江战役为少,但几乎都是战斗骨干。

如此看来,四渡赤水是一场成功地摆脱了优势之敌围追堵截的军事行动,但同时,它又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其中,既包含了胜利和成功,又存在失败和遗憾。战争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歼敌不多,可以理解,但自我消耗如此之大,却令人遗憾。

那么,“四渡赤水,用兵真如神”,又是从何而来呢?聂荣臻回忆说:“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3页)

聂荣臻说陈毅对他说,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 he 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就有些奇怪了,聂荣臻是四渡赤水的参加者,而陈毅却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一位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是不知情者,正常情况下,聂荣臻还需要陈毅来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吗?

然而,这就是重要信息。人们也正是依据这种信息来感悟。

所以,在四渡赤水的当时和不太短暂的后来,尽管争议纷呈,但一直没有超越“指挥正确”与否的范围,仍然属于“人间平凡事”,直到那个疯狂的“大跃进”年代出现后,在毛泽东要求对他“搞点个人崇拜”的大背景下,平生“得意之笔”出现了,于是,四渡赤水走上了神坛,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印记。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周总理与1973年廖承志访日团

● 朱 良

我有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获得“解放”后，以“青年工作者”身份参加廖承志会长为团长的中日友协代表团于1973年4月16日至5月18日访问日本32天。

中日关系一直是我国对外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特别是周恩来总理曾为增进中日人民友谊和发展两国关系付出了巨大心血。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改善了中美关系，对日本这个盟国搞了“越顶外交”，加上日美经济矛盾发展，引起了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越来越高。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周总理通过访日推动“解放”干部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支撑了国家的运转。林彪事件后江青集团还开展了矛头针对周总理的学习、评论《水浒传》活动。但是1973年上半年周总理的处境还算是相对平稳的。毛主席于3月9日批准同意了周恩来报送的《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周总理同时决定派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以落实中日《联合声明》。可以看到，他通过这个代表团出访来推动“解放”干部的政策。代表团不仅有当时在台上的人，也包括了一批“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各界知名人士。周总理要《人民日报》发表代表团（包括工作人员和记者）55人的全部名单，发表参加迎送的主要人员名单，代表团访日的消息和照片要刊登在各地街道上的宣传橱窗里。

《人民日报》发表的副团长名单依次为：全国政协常委楚图南，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李素文，全国人大常委马纯古，全国体总副主席赵正洪，

友协副会长张香山，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周丽琴，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作曲家于会泳，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兼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团员名单，依次为：人大常委、数学家华罗庚，政协常委董其武、荣毅仁、王芸生，人大代表谢冰心、吴恒兴等；代表团团员还有：国务院文化组成员浩亮，人大代表张瑞芳、古元、王崇伦、邢燕子、郑凤荣，舞剧演员薛菁华，京剧演员李炳淑，游泳教师戚烈云，围棋运动员陈祖德等。《人民日报》发表的部分迎送人员名单为：李先念、邓小平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傅作义、吴德、韩念龙；还有：卢汉、林巧稚、胡愈之、刘斐、朱蕴山、周培源、赵朴初、苏子衡、徐萌山、杜聿明、郑洞国等四五十位民主人士和各界知名人士。这两个名单当时引起了全社会极大关注。

出访前周总理同代表团交谈三小时

代表团离京前夕的4月14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代表队全体55人，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亲切交谈，一直到深夜一时结束。他首先谈到，邓小平将出现在明天的欢送代表团行列中，将成为国内外最关注的新闻。他很快把话题转到文艺界，问在座的于会泳和张瑞芳：张主演的、人人皆知的《李双双》这个电影错在哪里？是不是李双双这个人物被否定了？于会泳答：“片子的作者有些问题”。张瑞芳说：“作为无产阶级的人物，自觉性还不够，好像是本能的，看不出她的觉悟从哪里来”。周总理说：“李双双喜欢管事，她管的都是大道理。她丈夫有点‘中间人物’，但还是改造过来了。”“张瑞芳作为访日代表团成员，是有代表性的，她抗日战争初就参加了革命。李炳淑（样板戏《龙江颂》主角）也有一点代表性，她也演过一点‘帝王将相’的老戏。”周总理又说：“上海把黄宗英‘解放’了做得对，不能因为她是

赵丹的妻子而受到株连”，“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自杀了，很可惜”。荣毅仁问周总理：“在日本有人问到资本家的定息问题该如何回答？”（注：1956年搞全面公私合营后，每年给资本家按5%资本额的定息。后来就不再提定息的事了。）周总理回答：“党和全国人大没有表明过态度，你可以讲讲个人的看法。”荣毅仁说：“可以说，定息是党的政策，文化大革命以来冻结了，将来会作处理的。”周总理问：“你的资产估值多少？”荣毅仁答：“3000万元，一年100多万定息。我在国外的兄弟不拿，我一年拿100万不到。”周总理说：“解放前中国的民族资本总共只有22亿元，定息每年1.1亿元。中国的民族资本少得可怜，要他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领导革命，不行”；“按照毛主席思想，定息应交本人，本人自愿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傅作义曾把存折放在我处，怕抄家被抄走了不好，（1970年）庐山会议后我就交还给他了。他说就由他保管吧，我说钱你要用。程潜有一笔款，他夫人上交了。这类事应在全国人大解决。”王芸生（原《大公报》总编辑）说他看不到《参考资料》，周总理说这个问题要解决。

周总理还提到“学习《水浒传》”问题，日方不讲我们就不谈”。

周总理三个多小时主要谈这次出访的方针问题。代表团访日最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同苏联关系问题。上世纪60年代反对修正主义大论战后，中共同苏共分裂了。1966年日共（曾支持中共的抗日战争）因为主张联合苏联反美帝，也被断绝了关系，我们支持从日共分裂出来的“左”派小组织和从日共领导的日中友协等群众团体分裂出来的小团体。代表团访日前两个月，毛主席向美国基辛格提出“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的联美反苏“一条线”政策，我国对外战略方针明确为“集中打击苏修”。而积极推动日中友好、同中共有十多年“联合苏联反对美帝”历史的日本社会党以及它和日共影响下的工会组织和其他群众团体则“反美不反苏”，因此同我们有一些疏远。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1959年访华时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在日本遇刺身亡。日本政府当局不少人以及北海道和东北部沿海的地方政府和京都县

知事等，主张同苏联友好，发展日苏贸易，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等。有的日本城市已同苏联结成姐妹城市。周总理按照内外有别的精神谈了出访的方针问题，主要有：

（一）“团结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不断扩大中日友好的队伍。交朋友要照顾左、中、右，对反华、亲台湾的右派也要做工作。他特别提醒不仅要为已故的长期为日中友好做出贡献的老朋友扫墓、慰问遗属，还要慰问那些竞选议员落选的老朋友，以及不久前在中国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赛失利的日本乒乓球队。

（二）周总理说：现在德国、日本甚至英国想给我们贷点款，我们不要说死了，就是不要。日本经济界关心两国经贸合作问题，我们要积极呼应。要研究：如果不损害主权，能不能接受各种形式的分期付款，它带有一点贷款性质。总不能什么贷款都不要呀！友好城市这样的活动可以搞起来，如西安和奈良，上海和大阪，今年先搞四对，怎么样？我们寄希望于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世代友好。

（三）二战后日本一直受美国控制，当时日本人民的斗争主要是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小选区”的选举制。周总理说：我们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又不干涉别国内政。代表团访日时，不宜把反美放在首位。对“苏修”不要点名，我们不要挑起这个问题：不要提支持日本收复北方四岛这类日苏有争议的问题。他又指出：对日共和对苏修要有点区别。

周总理提出这个方针既不使日本东道主、政府为难，又有利于团结日本人民。后来日本一些报纸、杂志评论说：中国代表团恰当地处理了日共、日苏关系问题，使日本人民对代表团“好感倍增”。

（四）周总理指出，在做华侨工作、促进华侨团结的同时，要做台湾侨胞的工作。要争取有影响的台胞如著名的围棋手吴清源等人来国内探亲，外交官以个人身份也可以来。代表团要警惕台湾方面的捣乱和破坏。

周总理针对代表团不少成员刚经历了“文革”的冲击，心有余悸，鼓励大家要大胆讲话，不要怕说错话，错话难免。讲话要注意日本的舆论动向，它们经常随风转变。他提醒应该去看看田

中首相赠送的种在天坛的樱花树长得怎么样了。他谈话时已是深夜，廖承志立即派人去天坛现场察看，回来报告说樱花树长得很好，还摘回来几片嫩叶。周总理很高兴。这几片嫩叶也没有做任何简单包装（注：这也说明了“文革”时期物资的匮乏），在廖承志会见田中首相时，将几片樱花树叶从他笔记本中拿出来送给田中。媒体对中日友好这个小插曲纷纷做了报道。

代表团访日形成中日友好新高潮

代表团这次访问，成为继中日建交后又一次中日友好的新高潮，也可以说是收获了20多年友好工作播下的果实。日本各界人士都争着要会见廖承志，还有张香山，他们两位是周总理进行建交谈判时的顾问。日本各地方都热烈要求代表团去访问，代表团只能分成四五个组分别访问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38个。同各界、各阶层人民，从皇族、首相、大臣、各政党负责人，到工、农、渔民、部落民以及旧军人包括释放回国的战犯，都做了友好的接触。参观了很多工厂、农村、学校、研究所，直接同基层的工、青、妇等座谈。所到之处都受到非常隆重友好的接待。代表团乘新干线路过的车站，特别是从长崎到熊本100多公里长的公路两旁，闻讯自发而来欢迎的人群络绎不绝，情景感人。为了接待代表团，有些相互敌对的势力也联合起来。

廖承志、张香山、孙平化等同执政的自民党四派负责人多次接触：同田中首相会见、会谈三次，同大平正芳外相和三木武夫副首相会见各七八次，同通产相中曾根也多次会见。

田中首相访华时曾去台湾活动的自民党副总裁以及自民党右派头子之一的日本体协会会长也都主动来参加或主持招待酒会。代表团同东京和关西六大财团和新日铁的头头们都见了面。

代表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了“老朋友”的工作，充满了人情味。主动拜会了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三个在野党，充分肯定了他们对日中建交所起的重要作用。社会党和受它影响的工会组织“总评”在各地动员群众欢迎代表团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结交的“新朋友”，大量的有30多个县

的知事、下属市长、县市议长等地方实力派以及地方和基层的政党、工、青、妇组织领导人。接触了日本37个单项体育协会中的36个以及其他文化、艺术、科学、新闻、医学、围棋等各界的朋友。代表团住的旅馆门庭若市，应接不暇。通过这次访问，加深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亲近感，很多中年以上的人以谈论两国的历史渊源为荣，强调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有的人特别是旧军人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过中国有“负罪感”。

过了近40年再来回顾1973年那次访日，感到那时日中友好确实是广大日本人民的要求。年青人受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还不很深。那时没有什么“中国威胁论”。一般估计，超过70%的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这同进入21世纪后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对中国没有好感形成鲜明对比。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马纯古率领的代表团一组人访问了冲绳。冲绳原来叫琉球，是中国的附属国，国王由中国皇帝册封，1879年被日本吞并。在冲绳，代表团受到非常友好的接待，有的人自称是从福建过来的，有的人有三种文字的姓名（中文，日文，冲绳语），不承认是“大和民族”。代表团访问期间，原来无组织的2000名华侨成立了华侨总会筹委会。冲绳欢迎中国代表团的酒会原来只挂中国国旗，后来增挂了日本国旗。冲绳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情绪很强烈。代表团抵达县政府门口时，还有几个美国士兵高喊“毛主席万岁”、“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口号。现在再来看冲绳人民仍有强烈的反对美军普天间机场的情绪就不奇怪了。

代表团访日期间，很多次遇到二三十人的日本右翼分子和台湾方面人员的捣乱，日方都派警察把这些人挡在二三百米外。

日本经济遇到的问题同30年后中国有相似之处

代表团参观了很多日本的工厂、农村，了解了不少经济情况。当时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日本经济畸形高速发展，石油等能源与铁砂等原材料严重依赖外国，市场也依赖外国，也就是“两头在外”。过了近40年后，回头再看日本当时经济方面遇到的问题，同21世纪后中国改革开放遇到

的问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日本的农业确有“畸形”的地方。

(一)1973年日本经济还在高速发展。日本经济在1955年恢复到日本投降前的最高水平,以后每年以10%左右的高速增长,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1400亿美元)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西德。1972年估计为2900亿美元。

1965年,日本对美国贸易开始出现顺差。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宣布对日本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压日元升值。1971年底,日元开始实行浮动汇率,1972年日元升值16.88%。代表团访日时,1美元兑换260多日元。

1985年4月“广场协议”后,1995年日元曾升至79日元兑1美元的高点,1998年又贬值到145日元兑1美元。近几年来一直在90日元上下。40年来,在美国压力下日元震荡升值,但是美国并没有能改变对日贸易逆差。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除了得益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美军订单和美国先进技术的援助外,主要是“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1972年日本工人的工资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4到1/3,德国的1/2。据日本“总评”负责人介绍:1973年初工人的平均工资为7.3万日元(260多日元兑1美元),最高13万日元,最低3万日元。代表团参观的索尼一家工厂,工人平均年龄不到25岁,每周工作五天,月平均工资8万;全日通一家工厂,60%以上的工人年龄在30岁以下;一家烟草厂工人的平均年龄则为44岁,月平均工资七八万日元。农村的临时工每天工资2000到3000日元。

日本政府大力投资搞高速公路和新干线(国铁)。私人企业大规模投资搞更新设备,投资连续十几年每年平均增长22%,超过生产增速的一倍。结果是设备能力超过实际需要的20%。工业设备中有一半使用期不到五年。因此日本很想对外出口成套设备。1972年日本产钢9690万吨(2010年上半年为5400万吨),而炼钢设备能力则达1.2亿吨。日本炼钢技术比美国先进,钢的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美国一吨240美元(内工资74美元),日本仅140美元(内工资21美元)。

(三)日本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有:1.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工会已连续19年发动“春季斗争”,

要求提高工资,代表团访日时正遇“春斗”高潮,“总评”估计工资可能增加20%。从要求提高工资又逐步发展到要求缩短工时,反对“合理化”(减少人员,提高工作强度或工作效率),并开始重视住房、养老金和医疗问题。2.当时日本已开始重视老龄化问题。日方安排代表团看了一部流行的、反映老年人困境的电影——《恍惚的人》。3.日本的“公害”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第一位。“公害”从对植物、对动物发展到对人,媒体报道最多的是“疼痛病”和“水俣病”。我们当时认为中国没有“公害”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上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后来有很大变化,人民收入提高,治理污染有很大成就。

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大批农村青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农业人口70%为年老的,完全依靠农业为生的只有16%。“农业协同组合”开展对农民技术指导和贷款、存款,农户的机械化已很普遍,2.5马力的插秧机(16万日元)、6马力的手持拖拉机(15万日元)、喷雾器等被广泛使用。对代表团来说感到“新鲜”的是,上世纪50年代日本粮食已基本自给,但随着对美国贸易出现顺差,美国压日本进口美国小麦,加上1967年起日本连续三年获得年产1400万吨粮食的好收成,日本政府1971年起决定减少农村水稻种植面积,一部分水田实行休耕,政府给予补贴,同时大力发展水果、蔬菜种植。1972年日本进口600万吨美国粮食,改变了日本人民的耕作和生活习惯。

以上所用数字,主要是根据笔记整理的,个别数字可能不够准确。

周总理在代表团访日前夕,同代表团交谈了三个多小时,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已患癌症并在3月刚做了第一次手术。

我要感谢代表团成员杨振亚(曾任驻日大使)和陈永昌(曾任中日友协副会长)对我撰写这篇文章的协助。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公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我向中央告省委

● 梁文斌

我是江西南昌县人,1951年7月在南昌市劳动局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入党。1953年中央决定把优秀的干部转移到工业战线,1954年2月我被调到武汉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任职。同年大区撤销,10月我被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负责来信来访的工作。1957年冬,中央决定“万名干部下乡劳动锻炼”,组织部长安子文开动员大会,号召干部上山下乡,接受劳动锻炼。还说下去以后要体察民情,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下面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写信向中央反映,但要署真名,不要搞匿名,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1957年冬,我随同中共中央组织部一批干部到安徽省砀山县刘寨公社。我们一小分队在该社刘堤口村劳动。1958年2月,调到无为县,在坛树公社劳动锻炼。1959年2月下放干部锻炼结束回京,我们约40多名干部留在安徽省工作,一部分在省委组织部,一部分在省直机关。我被分配在省委办公厅农业办公室任秘书,办公室设在省委曾希圣书记斜对面。从分配工作看,省委对我是很信任的。

一、灾情严重,地方隐瞒灾情

1960年春,安徽省委开始察觉粮荒的问题。为摸清情况,决定派省长黄岩、书记处书记曾庆梅、副省长彭宇珠到蚌埠地区了解灾情。彭副省长及秘书王成乐,加上我共3人下到凤阳、定远、五河等县进行实地考察,以了解真实情况。

我们到凤阳县看了一个村子,房屋倒塌,没倒的房屋已没有屋顶,室内长满杂草,有一人高,没有见到老百姓,真是惨不忍睹。我们到该县东方红公社,找到一个劳动模范谈了话,他反映饥荒问题非常严重,老百姓怨声载道,没有粮吃,想逃荒。可现在到处设“劝阻站”,逃不出去,人们只

有等死。

我们到五河县一个公社,发现该公社大量扣压人民通信。我和王成乐在公社办公室一个柜子里,发现了几十封当地群众写给亲人的信没有发出去。我们问公社负责人怎么回事?他说这些信都是反映他们家里没有粮食,请求支援的,我们怕他们暴露公社的问题,把信扣压下来了。为此,彭副省长写了一份《关于五河县扣压群众信件的报告》送省委,但无回音。后来,彭副省长才知道此事是“省里下的通知”,是省委书记处秘密通知基层扣压的。

我们到定远县,亲眼目睹了县粮食局有意编制两套报表:一份是向专区报的60万人口的报表,一份留县里实际控制的40万人口的报表。有天晚上,我们刚从该县农村回到定远县招待所。吃完晚饭后,彭副省长要我们了解一下县委安排群众生活情况,明天向省委汇报。当时,我们找县委单书记,单书记就打电话叫县粮食局长来汇报。县粮食局长不了解我们的意图,把有关粮食统计表和资料都带到了县委食堂。王成乐同志和粮食局长在谈群众生活安排情况,我在一边翻他带来的资料,发现两张人口相差20万人的统计表。我问粮食局长是怎么回事?他吓得一脸惨白,求我将那张40万人口的报表还给他,我说:“这不行”。王成乐说:“他一定要,就还给他,反正我们知道了。”这样,这张表就还给他了。第二天,我们一起赶到蚌埠,彭副省长将情况和蚌埠地委书记谈了后,地委书记叫专员到定远县去,把多报的20万人粮食调出。定远县瞒报2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下被揭穿了,该县原为“中等”水平改为“三类”(非正常死亡严重的)县。

二、全面封锁消息,瞒住中央

1960年10月的一天,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

施到蚌埠了解安徽灾情。由于省委对上级实行“封锁”政策,结果什么情况也没有了解到,就匆匆走了。过了两个月,柯庆施第二次来安徽蚌埠前夕,省长黄岩通知蚌埠地委书记和在蚌埠地区救灾的省委领导晚上开会,黄省长说:“明天柯庆施同志来蚌埠,要了解各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你们只讲‘点’,不讲‘面’,统一口径不要乱讲”。第二天柯庆施到了蚌埠,第一个问安庆地委书记许少林,许少林照笔记本上的数字汇报。柯说:不要照本子念,收起本子随便谈谈。许说:数字怕记错,所以还是有本子好。当时我是谈话记录人,亲眼看到这种“尴尬”的局面。

惨剧已经在安徽上演。怎样才能让安徽的实际情况反映到中央,尽快让他们早日解除死亡的威胁呢?我心里着急,夜不能寐。在良心的驱使下,我回到招待所,连夜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组织部的信,把安徽省存在的问题,全部写了进去,准备第二天交柯庆施。但信写好了,又觉得心里没底,柯和曾希圣是什么关系都不清楚,所以当夜又把信烧了,心想到合肥再说吧。

三、斗胆上书,挽救生命

1961年元月,我们一行三人回到了合肥。春节前夕,省委举办周末舞会。我没有参加,到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冯孟达(原中央组织部干部)宿舍,与他商谈这段时间我所了解的安徽问题,并准备给中央组织部写信,反映安徽的实际情况。冯听后很支持我的意见。我当即执笔写了一封信给中央组织部。内容包括:一是安徽的问题很严重,蚌埠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100万左右,是全省的四分之一;二是省委领导严密封锁消息,一般的人不易了解到准确情况;三是建议中央派强有力的工作组来,彻底解决安徽问题。如何署名,我问冯孟达。冯正考虑之时,我说就署我的名字,我现在只有一个父亲,万一有不测,我的父亲就交给你管了。冯当即表示同意。所以最后决定的署名是: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梁文斌。这是按1957年冬安子文部长在动员干部下乡时说的,给中央组织部来信要署真名。

信是写好了,怎么送到中央组织部呢?我设想请冯孟达同志以“探亲”为名送往北京。冯说不

行(那时他还没有结婚),父母在上海,到北京探亲,不对头。我说:那就写给个人:北京市西单北大街98号(中央组织部原地址)陆圭章(时为中组部干事)同志收。因为是私人通讯,在合肥邮检的可能性小。第二天我吃完早餐,就把信送到大街上的邮筒发出去了。

信发出去以后,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难以预测后面的情况。好在过了十来天,收到回信:“梁文斌同志,来信已收到,陆圭章”。我看完后,感觉心里卸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回家好好地睡了一觉。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

1. 有一天办公室突然接到余叔(曾希圣之妻时任省委办公厅主任)从上海打给郑秘书长电话,电话打到我办公室,叫郑接电话,从电话看是“信”的问题,余说我们内部也不干净。

2. 不久,我的农业办公室和其他为书记服务的办公室搬家,搬到远离书记的另一头,我感觉“风声”来了。

3. 1961年4月,省委在“石关”开会,华东局罗毅来了,但不让我参加。以前这些会我都参加了,让我单独待在家里,肯定有事。

4. 6月的一天,接农办主任杨宝麟通知,我被下放到安徽省界首县的一个生产队搞“退赔”工作。

此时,我心里完全明白,省委已经知道了“信”的情况。但我问心无愧,看他们怎么办?

四、揭开“盖子”,高官落马

1961年初,我的信到中央组织部后,陆圭章将信送安子文部长,安部长将信打印后送邓小平同志阅(原信存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档案室)。之后,邓将此信交华东局柯庆施。柯接信后叫省委办公厅主任余叔到上海看信。余到上海看完信后才知道是我告了省委的状,这样才有我被下放到界首县的境遇。

1962年元月在北京,中央正式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安徽省委的问题在毛主席过问下,才得以真正揭开。毛主席批评“曾希圣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偏要摸”。当时在北京开会的省委领导很紧张。省长黄岩回到宾馆住处,坐在沙发上喝水

时,竟拿烟灰缸当茶水喝,这是他的秘书回合肥后在办公室亲口对我说的。大会后,曾希圣被解除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被调离安徽,中央有关领导人不让他回安徽告别。霸王算是彻底倒台了,省里的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也被降、免职务。

中央调李葆华、刘季平、李丰平到安徽主持省委工作。我也从界首调回合肥在省委整风办公室,搞来访接待工作。据说李葆华书记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说,安徽省广大党员干部是好的,像办公厅梁文斌同志,就敢于向中央揭发曾希圣同志的错误。我听后觉得这是我们党员应做的事情,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1963年5月,安子文部长到上海治眼病,回北京时途经合肥。他叫秘书程之瑛打电话给我,说安部长来合肥,想看看你。晚上我见了安子文,安部长问我好,我心里很激动,眼泪几乎要掉下来。安部长问我,安徽死了多少人?我说,大约400万。因为1959年我到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时,全省人口是3300万人,到1961年写信时只有2700万人,除去200万人算作正常减少外,非正常死亡算400万人差不多。这是当时估计的数

字,都没有统计,现在看来,只少不多。

1964年7月我被调回中央组织部,在部办公厅处理信访工作。1966年5月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从河北省正定县“四清”工作队调回北京,参加中央组织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组织部分成两派,因我有“安徽”问题,不明真相的人纷纷贴大字报,说我是安子文(当时被诬陷为叛徒,后平反)派在安徽的“钉子”,抓住阴暗面攻击“三面红旗”。1969年2月我被下放到吉林省通榆县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广西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1980年10月,中央组织部调我回京,在纺织部科学研究院工作,直到1993年8月退休。

(责任编辑 李 晨)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

鸿顺园 528 信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欢迎订阅2011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68539058

传真:(010)68532569

每期定价:8.00元

全年定价:96.0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吴南生：特区应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

● 张宝锵 陈 枫

今年正值深圳特区建立 30 周年。当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吴南生同志，奉命到深圳“杀开一条血路”，兼任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任

市委书记、市长，开辟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他勇立潮头，不怕风急浪高，以“要杀头就杀我吧”的气概，为特区披荆斩棘，探寻新路。离休后，他仍然一直关注特区发展，对国家命运深入思考。当舆论监督面临困境时，他与任仲夷拍案而起，上书疾呼，尽显铮铮铁骨。

在经济特区建立 30 周年前夕，年将 90 的吴南生同志接受了《炎黄世界》杂志的采访，坦率直言，畅抒己见。

特区还要继续“特”下去，为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探路

《炎黄世界》：现在很多人说：“特区不特”了，吴老你对这一问题有何看法？

吴南生：此前特区之“特”，精髓在于改革掉僵化的、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左”的以至极“左”的思想仍占着上风。因此，要改掉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办特区，把国外资本引进来，让人家赚取利润，这是否符合马列主义路线？这是当时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一个焦点。

深圳的历程和实践经验，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
是正确的。邓小平 1984 年 1 月

1984 年 1 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时题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特区当年的任务确实已经基本完成，各地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公平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是“不特”了。

但从使命说，

特区还要继续“特”下去。小平说，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在“过大关”，进入矛盾重重的深水区，特区还要继续肩负起试验田的使命，继续为中国改革探路。

如果说，前 30 年特区为中国贡献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宝贵实践，下一个 30 年特区应该为完善市场经济和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探路。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我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得出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很多人都不知道，深圳从 1979 年到 1990 年长达 11 年都没有设立人大、政协，我们曾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留下一定的试验空间，可惜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实施下去。

邓小平同志为改革规定了三条要求

《炎黄世界》：吴老能否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谈一些看法？

吴南生：其实，1980 年 8 月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已经有明确的说法和交代。

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更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能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他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一讲话的时间是8月30日。而特区条例公布的时间是8月26日,都已30周年了。

在纪念特区建立3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认真注意当年由政治局通过的、小平的三条要求,实现得怎样?这三条要求的本质又是什么?

第一条,“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是4.91万亿美元。最近新闻报道说,我们今年第二季度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左右,约为日本的1/10。应该说,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工作是有成效的。当然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但我们已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它正在迅速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发展,它正向我们提出强烈的要求,这要求就是小平所说的第二条要求:“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至于第三条:“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也是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的要求。

下一步应首先 开放舆论,发挥舆论 监督作用

《炎黄世界》:你认为实行民主政治改革应该如何具体进行?

吴南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化和进步。

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人,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这场改革。我建议,逐步放开,逐步地提高民众的社会承受力,提高人民的理性,逐步地加大改革的力度,直至实现民主的目标。目标是唯一的,但具体的途径则不是唯一的。

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落实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进一步开放舆论。这一方面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权力制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开放舆论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关于开放舆论,我们有必要再听一下“老祖宗”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卷就用诗一般的语言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



当年吴南生向叶剑英、习仲勋汇报经济特区工作

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变动一样。”

现在我们有些官员，一听到“舆论监督”就脸色发青，少数或很少数人还“心怀愤恨”。这都是由于缺乏“民主锻炼”，“身心虚弱”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所以说还有一个“开启官智”的问题。

当前要特别警惕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炎黄世界》：你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最危险的倾向在什么地方？

吴南生：从国际上、从我们自身的实践，历史的经验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重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要求的上层建筑。

在这里，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要警惕那些钻入市场的权力。要知道，权力和资本都是无限地扩张的。资本的贪婪，尽人皆知。而“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一警句，是古今中外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的。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权力无限扩张的政治制度。所以邓小平说，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也就是说要用高度民主的制度来保证国家不走弯路，长治久安。我们不是天天都在说“稳定”吗？这才是真正的稳定。

现在要特别警惕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本来，我们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掌握在国家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可能带来很大的风险，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容易导致利益集团侵占经济增长成果，侵害百姓的利益，伤害

社会公平正义。这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根治。

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一系列理念，特别是“和谐社会”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构思很好。但只有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努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社会才能和谐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有的学者曾对“和谐”二字进行“说文解字”：“和”，就是每个人都有饭吃，“口”字旁边一个“禾”嘛；而“谐”呢，是“皆”加一个“言”，让人人都说话。“人人有饭吃，人人畅所欲言，不就是‘和谐’吗？”

任仲夷生前与我是邻居，我们常在湖边小道上结伴散步，倾心交谈。“昔如埋剑常思出，今作浮云不计程。”我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能尽的力量已十分有限。我们为国家繁荣、人民富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的点滴进步而高兴；当年提着头颅干革命，许多烈士都在我们前头牺牲了，我们常常以当年所追求的真理、理想未完全实现而深感遗憾。但是，《共产党宣言》早就预言过人类和谐社会的理想形态：“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始终坚信，这样美好的崇高理想是一定会实现的！

（本文原载《炎黄世界》2010年第5期，已经由吴南生审定）

（责任编辑 洪振快）

<p>请订安徽老年报</p> <p>五日一见面，相看两不厌。 多了吃不消，少了不够味。 别看篇幅小，颇具吸引力。 实话能实说，新颖见识远。 迎合老人意，免费能就医。 更能供篇幅，诗文吐心丝。 物美价又廉，岂可将它弃！</p>	<p>欢迎 订阅</p> <p>邮发代号 25-42</p> <p>安徽老年报</p>	<p>2011</p> <p>本报是 我省唯一的 老年人报 纸，曾荣获 国家一级报 纸、省编校 质量先进集 体、省工商 广告发布文 明、诚信单 位等多项荣</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版 新闻言论 ▶二版 卫生保健 ▶三版 《枫林》副刊 ▶四版 综合 ▶月末为生活版 <p>本报 4开4版 每旬二期 逢五逢十出版 全年订价：28.40元 零售每份 0.40元</p>
<p>本报发行部地址：合肥市庐江路69号 邮编：230001 电话、传真：0551-2653071</p>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与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

——原中国人民银行筹建处秘书石雷访谈录

● 本刊记者 徐庆全

徐庆全：石雷同志，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重要的金融机构，创建于1948年12月1日，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出版物中谈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创建的历史。但是，这些出版物的说法各不相同，且矛盾之处较多。另外，近几年来，人民币的收藏热逐渐升温，一些记述和探讨人民币的文章、著作等关于人民币历史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在当年筹建中国人民银行的老前辈中，您是惟一健在的人；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您又担任发行科科长，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见证人。而且，您离开工作岗位后，一直致力于金融历史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想请您谈谈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过程和人民币发行历史的若干问题。

石雷：从1947年参与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工作开始，我在金融机构工作了大半辈子。你所说的一些出版物中关于人民银行和人民币历史记述的不同情况，我也是知道的。现在，当年最早参与筹备中国人民银行的三个人中，南汉宸和何松亭同志已经谢世了，领导我们工作的董必武同志，也过世了。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谈一谈，也借此缅怀董必武同志，以及南汉宸和何松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各大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全国货币统一提出了要求

徐：在采访您之前，我翻阅了《中共中央文件集》以及《董必武文集》等文献，也翻阅了各个根据地的财政史，大致得出这样一个脉络：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前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所领导的根据地，都各自成立过金融机构，陆续发行过一些在本根据地使用的货币，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一些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各个根据地的货币也可以互相流通。筹备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大致是根据解放区逐渐连成一

片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您认为这个脉络对吗？

石：是的。在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根据地，由于日寇对我们采取经济封锁，我们党只能采取在统一政策下分散经营的办法来打击敌人。所以，各个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票子，这些票子只在本地区使用。日本投降后，我军相继解放了一些中小城市，使一些根据地连接起来，各大战略区先在本地区范围内，将银行和货币统一起来。比方说，当年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就将冀中、冀热辽分行所发行的边币上的“冀中分行”和“冀热辽分行”的字样取消，统一为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其他一些根据地也是这样做的。这样，不仅大大方便了物资交流，也促进了各大战略区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6年的下半年，我军相继解放了一批城市，首先使华北地区基本连成一片，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可以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环境。这样，随着解放区的军民经济交往增加，物资交流的日益频繁，而各个解放区的票子却不能互相流通，这就成为影响解放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解放区军民纷纷要求中央采取必要措施，成立解放区统一银行和发行能在各解放区流通的货币。

徐：在《中共中央文件集》中，我看到了这样两份文件，一份是1946年12月3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一份是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给滕代远、薄一波等人的电报。前一份电文是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央建议“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以研究解决华北解放区“统一对付国民党”和解决“货币不统一”的问题；而后一份电文则是中央同意“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的复电。这次会议是什么时候召开的？您参加了会议吗？

石：这次会议是在1947年的3月中下旬召开的，地点在邯郸。那时我是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边区代表团，团长是南汉宸

同志；晋冀鲁豫边区代表团，团长是杨立三；华东代表团，团长是薛暮桥。在会议开始后，陕甘宁边区的白如冰、晋绥边区的陈希云以及中原区的刘子厚等同志，也赶来参加会议。

徐：会议是不是提出了成立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

石：当然。但这仅仅是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次会议，交流各解放区的财政工作经验，对各区物资交流、税收、货币、资源互相帮助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根据十年来的经验，提出了有关财政、经济等政策。会议最后协商，在1947年底前统一货币的发行工作。

徐：薄一波同志在回忆中说到，在华北财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那时，好像董必武同志不在邯郸。

石：是的。董老当时在西柏坡。这次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到了5月下旬，董老才来到了邯郸。在听取了薄一波以及各代表团团长有关会议的汇报后，董老说，会议开得好，提出了今后的政策，确定了起草《华北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决议草案》，报中央审查。但是，董老对会议商定的在1947年底前发行统一货币的意见不大同意，认为这个事情有点操之过急。他认为，财政货币有统一的必要，但是，具体把财经事项统一起来，还存在着许多基本问题，主观上和客观上的条件都不成熟。主观上，各区、甚至各区内各部门和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的问题也还存在，需要克服；在客观上，许多必要的物质基础，像机关人事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毫无准备，财政统一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统一发行货币是财政统一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与各区的收入、支出、贸易、市场有密切的关系，单独抽出发行货币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与会的同志，都认为董老说得有道理。会议最后商定，1947年底之前，暂不发行统一货币，协议各区票子仍然实行。对于各区之间的物资交流问题，会议采取了这样的原则：相互支持，互不流通及按自然比价兑换的原则，以便相互间的物资交流。

徐：董必武同志对成立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还是很重视的。在《董必武文集》中，董老在晋察冀边区财经会议上就说到，成立中央银行、发行一种通行各区的钞票，这桩事虽然不能立即办，但大势所趋。这是1947年9月间的事。

石：虽然董老在会议上认为成立统一银行和发行

统一货币的时机不成熟，但是在成立统一银行和发行货币这一点上，他是积极准备的。在1947年8月1日，董老就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上报中央。在这个文件中，华北财办（即华北财经办事处的简称——徐按）的任务有八条，其中第五条就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8月1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章程，并要求各中央局各区财办实行。

徐：看来，中央是同意董老的意见的。

“中国人民银行”名称的确定

徐：要建立中央的银行，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个定名的问题。关于名称的确定，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石：《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下发各区后，1947年的9月间，中共华东中央局工委书记张鼎丞、邓子恢和董老联系，也建议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以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董老派南汉宸到渤海去找张鼎丞和邓子恢，商讨成立银行的事情。

徐：张、邓二人提出的是建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为什么后来确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

石：中央在8月份批准华北财办筹建中央银行后，董老就考虑银行的定名问题。他也让我们考虑考虑。何松亭同志提出，名字定为“中国人民银行”。董老听后，说很好。他说，今天，我们创建的中央银行，不仅要考虑到目前解放区货币统一，还要和将来新中国的银行名称联系起来考虑。因为今天的解放区人民政府，就是将来的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天创建的中央银行，就是将来的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因此，这个银行的名字叫“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不合适。而用“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字，既表示这是人民的银行，也有别于蒋介石的中央银行，也不失作为将来新中国国家银行的格局。

徐：董老的考虑是很周到的。

石：所以，这年的10月初，董老经过刘少奇同志的同意，向中央致电请示，建议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他在请示中，向中央报告了派南汉宸同志到渤海与张、邓商量的情况，提出了成立解放区银行的建议，并提议，银行的名称就叫“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同意董老的建议，让董老组织筹备工作。这样，“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就确定了。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这六个字，也是董老题写的。

徐：中央是什么时候复电同意的？

石：是在10月8日，我后来查阅过这个电文的草稿。中央复电草稿上，第四个问题说：“根据上面各种情况，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在这个草稿上，关于银行的名称，是反复修改过的。先是：“至于银行名称，似以中国解放银行为好”；后改为：“至于银行名称用中国解放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均可”，最后才改为“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

徐：您说到的这个情况表明，对于银行名称的问题，中央是经过反复考虑才定下来的。

石：我看这个电文草稿时，也是有这样的体会的。

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成立，朱德、董必武作重要指示

徐：董老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后，是不是就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

石：是的。这个筹备处刚成立时，就三个人，南汉宸同志为筹备处主任，将何松亭和我调到这里来工作。那时，何松亭同志是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副经理，董老称赞他是懂银行业务的人，我当时是边区银行的发行科长。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我调到筹备处不久，就见到了朱德同志。

徐：朱德同志是来筹备处视察吗？

石：不是，他是来观看晋冀鲁豫边区兵器展览的，那个展览正好在我们筹备处的院内。朱总司令得知我们是银行筹备处，非常高兴，坐在炕沿上与我们亲切交谈。何松亭同志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抗战前后曾在天津和南汉宸、吉鸿昌等同志一起搞地下工作，那时的公开身份是东北军“边业”银行经理。1942年到解放区来，后到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随同朱老总一起来的艾思奇同志插话说，你是个老银行。总司令又问：你们单位共多少人？何松亭指着我说，除了南汉宸同志，就我们一老一小两个人，估计年底再来几位。总司令问到我的情况，我说，我是在193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总司令说：你们俩都是老银行，业务熟悉，工作好开展。何松亭同志说，工作才开始，前些天才把票版设计出来上报中央批示。此外就是做些调查研究工作，准备向各区要些物资作银行发行准备金，可是现在还没有着落。总司令说，你们现在比中央苏区好多了，那时中央苏区银行行长是毛泽民同志，他的全部家当，用几根扁担就挑走了。现在，我们解放区有很多

银行，不管哪一家都比中央苏区大，资财也多。你们要使解放区的银行联合起来，成为你们的分行，再把各区的票子统一起来，你们的家产就更大了。将来解放大城市，把四大家族的银行没收，变成你们的财产和机构，那时你们的财产就更多了，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家银行了。总司令谆谆告诫我们说，不要小看每件具体的工作，因为我们的每件具体的工作，都是为了为未来新中国做准备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光荣的。你们银行的名字叫中国人民银行好，人民银行要永远为人民服务。

徐：总司令的话很朴实，也对筹备工作提出了要求，给了你们鼓励。

石：现在回忆起来，那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徐：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工作的领导是南汉宸，但主要是在董老主持下进行的。在此之前，您跟董老认识吗？

石：认识。那是这年的9月，我记得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董老来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了解这里的造纸、印刷设备、票版设计、制版技术、生产能力及生产等情况。晋察冀边区的票子，就是在这里印的。当时，董老还为这个局的张树恩同志题写了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

徐：董老大约是在为成立统一的银行作调查工作。

石：所以，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成立后，董老对工作很重视。我和何松亭调来后，又从我们银行调来了武子文、秦炎、孙及民、王厚溥四位同志，加强筹备工作。到了1948年2月，又从北海银行调来赵善普同志。这样我们筹备处共8位同志，在董老统一领导下办理具体筹备的工作。

徐：董老对你们做过具体的指示吗？

石：在1948年的元旦，何松亭同志带领我们六位同志，给董老拜年并向他请示工作。在这次见面中，董老给我们做了很具体的指示。他在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后说：“目前我军已转入战略反攻，从这一情况看，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进程比预料的要快一些，我们应当按照中央的指示，积极地为建立新中国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以避免时局突变而措手不及。目前，华北、山东的渤海地区及西北的黄河以东地区已连成一片，已有了一个可能有计划进行生产建设的环境，我们应当尽力增加生产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但是，各区的货币不统一，币值又不稳定，已成为解放区物资交流、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邯郸会议后，我们调整了各

解放区的货币关系,实行了相互支持,毗邻的解放区按自然比价自由兑换,以及相互通汇的办法。这比以前是大的改进,但是目前仍不能与解放战争的形势相适应。此外,刘、邓大军新开辟的中原解放区,也需要我们的票子来驱逐蒋币和杂钞,占领市场,以保护人民的利益和解放区财产。为此,我向中央提出了筹备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调你们几位来,就是为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做准备工作的。你们的任务,就是搞调查研究、提建议。比如,了解解放区的财政、金融、经济、物价、货币发行的情况,提出改进建议;研究各解放区的银行和货币如何统一起来,全国统一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怎样成立和统一货币怎样发行;我们已有一批中小城市,要研究城市金融如何管理;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经济情况,研究如何对敌进行经济斗争,如何接管官僚资本银行为我们所有的问题。此外,还要购买、筹集钞纸、油墨、印刷机,搞好票版设计、印刷票子,还要向各区筹集货币发行基金等等。总之,要千方百计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创造条件。”董老最后勉励我们说: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每件工作都具有历史意义,是光荣的。

徐:董老的接见和指示,事实上也就成为你们筹备处工作的方针了。

石:董老的指示很具体,所以我们按照董老的指示,开展了工作。一是抓紧调查研究各个解放区货币的发行和物价的情况。因为1948年的春天要召开金融贸易会议,讨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调整地方货币的问题。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事实上是为这个会议准备材料。我们先后为会议提供了《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新中国货币统一问题》等材料。第二个工作就是调查敌区货币、经济情况,研究对敌斗争办法;三是搞人民币的印制,做好人民币发行前的准备工作;四是筹集和管好人民币发行基金工作。

从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到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

徐:你所提到的金融贸易会议,是在什么时候召开的?

石:这个会议,全名叫“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是1948年3月在石家庄召开的,董必武同志主持

会议,是专门讨论创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和整理地方货币的会议。

徐:可是,从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时间上看,这次会议还是没有做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决定。

石:这次会议是五大解放区都参加的会议。在讨论到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上,都认为是必要的,是迫切的。但是,与会者也认为,货币的统一,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问题,它与财政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财政不统一,而首先从货币上统一,那么,某一个地区发生财政困难时,如果增发货币,就可能把一部分负担转嫁到其他地区人民的身上,引起毗邻区之间的矛盾。如果取消这个区的货币发行权,在战时又不容易应付紧急需要。会议认为,在党政领导机关、财政还没有统一,以及西北、山东正在进行紧张的战争的情况下,把各解放区银行和货币发行权完全统一起来,有着很多的不便和困难。所以,会议决定,不采取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统一解放区货币的办法,而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办法,来逐步达到统一解放区货币的目的。

徐:这也就是说,已连成一片的解放区,先进行货币的统一发行,为全国货币的统一做准备工作。

石:这就是个逐步的办法。所以,会议最后确定了这样两条原则:第一,对大体上已连成一片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实行完全合并,两区货币自1949年4月15日起,固定冀南银行币一元等于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十元比价在两区混合流通,以冀南银行币为两区本位货币,并停止晋察冀边区币发行。两区的银行和贸易完全合并。第二,对正在进行战争的山东和西北地区,货币发行和流通仍保持原状,也就是说各区仍有货币发行权。为了使这两个地区的货币逐步过渡到与华北货币的统一,在华北与山东、华北与西北边界上,设立两区银行的联合办事处,来掌握货币的比价,并准备在一年内完成华北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

徐:在薛暮桥的回忆中说到,1948年5月,周恩来同志在听取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报告后说,不能再搞联合政府了,要搞统一政府,决定改华北财办为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

石:中央财政经济部在6月成立,董老任部长,薛暮桥同志任秘书长,南汉宸同志除了继续担任我们筹备处的主任外,还要兼任即将成立的华北银行总经理。所以,我们筹备处除了我和秦炎、赵善普同志继续搞人民币印制保管、发行基金管理外,其余的同志都到

了华北银行工作。

徐：1948年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要由华北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来下命令。这样，华北财委是不是把统一货币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

石：根据中央的指示，华北财委召开了会议，谈到成立统一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在11月份召开的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上，董老这时已经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他主持会议时，临时增加了两个议题，其中之一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筹备处主任南汉宸同志作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说明。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任命南汉宸为总经理。

徐：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1948年12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

石：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时间，中央原来准备在1949年1月1日。在这次会议上，改为1948年12月1日。这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南汉宸同志就把我和秦炎叫到他的办公室，告知了中央这一决定。他说：找你们俩来谈一下如何做好发行工作，如何保证在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成立的当天，就把人民币发到市场上与人民群众见面。你们先谈一下票子的情况。

我汇报说：目前我们的库中，只有50元、20元和10元三种票子，但数量不多，而且主要是50元的。原定的一元、五元和一百元虽然票版已经做好，但一种也没有印出来，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机器印人民币，已有六七天没有送票子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保证在12月1日把人民币发到市场上与群众见面。

秦炎接着说：库存的票子，石雷已经汇报了。委托东北代印的人民币何时能送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南汉宸插话说：中央已经给东北发电报，催促他们尽快运到华北。秦炎说：就是今天到了，还要加印号码图章、检查封包，12月1日肯定指望不上了。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印刷局，停印冀南币和中州币，全部改印人民币。此外，我们争取多制几块版，等平津解放后带进平津印刷。

南汉宸说：原来打算先发一元和五元小票，之后再发大票，以避免引起市场波动。现在，大局已定，只好有什么票子发行什么票子了。发行五十元人民币，虽然也算是大票了，但它也只能买小米十五六斤，再加上金秋季节后农产品上市多及解放区的扩大，估计对市场影响不会太大。而且，人民币刚发行，数量比较少，还不能

一下子占领市场，各解放区的票子还要流行一段时间，之后人民币印制多了再逐步收回。秦炎所提到的停印冀南币和中州币而全部改印人民币是对的，但要检查落实。北平有个清朝建立的印钞厂（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北京印钞厂——徐按），技术和印刷能力都很好，北平解放后，你们先把它管起来为我们印票子。有关人民银行成立及人民币发行宣传的事情，我已经告诉业务处去办，你们要写个发行票子的通告，说明发行的票子面额、式样，以便于人民使用，经我审核后再送到《人民日报》刊登。总之，要把发行工作搞好，保证在12月1日把人民币发行到市场上去。

徐：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是在11月20号结束的，南汉宸给你们布置任务已经23号了，离12月1日也就几天，时间还是很紧张的。

石：是啊！我们根据南汉宸同志的指示，在随后的几天内，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到12月1日前，基本上准备好了。12月1日上午九点多，我一上班，就准备把人民币送到石家庄分行发行。正在这时候，平山的银行同志来取款。我们除了给他们一些五十元券外，其余的都送到石家庄分行去了。大约上午十点多钟，石家庄分行就将人民币发行到市场上去了。人民币的发行，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当时，在石家庄，人们纷纷议论：“这下可快了，你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票子没有？快啦，快啦！全国快解放了。”

徐：是的。人民币的发行，在当时除了有金融的作用之外，也自然要给人民群众带来这种希望，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作用吧。我想，亲历这样的历史时刻，您的心情也一定很激动。

石：当然是很激动的。平山的同志来取第一笔款时，我对他们说，能不能把交给你们的第一张五十元券的人民币换给我，作为纪念？他们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这第一张五十元券的人民币保存到今天。这张人民币冠字为罗马字“111111”，号码为“00000001”。

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制与发行

徐：1988年，为纪念中国人民银行成立50周年，出版了《人民币图册》一书。在这本书上，关于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数量的说法是62种，在其他的材料中，我还看到了71、60、57种等等说法。我想，《人民币图册》的说法应该是权威的说法。请谈谈您的看法。

石：第一套人民币是在全国解放前夕发行的。当时

的形势是,老解放区地方性货币急需用人民币来统一;新解放区急需用人民币来肃清蒋币和各种杂钞。要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市场,促进全国物资交流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全国财政工作的统一,就必须大量印发人民币。但是,当时印制人民币的物质条件,如纸张、油墨、印刷机、号码机以及设计技术力量等等,都很贫乏。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就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条件,印刷人民币。比方说,印钞纸,有的用钞票纸,有的用模造纸、道林纸,还有的用自造的麻纸;油墨,也是有什么牌子用什么牌子的,有什么颜色的用什么颜色的;号码机,有六位的,也有八位的,号码字体不管是粗的细的,都用;印刷机,不管是石印机,还是胶印机、凸版机、凹版机,也都用。所以,第一套人民币不但品种多,而且版式、号码、颜色、纸张及印刷质量也参差不齐,甚至有的票子上,只有罗马冠字而没有印制号码的现象。这样就产生了你所提到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底有多少版的问题。

徐:我看《人民币图册》感到很奇怪,听您的解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有的很精致,有的就比较差了。可是,这本书以什么为根据,把第一套人民币的数量定为62种呢?

石:1988年庆祝中国人民银行建立50周年,要出版这本书。当时,首先就是要确定第一套人民币共出了多少版别的问题。在1987年的1月,货币发行公司找到了我,要我来解决这个问题。1月9日,我邀请货币发行公司的王洪恩、钱币学会的童子玉、原印刷局生产处长左宝昌同志进行座谈。根据档案及各种资料,大家共同商定按下列三条原则来判定发行多少版别。这三条原则是:第一,凡经国务院批准,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日报》上公告发行的才算,否则不算。如,印钞厂设计的票版图景、颜色、金额、票幅而未被采用者等均不算作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二,凡是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作为不同的版别计算:1.票版图景、金额、票幅完全一样,而颜色不同者;2.标版图景、金额、颜色完全相同,而条幅不同者。第三,下列不作为不同的版别,即票版图景、颜色、金额、条幅完全一样,只是号码位数及号码粗细不一的。

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审定,第一套人民币共发行了62种版别,并以此印制了《人民币图册》向社会公开发行。

徐:现在发行的人民币,票面上印有毛泽东的头像,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当时有没有将毛泽东的头像

印在票面上的动议?

石:事实上,在当初印制第一套人民币时,华北财办按照中外一般将开国领袖像印在中央银行票子上的习惯,也提出要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票面上印上毛主席的像,并发电报告诉代印人民币的东北局。但是,毛主席让人给中央工委发电报,明确地说,不同意。毛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再说吧。

徐: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大约只是找个拒绝的理由而已。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非常谦虚的。

石:董老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把南汉宸同志请来,把中央的电报给他看了。南汉宸同志说,中央的指示,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可是,票子的图案用什么呢?董老说:毛主席像不能用,是不是考虑用解放区工业、农业生产图景呢?南汉宸同志说:我看可以,目前也只能如此了。董老说:好吧,票版图案设计就这样定下来吧。随后,董老将原来设计有毛主席像的草稿版样,以及他题写的“中国人民银行”拿出来,交给了南汉宸同志。

南汉宸同志立即给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局长王文焕同志写了一封信,连同董老写的行名及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版样,一起拿到我们筹备处。他对何松亭和我详细讲了与董老商谈的票版设计的问题。他对我说:刚才我就给王文焕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毛主席不同意印他的像以及董必武同志有关票版图案设计的指示。现在需要派人送到印刷局,以便让他们尽早设计出新票版来,以争取时间。我想请石雷同志跑一趟。

我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后,除了将南汉宸同志的信转达外,还同原票版设计者王益久同志作了长谈,说明董老对票版设计的要求等问题。王文焕同志根据董老和南汉宸同志的指示,不久就设计出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图案的票版。如有小毛驴拉粪、农民用轱辘浇田、放牧马牛羊、牛马耕地、农妇纺线织布等农业图案;反映工业的有火车、帆船、工厂等图案。这就为人民币的印刷制作做好了前期准备。

徐:您提到的董老题写行名的事情,我顺便问一下,现在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还是董老的字吗?

石:现在的不是了,第一套人民币是董老写的。中央批准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后,南汉宸同志就请董老题写行名。董老说:我写的字不大好,最好请林老他们来

写。这里所说的林老他们,是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朱德“延安五老”。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老才答应下来。这次,董老将题字交给南汉宸同志时还说,字写得不好,由制版的同志去挑选用吧。我看到过董老的题字,写满了整整一张纸。其中有“中国人民银行”,有“圆、角、分”,还有大写的数字和汉字的数字。

徐:1955年之后发行的人民币,为什么不用董老的字了?

石:在准备发行新人民币时,南汉宸同志找到他的同乡马文蔚。马的字写得很好,南汉宸同志让马写写看。后来,新人民币发行时,就用了马文蔚的题字。

发行三元券人民币和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券的内幕

徐: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其面额系列都是一、二、五,就是说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主币为一元、二元和十元等等。可是,唯独在1953年3月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发行了三元券。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石:这是为了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准备反攻大陆,海峡两岸关系比较紧张,而香港、澳门还在英国和葡萄牙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在美国的技术帮助下,印制假人民币,空投或者经港澳走私到大陆,以破坏人民币的信用。

徐:那时就出现了假币。那时可没有现在验钞机之类的设备,分辨真假是很难的。

石:是啊!群众是不能区别真假的,银行也只能用显微镜来区别,是不能阻止假票流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行的货币面值越大,台湾空投或走私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金额数目也就越大,对我们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为了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国务院决定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五元以上的大票。但是,只发行一元券又太小,对国内流通造成影响。所以,就决定增加发行三元券人民币,用以调节流通领域。

徐:这样说来,三元券人民币的发行,还是担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的。

石:后来,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少量人民币也可以出境,三元券人民币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收回了。

徐: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发出了

《关于限期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限期收回的三种人民币都是1953年版的,黑色、工农图景的十元券;酱紫色、各民族大团结图景的五元券;深绿色、井冈山图景的三元券。收回的原因,通告中说是“调整人民币票券种类,便利流通使用”。但是,有的材料说,真实的原因不是这样的。您能谈谈所了解的情况吗?

石: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券人民币,其实是为了防止人民币的信用遭到意外的破坏。解放初期,中苏两国的关系是很好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蜜月时期”。那时候,苏联是热情支持和援助我国的建设的。在准备印制新人民币的时候,为了使新币印制精美,防止假票和维护人民币信用,中央决定,一元及其以下的辅币在国内印制,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票券委托苏联代为印制。五十元和一百元的票券,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后来撤销了。这样,在苏联印制的只有三元、五元和十元票券。这三种票券的票版和印刷资料也就留在了苏联。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也就无法收回这些票版和印刷资料了。为了防止意外,维护人民币的信用,国务院断然决定,把由苏联代印的这三种票券收回。

徐:想不到这三种票券从发行到收回,竟然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中苏关系由蜜月到交恶的历程。

石:当然,这也都是过去的历史了。对于像我们这样在金融战线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追述人民币的历史,往往激动不已;看到后来发行的印制精美的票券,也高兴得爱不释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相信,人民币的印制将会更加精美,不但用作商品交换的媒介,还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收藏品。

(责任编辑 洪振快)

读者来信

贵刊今年第10期《反右运动的六个断面》一文,提到浙江省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四位领导干部,准确表述应为“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检察长彭瑞林,省委委员、财贸部长孙章录”。三位常委遭打击,刚好是当年浙江省委常委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

又文中提及另有三位省委委员被打成右派,有误。省委委员中除孙章录被错误处理外,另有一位候补委员(黄源)被打成右派。

浙江读者 何其

《芦荡火种》的幕后风云

● 陈徒手

196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北京京剧团倾力演出的现代戏《芦荡火种》成了最红的剧目之一，连毛泽东应邀观戏后难得破例一回，忍不住改了剧名叫《沙家浜》。这部戏后来定为“文革”八大样板戏之一，使不少年轻观众误以为它是在“文革”期间完成创作并演出的，实际上它在“文革”爆发前夕就已经定型了。

时任北京市委领导的彭真比较喜爱京剧，与京城的京剧名人也有一些较为密切的私下联系。1958年“大跃进”时，彭真和市委其他领导也曾经有过尝试排演现代戏的念头，但遭到一些名演员的变相“抵制”，如马连良等明确表示不愿参加、不愿看现代戏，此事只好暂且搁置。到了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连续两次对文艺工作下了严厉的批示，北京市文艺界处于“极大震动中”（市委报告语），首当其冲地成了被贯彻的重点对象，危急之下市委决定加快排演出一批高质量的现代戏。

从现存史料来看，北京市委在1963年10月间定下改编《芦荡火种》和《杜鹃山》，此事是在毛泽东下发的第一个批示之前敲定的。估计是北京市委高层隐约观察到中央的动向和“四清”运动的走向，感觉到一种兵临城下的压迫感，顺势而做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以后还为这个时间表做了一点检讨：“市委宣传部长领导文艺工作是有不少缺点的，例如演革命现代戏，到去年下半年我们才开始认真抓。”（见1964年9月3日北京市文艺工作会议总结报告）

有意味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的政治关系较

为微妙，彭真和柯庆施作为毛泽东先后欣赏的一方强势诸侯，在当时中国权力格局中两人相互之间有聪明的规避也有暗地里的角力。两座城市党政、经济、文化之间的来往总体上是敬而远之，和而不融，偶有不快之事发生，双方也尽力掩饰。这次挑中改编的两部戏，恰好都是上海的原创作品，《芦荡火种》（早期剧本叫《地下联络员》）已是名震一时的沪剧，《杜鹃山》则是初露头角的京戏，反映的都是华东区域的红军游击队、新四军的故事。北京方面自己也有一些原创作品问世，但似乎演出效果不甚理想，知名度较低。为何此时偏偏选中上海的作品来改编，而且《芦荡火种》后来改编的艺术成果大大超过原沪剧，确是有令人回味之处。

“文革”后文艺界还有一说法是，江青给北京推荐了《芦荡火种》，称江青的做法颇有政治玄机，意在“经营自己的试验田”。“文革”初期一些红卫兵小报也宣扬了江青的这一功绩，指责彭真及旧市委从中阻挠。从现存的市文化局档案来看，还没发现“江青推荐”的相关文字内容。不管如何，此事最后拍板的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改编工作启动后彭真和江青之间确有一些相互牵扯、不满之事发生。江青是逐渐插手，欲罢不能，后来连《杜鹃山》二三百字演出消息稿都要她亲自过目才能刊发。

北京京剧团副团长、导演肖甲1964年曾到上海专门了解作品、作者的相关背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还出面接待并予以支持。张春桥和市委文艺处章力辉专门提到《杜鹃山》的编剧王树元，说他的父亲是被我政府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王本人在“反右”时险些被划为右派，表现落后，因此《杜鹃山》上演时上海市委曾指示对作者不要过多宣传。

张春桥赞赏北京剧团下厂下乡为工农兵演

出,在上海文艺界千人大会上还特别提到赵燕侠在这方面表现很好。张所说的话确切,《芦荡火种》演员们这一期间几次下公社下部队体验生活,编剧在城里写完后要特意赶到公社,在老乡的屋里给下乡的演员们读剧本。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正因经过连队锻炼,改变了自己排练迟到的习惯,甚至提前十几分钟到达,有时排几遍不能通过仍按导演意图继续排练,让剧团人看后觉得“赵团长确实改变了”,因为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

剧团党总支事后总结道:“演员及有关创作人员接到剧本之后,首先必须下到有关地区去生活一个时期,然后才可进入排练,将来应该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见1964年7月《参加1964年北京现代戏会演总结提纲》)这种体验生活方式一直保留到“文革”后期,形式主义愈演愈烈,极为生硬。北京京剧团后来排演《红岩》改编的《山城旭日》,竟让众多演员搬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原址“复原生活”,甚至让演员戴上手铐,坐在稻草席上,让穿着国民党军队服装的人员“审讯”。

二

彭真等人推崇《芦荡火种》的主题框架,但对沪剧本也有不甚满意之处,主要是觉得结构过乱,一些人物偏弱。摘右派帽子不久的汪曾祺排在京剧本编剧的最后一位,但却是得力的执笔者。他们先后改出两稿并投入排练,彭真看后表态:“停演重排。”生怕此举泄气,彭真过后又说:“鼓足干劲,不要着急。”为了找到问题所在、总结经验,彭真还特意调上海沪剧团来京演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北京京剧团就近细心观摩,北京演员连看了两场,并与沪剧团举办一次求教性质的座谈会。

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对改编工作抓得很紧,态度相当严厉,再三要求搞现代戏一定要高标准高质量。他说:“几时搞好了,几时往外拿。凡是粗制滥造的人,就给他扣一帽子‘破坏戏曲改革’。我看这也不为过。”

李琪强调最多的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建成社会主义是绝不可能的。他举例说,赫鲁晓夫之所以能上台,也与斯

大林不搞思想革命是有关的,斯大林在1930年批判过德波林哲学,后来就很少搞思想革命了,苏联舞台上散播了大量资产阶级的东西。(见1964年9月3日市文艺工作会议总结报告)李琪此中所说的观点,可视为党内高层干部狠抓文化革命的理论动机和出发点。

1964年1月中旬完成最后的修改,也就是删去一场茶馆戏,改动了部分情节,增加了正反面的人物和一场戏,调换了三个角色的扮演者。剧团党总支书记、《芦荡火种》编剧之一薛恩厚后来在北京市第五届人代会发言中提到以往修改不好的原因:“我们没有突出政治,没有做到以毛泽东思想统率一切,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往往不是政治标准第一,而是强调有戏没戏,往往对脱离政治、所谓‘有戏’的地方不愿意割爱,戏当然也就改不好。”他说,搞革命戏是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打仗,必须有敌情观念。

每天排练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在现场提出了“百排不烦、百练不厌”的口号,各小组为此相互贴出挑战书,最响亮的一个提法是“先做革命的现代人”。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在1965年9月市人代会发言中回忆了当时排演的磨合情形:“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中间经过了四次大修改和无数次小修改,一个动作,一句唱词,一句唱腔,都经历了不断的推敲加工。有一段时间,演出三十场就改了二十九场,几乎天天修改。”

作为女一号阿庆嫂的扮演者,赵燕侠的言论相当高调,影响和带动了团内一批老艺人,剧团党总支对她的言行一再予以表扬。她说:“京剧革命是要出自每个人的本心,这是方向,我们一定要记牢,不怕困难,精益求精,把现代戏一定演下去,演好。”“只要党说话,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赵燕侠的这些话颇有代表性,剧团学习会基本上各人都是此类表态。在几番政治风雨洗礼后,“四清五反”运动呈现高压态势,毛泽东最新的批示又引来深不可测的文艺界整风学习活动,困惑不安的老艺人们只能在政治漩涡中表达顺从和投入之意。剧团党总支1964年7月向市文化局党组汇报时,涉及演员的思想状况还是表扬居多:“少数名演员,如赵燕侠、谭元寿、马长礼等对党提出的文艺方向、方针政策没有抵触,接受

较快。他们有一定的艺术条件,有创作热情,并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和贯彻党的号召和指示,积极主动排好现代戏,对自身的革命化也有实际表现。部分高薪人员自动申请不拿保留工资,改变生活方式。”

相对不易管理的名艺人,剧团党总支对年轻的基层演员把握得较为轻松,认为他们艺术包袱小,对传统戏脱离群众、正逐步走向衰亡的现状看得较清楚,因而革命起来负担不大,普遍拥护演革命现代戏。党总支还举例说,许多小生演员开始喊大噪,一些演旦角的也开始找大小噪结合的方法,许多人为扮演战士剃光头,下部队下厂下乡的决心很大等等。

在繁忙的排演工作中,剧团在1964年上半年已有近半数的人员完成了一个月劳动锻炼的任务。按照周恩来的最新指示,剧团党组织表态说:“明年下决心坚持执行下去半年的规定。”周恩来也留下活话,六年中至少要下去三年。而相比较而言,当时毛泽东说的话分量更重:必须下去,才算是贫雇农,至少走马观花,当个富裕中农,而不下去,就当地富反坏右。

一个任务很重的演出单位要一年间在厂矿农村锻炼半年之久确实难以想象,在实际操作中困难甚大。此举象征性表态成分居多,剧团领导穷于应付,只好高喊空话套话。他们在各级会议上说得最频繁、最有力的几句话是:“北京京剧团光荣地参加了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会演给我们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是进了一次京剧革命训练班。”

三

1964年3月11日,彭真和负责会演的中央宣传部领导林默涵观看了《芦荡火种》彩排,当即批准这部戏公开演出。彭真在演出后与演员见面,想起四个多月历经风险的改编经历,不禁感慨道:“这个戏要按第一次彩排时那样演出,就失败了。那时的剧本有很多缺点,表演也很不熟练。”他有些欣慰地说道:“搞出几个站得住的戏,反对的也就拥护了。”(见1964年4月22日《北京京剧团关于〈芦荡火种〉演出情况汇报》)

3月31日起《芦荡火种》开始正式登场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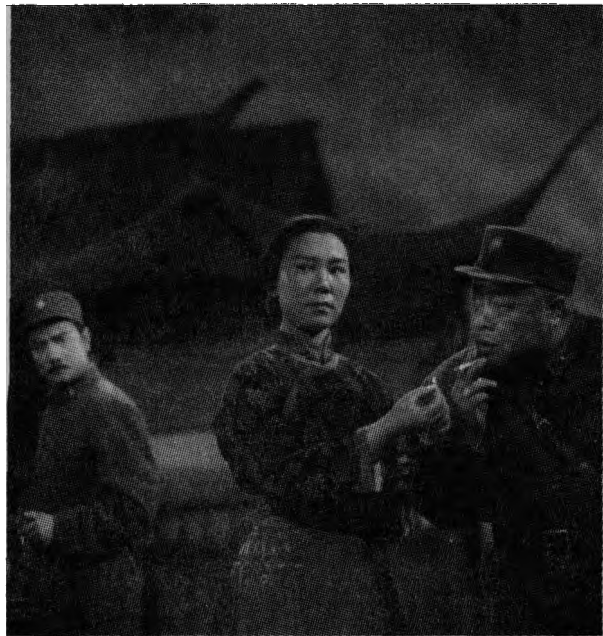
出,连演11场,观众达1.6万多人次。由于不少演员要投入到新剧目《杜鹃山》的排演,只好暂停此轮公演,此刻已经满城争说现代戏,人们口口相传现代戏的新奇和荣耀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该剧的宣传力度大大超过先前的当代剧目,刚出演几天,4月5日电视台进行转播,7日中央电台播出全剧录音,北京几家报纸也开辟专版专栏,以篇幅较长的文章予以配合造势,每周出刊二至三次。

3月31日首演时,康生答应来看戏,但因参加会议来得略晚一些,看后兴致很高地上台和演员握手、合影,说的多是称赞之语:“这个戏很好,这个戏不仅是内容上新,而且在艺术上也开了个路子”。他再三叮嘱,一定要把戏再磨得好一些,“(否则)弄不好就会给大家一个印象,仿佛京剧就是不能演现代戏似的”。康生对陪同的林默涵说,我要向总理推荐这出戏。

4月10日,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杨尚昆等高层领导,连同各省市负责财贸的书记、部长来看戏,一致认为这个戏是出色的,认为赵燕侠、马长礼、周和桐等名艺人演得都很好,李富春甚至说:“这么多现代戏,还是《芦荡火种》成功。”薄一波先说扮演小凌的青年演员段瑞英演得好,又夸饰演胡司令的周和桐出彩,“比看真的黑头还好看”。爱看戏的薄一波还建议说:“京剧的精华都要留下来,你们可以叫李世济搞搞现代戏,我喜欢听程派。”

在后台,这几位副总理喜中有忧,他们对传统京剧的东西能否保留或结合,还是心有戚戚。剧团事后汇报中记录下他们的几句提问:“在现代戏中,小生怎么办?”“反二簧等板式是否运用得上?”等等。

4月26日晚,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等来到剧场观看,这是第二轮演出。中间休息时领导人坐在一起闲谈,刘少奇、周恩来流露最多的是一种深层次担忧后的宽慰释怀,是政治家面对复杂时局的暂时轻松,这点感受在现场的市文化局官员事后追记的一份汇报中看得格外清晰,他们二人都说:“戏演得好,像京戏,京戏过了关,其它戏曲剧种演现代剧都能过关了。”周恩来还特别谈到改编的进步:“剧本有些地方改得比沪剧好,更合理了。”(见1964年4月26日北京京剧团《〈芦荡



《沙家浜》剧照

火种)的反映情况))

中国剧协、文化部负责人田汉、周巍峙、李超、任桂林等观看的是3月6日的彩排,老戏骨田汉对比前后观剧的印象,认为新排的戏大有改进,剧情更紧凑了,阿庆嫂的形象比上次好,刁德一写得满些,身段与生活结合得比上次好多了。他还指出:“戏的前半部我们的人显得太被动,阿庆嫂的左右还可多些人,不要使人感到她孤立;后半部戏敌人又过于无能,敌人很脓包,最后一场像假的,怎样还要使人相信一些才好。”他的这个意见过于“尖刻”,也不够“圆润”,从记录上看似乎无人接茬。

激动之余,田汉突然提出能否给剧中的阿庆嫂配一把小手枪,而且要在明场交代。这个建议出乎意料,为何要配枪?理由何在?田汉没有具体说明。说得嘴快、随性,符合田汉散淡、无遮拦的一贯作风,让听者一阵发愣,不知所措。

比起田汉不讨好的大段评说,曹禺的观后感显得格外简洁、到位:“演得好,演得成功,京剧演现代戏大有可为。”

四

1963年中国剧协开会时,不少与会者对排演现代戏心中无底,有的显得一筹莫展,愁苦连天。中国京剧团老艺人袁世海1964年3月回忆

说,当时会上有很多分歧意见,什么论调都有。他在会上明确表态,对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我们贯彻执行得不好,是我们落后了。

袁世海的下面这段话被编入北京市人委《情况简报》1964年第38期增刊中,作为名艺人积极上进的代表性言论上报给中央,可以从侧面看出当年演员群体苦苦寻求思想变化的一个轨迹:

我们排练《社长的女儿》,到顺义县牛栏山公社体验生活,向农民请教,农民拿烟卷、背粪筐的动作和在城里听说的完全不一样,真是耳闻不如眼见,更觉得下去体验生活是正确的。在那儿演了《社长的女儿》以后,我问几个十几岁的小孩:戏演得好不好?是什么意见?他们张口就说:“好,是阶级斗争。”可真是极少听过这样的话。我演了几十年戏,听过很多人的看法和意见,不是说唱得不错,就是说打得好。京剧现在是找到了起死回生的出路,找到了方向。在城里演这个戏,有一些老观众就是眼盯着程式不放,但是我们的思想应明确,不能为少数人丢了工农群众。

1964年4月初,《芦荡火种》剧组学习会上念了不少文化局党组下发的材料,其中这份袁世海的讲述颇令新老演员们触动。他们逐渐意识到,在突出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之下,传统戏剧终于到了伤筋动骨、改头换面的时候,传承几百年的表现样式、表演内容都要被“历史车轮”碾过而重新装配,物是人非,人随景移,所有的艺人都毫无例外地置放在被改造、被教育、被驯服的境地,执行的舞台任务是“用戏剧武器参与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曹禺在1965年9月北京市第五届人代会发言用语)。

袁世海批评一些老观众“老盯着程式不放”,名演员李世济也在学习会上检讨:“每次观摩,总是不自觉地比较注意艺术技巧,不注意思想内容。”剧团党组织把这些归之于“因袭的旧作风、旧艺术观”,认为旧东西在名演员、名琴师的身上还是根深蒂固的,“有时简直是一种习惯势力”。比如说,许多演员观摩现代戏也是去“看绝招”、“听唱腔”,有些艺术上有一套的演员在排戏中会为自己安排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亮相、锣鼓,有的抱着老一套不肯放下,表现出严重的权威作风等等。对此,剧团党总支笼统称之为“闭门自守的封建落后的表现”,都需要在京剧革命中采取有效

斗争的方式。(见1964年7月31日北京京剧团党总支《参加1964年京剧现代戏会演总结提纲》)

要让剧团具有强烈的政治挂帅的空气,彭真和市委指示革命化的办法有二:一是学好毛主席著作,二是到工农兵中去扎根,不作浮在群众头上的氢气球。要认识到离开毛主席思想寸步难行,不学毛主席著作就干不好革命。饰演新四军战士的演员们在出演武装斗争的场次时,怕摔伤,怕成残废,不愿演难度较大的动作。剧团党总支组织演员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讨论时引导演员要做新时代的愚公,要有“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的英雄气概,努力解决“怕”的思想。结果大家一鼓作气,重新设计了“奔袭”、“聚歼”两场中的舞蹈和武打动作,并使“突破”一场中翻墙的功夫更加硬朗。剧团党总支在1964年7月给市文化局汇报中说,“我们深深感到毛主席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尝到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甜头。”

饰演指导员郭建光的谭元寿不识简谱,他的唱腔设计先后易稿十余次,每改一次他都要随改随学,党总支书记薛恩厚称之为“要下很大辛苦”,并说:“在克服了怕改的思想以后,谭元寿同志做到不怕改,欢迎改,说改就改,并使谭派艺术有所突破、有所发展”(见薛恩厚在北京市第五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发言《不断革命,精益求精》)。但剧团领导也几次批评谭元寿排练中突出个人、艺术保守的不良思想,认为他有时不能按设计的唱腔唱,还要求改辙,对大家提出的意见不够虚心等等。领导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他的不良思想如不改正,会影响全剧的完整性。

谭元寿承认了自己的不足,多次表示要在排演工作中逐渐改进。《芦荡火种》上演后,谭元寿竭尽全力,执意要演出“兵”的味道。可是,在反映高层领导观剧的几份汇报中,几方领导人士表扬了一大串主演(甚至到饰演新四军卫生员的青年演员),偏偏很少出现谭元寿的名字,是不认可他的新四军指导员的扮相还是在政治上有意被忽略?当时剧团上下不得其解。反而在1964年4月22日汇报中,特别提到“(谭元寿)有的地方不够恰当,还要通过实践再行解决”。这种变相敲打的滋味,很令一些名艺人不解和苦恼。

五

《芦荡火种》上演后,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从不同方面收集社会反映,前期时多半是戏剧行家的正面肯定意见,这种称赞性、鼓励性的言语很让相关领导和创作、演职人员受用和满意:

徐兰源老先生看了连排后,说:“看了戏,感觉很舒服,不生硬,很像京戏,运用程式和音乐方面也很协调。”他在3月28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对京剧特色的看法》一文,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最近看了京剧《芦荡火种》的彩排,我很满意。别人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了四个字,‘很像京剧’。”

老艺人姜妙香说:“像这样改革排演京剧现代戏,将来能超过传统戏。小生演现代戏,就得用大嗓。过去演现代戏没有演好,就是没有下功夫。”

叶盛兰说:“我有病,看戏怕坐不住。可是开始一看,就抓住了我。每场都有戏,怎么听都像京戏,由头至尾,音乐设计安排都是京剧的东西,我想到哪里应该有唱,果然就安排了唱。有人说,现代戏里唱慢板不成。我听了这出戏里的慢板,很舒服。总的说,整个是京剧的风格。”(见1964年4月22日《北京京剧团关于〈芦荡火种〉演出情况汇报》)

这部戏轰隆隆地上演触及不少老艺人,原有的艺术格局、秩序被打破,逼得他们不得不寻找角色的转换途径。马连良提出非把《杜鹃山》一个普通的群众角色演好,并喊出“超《芦荡》赶《芦荡》”的口号。谭富英看了后表示争取要演《芦荡火种》的陈县委一角和现代戏中的老年人。

最焦急的是张君秋,他执意要饰演《杜鹃山》里的女一号贺湘,剧团领导劝他先不要扮演这个角色,否则演不好更会造成情绪低落。他激动地嚷嚷:“我试试都不行吗?我是‘外秧’也要给我想想。”意思是埋怨剧团领导现在只培养赵燕侠而不培养他了。后来经再三劝说,他才转意去尝试现代戏《红色医生》中藏族女医生卓玛一角。

马连良此时的遭遇颇具代表性,可以看出老艺人在转型时代仓皇失措、逐渐沉浮的心路历程。现代戏初起时,马连良的接受是仓促、被迫的。但他出于艺术本性也有几声叫好,比如《奇袭

白虎团》中志愿军战士翻“倒身虎”，落地时用一只臂膀向前侧身卧倒，他看了后觉得比传统戏的固定翻跌程式要难得多。

马连良请来了好友、北大教授吴晓铃代笔写了《挂席应教集众功》一文，题目是活用了杜甫的诗句。文中写道：“现代戏的扮相和服饰比传统戏简化了，给演员减少了在形体动作上的障碍，似乎应该感觉轻松愉快，可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习惯，又感到有些‘没抓挠’，以至手足无措。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够演得舒服、演得好呢？我觉得，基本功的锻炼应该比以前更为严格才是。”

文章原稿送上去后，颇让剧团领导不快。剧团副团长、导演肖甲认为文章暴露了马连良的错误观点，就是觉得只要练好基本功，不需要深入工农兵生活，不必改造自己，也是可以演好现代戏的。（见肖甲1964年致薛恩厚的便函，不具月日）肖甲自然不同意这篇文章见报，因为存在批不批、驳不驳的问题。

马连良的错误言行陆续反映上来，比如说排练《杜鹃山》时组织学习几篇毛主席的文章，马连良却说：“谁的主意？读这些干吗？念多少（毛选），演不好戏，还是演不好的？”别人在对台词、做动作，马连良却在旁边说话，还拿着碗看花纹等等。知道内情的人还看出，马的学生李慕良为《芦荡火种》设计音乐唱腔，马连良觉得这是李对他叛变，脸上常有不悦的神情。

最严重的事情爆发了，1964年6月27日上午马连良在排练场上借机大骂李慕良，震惊了市里的领导。6月29日下午，剧团为此召开了工作检讨会，马连良火气未消，讲了半个多小时，大声说：“李慕良是我养活大的，他现在骄傲得不得了，党不管他，我要管他。他在我家叫师娘都不站起来，我吊嗓子，请他他才来。有一次在彭真同志那里，他在沙发上一坐，我看了都不顺眼。入党以后更骄傲了，只听你们仨的（指剧团领导），你们仨不认识他，他是白眼狼。”马连良一边骂，一边还不断解释：“我骂的是李慕良，不是骂的党员。”

《芦荡火种》里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批评马连良说：“你这次骂人不是私事，你骂‘谁给你撑腰’，骂的是党，你发脾气是因为《杜鹃山》中减了你的戏。1957年‘反右’时领导保护你过了关，党不但既往不咎，还给你那么高的地位和荣誉。你

不好好想想这些，反而说‘不管谁给李慕良撑腰，我也要跟你斗斗’。你这艺术家的政治良心何在？”赵燕侠说：“现在正是轰轰烈烈搞京剧大革命，马团长不但不很好的支持，反而经常给我们泼冷水。这次大闹排练场还说什么，‘这样一闹死也甘心’，这句话居心何在？”肖甲点了马连良的要害问题：“你没学过社会发展史，你们还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

连开了几次会后，马连良终于低头认罪，他在会上表态：“我思想上确实有很多旧东西，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日后我决心把旧的一套删了去，新立一本账，保证今后决不再犯。”剧团党总支6月30日汇报中还写道：“会议进入相互交心的阶段，有说有笑，马连良也眉开眼笑。（对于会议的效果）包括马在内一致认为会开得很好。”

“马连良骂人”事件构成京剧革命中最具斗争锋芒的场景之一，性质确定为马连良因反对现代戏而指桑骂槐。李琪在市委高层会议上说：“北京京剧团这次对马连良的处理比较正确，这么一来他就老实多了。我们对京剧老艺人的使用，有一种赎买之意，对他们能改造到什么程度，不能与一般演员要求一样。但也有个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党领导他，还是他领导党。”

李琪又说了几句和缓的话：“像马连良这样的人，不可能要求把他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只要他在党的领导下好好演戏，就可以了。”外部环境实质上已不可能让马连良“好好演戏”了，一个又一个政治磨难在等待着他，他也彻底丧失“骂人”的勇气和资本。

六

到1965年9月，《沙家浜》已经演出332场，观众近50万人，遥遥领先于其他革命现代剧目。也就是说，全北京城有近一成人现场观看了该剧，阿庆嫂、郭建光、沙奶奶、胡司令、刁德一成了那一茬北京人印象最深的戏剧形象，近距离接近京剧艺术并从中接受革命化的教育是在严酷政治环境中民众难得轻松、前所未有的时刻。

为了让更多的工农兵能够看得到、看得起革命的现代戏，市文化局还有意降低剧场演出票

价,规定《沙家浜》票价最高不得超过一元。

1965年9月9日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在市第五届人代会发言中宣布:“革命现代戏在北京舞台上已经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今年上半年市属艺术表演单位演出了95个剧目,革命现代戏就有86个,占到百分之九十二;在演出总场次的2044场中,除了6场之外全部是现代戏。”而在1961年、1962年市属艺术表演单位演出163个剧目,现代题材的只有20个,约占百分之十二,区县剧团现代题材的戏只占百分之三。

赵鼎新在会上还特意解释说,1965年上半年市属表演单位所演的七个剧目、六场的传统历史戏,属于特例,因为是在五一节期间,为了照顾来访的外宾、华侨才获批准演出的。这也意味着,除了特殊的官方安排,原有的传统戏已经基本被摒弃。

喜欢戏剧的彭真对现代戏唱独角戏、传统戏消失也有一些个人担忧,曾在1964年7月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悄悄指示:最近可以把历史戏稍微搁一搁,集中精力突破现代戏这一关,搞一个时期,把革命的现代戏演顺了手,再同时少量地演一些古为今用的历史戏。这段话说得谨慎,分寸拿捏得小心。

演现代戏形成了浩大的声势,传统戏的“堡垒”已被“突破”,长达一年搁置了传统戏的演出。1964年底北京市京剧团根据彭真早先的指示内容,准备对历史剧目进行慎重认真的挑选,演出少量的历史戏。为此,市委宣传部1965年1月5日准备了一份给中宣部的请示,内中称:“我们考虑,各京剧团在保证执行以革命现代戏为主的原则下,可以少量上演一些经过改编或加工整理的古为今用的历史戏,这是因为,一方面,有些经过改编或加工整理的历史戏对观众还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或增加历史知识的作用,有些观众也还要求少量地看一些好的历史戏;另一方面,演出少量历史戏,对促进现代戏艺术质量的提高也有一定的作用,戏曲教学工作也需要安排一定数量的历史剧目。此外,有少数老演员排演现代戏有一定的困难,如果不演历史戏,他们将长期不演戏,吃闲饭。”

市委宣传部起草人费尽心思找出了这些理由,但再三衡量之下,知晓更多高层运作内幕的

宣传部长李琪还是扣下了这份请示。实际上李琪本人在1964年8月14日在文艺界总结大会上还说了这么一句:“也不排斥用共产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写的历史戏。”但事到临头,李琪也是有所畏缩的。这也意味着在北京舞台上传统剧目很难再上演,这份政治禁令一直延伸到“文革”结束。

事实上,在1964年初夏,市委及市委宣传部已经从内部渠道知道毛泽东接见《草原烽火》演员时的讲话内容,毛此次谈话中对历史戏并不持全盘排斥的态度。他说,三国戏可以增加人的历史知识,《击鼓骂曹》、《捉放曹》为什么不演?李琪在一些党内会议透露了毛的点滴讲话精神,但在具体宣传工作中,一旦遇到像传统戏能否上演的问题,在漩涡般的政治压力中,对最高领导的斗争动向无法把握,李琪只能选择坚决否定的激进左派方法。

经历了两年多的京剧革命运动,作为具体领导的李琪曾在全市文艺大会上很深情地说道:“京剧原来是落后的,现在一跃而成为先进的。”转年“文革”爆发,继邓拓之后李琪愤而自杀,他的罪名一部分就出在“京剧革命”这一块,“落后”还是“先进”成了纠缠他不安的最大心结之一。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京剧革命”源头补遗

● 胡金兆

读《炎黄春秋》今年第8期王红领《“京剧革命”与李琪之死》一文，对李琪同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品格深为敬服。而就所谓的“京剧革命”种种，愿就所知补说一二；当时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工作，很多事是亲历。

江青的“京剧革命”是有批有树，两手交替。早在1962年她就开始抓批《李慧娘》、《谢瑶环》等，直至批《海瑞罢官》，罪名一律是反党。1962年秋，我在办公室曾接到中央办公厅一个电话，让查找一篇署名“寒星”的谈鬼戏文章。我汇报后去查找，因没有文题、刊载报刊，一时没找到。后来才知中办找的是廖沫沙同志以笔名“繁星”写的《有鬼无害论》。公开批判是1964年7月31日在北展剧场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闭幕总结大会上，由康生咆哮点名孟超新作昆曲《李慧娘》、田汉京剧新作《谢瑶环》是“反党”开始。（康生与孟超是上海同窗，对《李慧娘》康生出了主意，大加吹捧；风向一变立即落井下石。）接着对两剧的政治批判文章见报，主要由中国剧协写作班子受命写出，修改多次才准见报。直至由江青直接组织，1965年11月推出姚文元的批京剧《海瑞罢官》之文达到高潮。这中间有毛主席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两次关于文艺的批示，使江青等有恃无恐。

江青的“京剧革命”的树，其实就是“革命样板戏”，其源头要比王文所说为早，时间是1963年中秋。是晚中南海有晚会，赵燕侠有任务，江青来看戏，接见了赵，做了谈话，中心意思是现代戏是方向，要大搞京剧现代戏。拿出沪剧《革命自有后来人》、《芦荡火种》和话剧《杜鹃山》的剧本，让赵组织排成京剧现代戏，还鼓励赵把1958年演过的现代京剧《白毛女》再加工重排演出，要搞出“几个样板”。此事次日我通过赵的丈夫张钊得知。

江青这么大力推行京剧现代戏，当时我就感到她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刚闭幕的、由中宣部召开，周扬、林默涵主持的“首都戏曲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此会针对1962年再次发生戏曲不良剧

目泛滥（与康生1961年春紫光阁讲话，鼓吹《十八扯》、《胭脂虎》等戏有关），再次强调戏曲“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贯彻周总理有关戏曲剧目应“整理改编优秀传统剧目、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新编历史剧和表现革命生活的现代戏三者并举”精神，要求“方针明确，道路宽广，步子稳妥，措施跟上”，且明确说“推陈出新不等于就是现代戏”。江青的中秋布置，是凭着她的特殊身份和尚方宝剑，针对上有刘少奇、彭真领导，下有周扬、林默涵主管的戏曲工作，而另搞的一套。

1963年12月，常香玉率专演现代戏的河南豫剧三团来京演出《朝阳沟》，亲自出演拴宝娘。江青首次在公众前露面：在吉祥戏院看《朝阳沟》，戏后上台接见常香玉说：“这样你的方向就对头了。”事后常香玉请我据江青讲话精神整理一文表态，发表在《戏剧报》上。

《“京剧革命”与李琪之死》一文说，江青强令让删改新排京剧《芦荡火种》中最精彩的“茶馆智斗”一场，我作为一直跟踪此戏的采访者却未曾与闻。1963年底，为帮助排演京剧《芦荡火种》，上海人民沪剧团曾专程来京演出《芦荡火种》示范，丁是娥、邵滨荪等演出的“智斗”一场，相当成熟精彩。之后赵燕侠、马长礼、周和桐表演的在《芦》剧中的“智斗”，不过是把沪剧演唱京剧化了，大框架没有动。

江青懂戏，曾在山东实验剧院学话剧时，向清朝内廷供奉、尚小云的业师孙怡云学过京剧，一度还随京剧班跑过江湖，唱二牌青衣，1932年到北平唱戏，著名红生李洪春曾为她配演。除非她故意找茬、整人，要删除京剧《芦荡火种》最成熟的“智斗”（有如《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公开硬干，她会立即显得自己外行，这种事她可能会斟酌一二。

八个样板戏虽都有相当艺术质量，但它终究是“文革”产生的文化怪胎和政治斗争工具，不少人不幸死在样板戏之手，绝非夸张。

蒙古国政治转型记

● 思源

蒙古人民共和国自1990年举行首次民主选举到2008年7月1日的政治危机爆发之前,一直被视为是从共产主义制度转型为宪政民主制度的中亚国家中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其每次政权更迭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以至于被许多专家奉为“民主发展中一个堪称光辉胜利的典范”(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莫里斯·罗萨比接受《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所说),所以,蒙古国社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外蒙古1924年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后的国名。194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获得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基于民族自决原则的承认。期间蒙古人民革命党一直是蒙古国的唯一执政党。苏联时期,蒙古国事实上是苏联的卫星国,从经济到政治,都是仿效苏联的体制。1992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蒙古国,并更改国旗、国徽,实行多党制,实现了从专政制度向宪政民主的历史性转变。

一 民主社会主义的尝试

第一次进入乌兰巴托,闯入这片神秘地域的少数外国人之一的英国记者贝克(Jasper Becker)在《遗失的国度:发现蒙古》一书中告诉人们:1989年5月,第一次进入乌兰巴托,“街上什么都买不着,甚至一份报纸都找不到。市场、私人商店、饭馆,什么都没有。……最奇怪的是,没有丝毫唤起过去的东西。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踪影全无。即便在官方的历史博物馆里,那些装满展品和地图的屋子,也没有任何提及他的地方。一幅巨大的海报、血红色的列宁像,耸立在市中心,下面是他的标语:‘党是我们的灵魂’……不远处还有斯大林的雕像,世界上这样的雕像已为数不多了。似乎从斯大林逝世起,蒙古的时间就停止了,

这个城市仍在深深地默哀。”

1986年5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十九大”通过第八个五年计划,首次提出要进行经济改革。

1988年底蒙古人民革命党五中全会主张要对政治经济体制实行全面改革。

1990年变革的动力和意识来自于周边的国家和原社会主义阵营改革的影响,引起了蒙古执政党人民革命党的思想变化。在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转化为社会党的大潮中,蒙古人民革命党也转向社会党国际。社会党国际是恩格斯领导创立的第二国际的继承者,它到21世纪已经拥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168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与执政,是当今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蒙古人民革命党转向社会党国际之后,遵循社会党国际的共同纲领——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多元化与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权力垄断和阶级专政,要求对国有制进行限制并实行民主控制。这是蒙古国成功实现政治转型,由一党制转向多党制的关键。

1990年3月和4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先后召开八中全会和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深化改革”,党的主要任务是“向前看、坚决深化改革新党”。彻底改组了领导班子,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和巴特蒙赫分别被开除出党和留党察看;通过了新党纲党章,确定了建设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放弃了宪法规定的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同意实行多党制;主张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行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强调蒙苏特殊关系,重视发展对中国的关系,宣布奉行不结盟政策。

党的特别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我国建立一种把现代民主模式与我国

特点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有人认为改革社会就是搞资本主义,这是误解,我们要建立真正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新任党主席贡·奥其尔巴特说:“巩固民主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多元化,要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生活和人权关系的各个领域推行多元化”,“多元化是我们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特征”,“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党纲指出,党的崇高目标是:保卫蒙古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保证每个公民自由发展、幸福生活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

关于党的性质,新党纲说: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体现和捍卫蒙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卫和巩固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为在蒙古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政治组织。党与国内其他政党的关系是:在宪法和共同遵守的其他法律范围内,在民主原则基础上进行活动。通过获得群众信任,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占多数席位的途径为成为执政党而进行政治斗争。蒙古将实行多党制,蒙党将努力保持住执政党地位。

1990年公布的政党法草案明确规定:建立政党,但禁止建立以破坏国家主权和独立、破坏民族团结、非法篡夺国家权力、聚众闹事、搞种族歧视、杀戮、反对祖国和人民利益以及破坏其他国家主权和独立为目的的政党。政党法规定了严格的政党申请登记手续,政党建立后要向国家最高法院申请备案,最高法院予以登记备案后即享受法人资格。各政党必须遵守蒙古宪法和其他法律,公开从事符合祖国人民利益的活动。

1990年5月16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最高法院重新注册。

1990年7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蒙古历史上首次自由选举中获胜。

1990年9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彭·奥其尔巴特当选为蒙古第一任总统。

1990年蒙古发生政治体制重大改革之后,并没有像前苏联其他国家一样发生政权变动,长期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依然通过选举长期执政,只是中断过一小段时间。1996年至200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失去执政地位为时4年。

1996年蒙古国会大选引起的政治变化毕竟是翻天覆地的转型大事。一党连续执政长达70

多年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首次在选举中败北,失去政权,建党才数年的民主党联盟却一举夺得国会76个席位中的50席,组建了民主党联合政府。

乌兰巴托广场中央依然是1920年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苏赫巴特英雄雕像,胯下的骏马奋起前蹄,在滚滚风沙中展望民族的独立。和东欧一样,蒙古经济也经历过“休克疗法”。中心广场西南角的一幢粉色大楼,见证过一些关键情节。这栋俄罗斯古典风格的建筑,曾经的电影院,现在已经是蒙古股票交易所。

1997年6月4日至6日,笔者曾以旅游者的身份访问蒙古,有幸会见了蒙古政治转型历史的五位参与者,当面聆听了他们的诉说。下面根据当时的笔记,对这些谈话略作介绍。

国际共和研究所(IRI)蒙古办事处主任说:

我从1990年开始就参加民主改革,我曾任《新明镜报》的总编。从1993年以后,主要做与国际共和研究所联络的工作。我虽然名义上还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我主要在国际共和研究所工作。

在1990年,我国刚开始搞民主运动时,国会76个席位中,民主党只有6席,而现在民主党取得多数,主要是由于选民觉悟提高了。

在1990年,民主运动初起之时,执政的仍然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当时我们民主党提出把牲畜私有化,取得了牧民的支持,这是我们后来在1996年大选中获胜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是人权问题,过去人民很不自由,现在觉得自由,人权得到改善,故支持民主党。

在私有化原则上分歧不大,但人民革命党与民主党在执行中有区别,我们主张在2000年以前将在国家手上的80%以上的国有资产私有化。

我们的历次选举,使选民逐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去年议会选举前后,国际共和研究所做的日常工作是:举办演讲会(从国外邀请教授),大约每月1~2人,主要内容是政治,有的涉及国会选举;有的涉及国防、政党等,经济和法律讲座则由其他系统组织。

蒙古社会民主党偏左,着重发展社会经济;蒙古民族民主党偏右,着重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偏于保守。两党目前目标一致。也有人提

出两党合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现在也在改革,使其不再那么像左派党。

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说:

1990年、1992年两次选举民主党失败的原因是准备工作不足,在牧民中只得到20%的选票。在1996年选举中,我们努力使选民了解我们的目的。

全国分为76个选区,每个选区有几个候选人竞选。本人在胡不苏古省4个选区中的一个,与我竞选的有3人:一人是人民革命党党员(过去的劳动部长),另一人是资本党党员,第三位是无党派自由报名;我得到选票58%,人民革命党党员得36%左右。

我是由基层提名为候选人的,那儿并不是我的家乡。

我的主要口号是:要把农村牧区经济搞上去,要首先发展牧区。我们在1990年搞了牧畜私有化,与此相应还有贷款政策,我的纲领是在市场化中发展牧业。

在竞选之前,我的专业是理论物理学,大学毕业后在胡省当中学老师三年,1988年民主化时,我是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自那以后就一直搞政治。

1997年国家总统竞选中民主党失利的主要原因是:

1. 1996年大选以后,有很多在行政机构中的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虽然下台了,但他们在当地还有影响,故在选举中占优势。

2. 民主党工作人员年轻,没有经验。

3. 我们民主党执政后提高了电力价格,但人民大多不理解,故在总统选举中投了民主党的反对票。

4. 最主要的原因是,选民为了平衡、制衡,让政府与总统分属于民主党和人民革命党两党。

蒙古选举委员会主席说:

选举包括总统、国会及地方选举工作,都归选举委员会管,我们15个工作人员,是一个独立机构。已领导了6次选举。

1992年 大呼拉尔(议会)选举

1993年 总统选举

1994年 地方政府选举

1996年 大呼拉尔选举

1997年 地方行政选举

1997年 总统选举

我们15个工作人员都是无党派人员,我在改革前是一个市长,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苏共中央党校毕业。

蒙古社会民主党总书记说:

1990年建党,蒙古的政治改革与苏联、东欧的新思维有关系。主要的国外因素是德国柏林墙倒塌,苏联、俄国的改革对我们也有影响,我们建党之初,人民革命党对我们有些间接(通过媒体)的压力,但没有直接压力,更没有暴力镇压。

从1990年到1992年,是蒙古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时期。1992年新宪法结束了这个过程,从1992年到如今,是我们的政治过渡时期。1996年证实我们的民主力量能战胜原先单独执政70多年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而取得政权。不久前举行的总统选举产生了新的总统。政治过渡时期告一段落。

现在我们国会里76个席位中,社会民主党占15票,民族民主党35票,总理由民族民主党人出任,9名部长,我们3名,他们6名,这两党联盟取胜,两党建立联盟这一决策是取胜的关键。人民革命党还有25票,他们得票少,是人民不喜欢让他们继续执政下去,主要是经济问题:私有化问题、贷款问题、腐败问题。

1997年总统选举中我们失利,主要原因是:

1. 新政府某些经济政策未得到人民的理解。

2. 人民群众希望高层有个平衡,政府由民主党组阁,总统则由人民革命党人出任。

3. 经济问题的存在,人民归咎于原总统(民主党人)。

我们的认识是:

1. 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改革的成果还需要时间。

2. 新政府新官员年轻,经验不足。

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大都是中年人,党主席34岁,平均年龄35岁,少数党员也有年龄大的。

我们有《政府工作人员法》,新党共有党员5万多名,议会有99人(每季度开一次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共50~60人,机关报《乌格》报社5~6人。

下一步工作,最首要的问题是巩固我们的基

层党支部,巩固本党,发展党员。

本党经费 30%由国家预算拨款,其他有些创业收入微不足道,各界捐款占 50%。社会民主党的财产与共产党差不多,但共产党占用了用国家财政的钱建设的一栋大楼,除此之外,两党差不多。

国会常设国家制度委员会主任说:

我们国会有五个常设委员会,我是其中一个常设委员会即国家制度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也是国会议员。

国会中除国家制度委员会外,还有财政经济、社会政策、法律法规、牧区与环保等四个常设委员会。

在国家制度委员会中,有 44 个特别小组,包括法律(与国家制度有关的,如《国防法》)签审、突发事件等小组。

国家制度委员会有 35 个议员(有的议员可以担任两个委员会的委员)。最小的是环保与牧区委员会,是 20 人。最大的是财政经济委员会,有 39 人。非某个委员会委员的议员可以参加该委员会会议,并有发言权、提案权,但无表决权。议员当选后,可以自愿辞职或因刑事案而罢免。

二 在民主运行轨道上的逐步磨合

关于修宪争端

1999 年 12 月 24 日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通过宪法修正案,主要内容是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政党单独或联合组阁时“可自行向国家大呼拉尔提出总理人选”等,并规定该修正案自 2000 年 7 月 15 日起生效。同日,新民主社会党、民主复兴党等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抗议。

1999 年 12 月 31 日时任总统的巴嘎班迪否决了该宪法修正案。

2000 年 1 月 6 日国家大呼拉尔驳回总统的否决。

2000 年 2 月 28 至 3 月 2 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二十三大”,选举产生了 244 名成员组成的党的代表会议和 15 人组成的党的领导委员会(相当于政治局)和由 11 人组成的党的监督总委员会。主席为那木达尔·恩赫巴亚尔,总书记勒·额奈比希,书记乌·恩赫图布辛·鲁·阿玛尔萨那。

2000 年 3 月 15 日宪法法院裁决宪法修正案违反宪法,决定予以否决。

2000 年 11 月 29 日宪法法院召开全体会议,对宪法修正案作出最终裁定——废除宪法修正案。

2000 年 12 月 14 日议会召开全体会议,以全票通过宪法修正案。

2000 年 12 月 20 日巴嘎班迪总统再次否决了 14 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2001 年 5 月 28 日巴嘎班迪总统最后同意修宪,并在修改后的宪法修正案上加盖国玺,至此,自 1999 年以来的修宪争端终于宣告结束。

关于人民革命党倒阁事件

2004 年 6 月底蒙古公民意志—共和党(CWP)加入由三个主要民主政党组成的民主力量联盟,并成功地参加了议会选举。该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至少 36 个席位。

2004 年 7 月举行的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换届选举中,蒙古人民革命党只获得了大呼拉尔 76 个席位中的 36 席,而根据蒙古相关法律,在大呼拉尔的席位未超过半数的政党不能单独组阁。同时,由民主党等反对党组成的“祖国—民主”联盟则获得了 36 个席位(“祖国—民主”联盟由民主党、祖国—民主新社会党和公民意志—共和党组成)。人民革命党和“祖国—民主”联盟围绕组建联合政府问题,最终于当年 8 月中旬达成协议。根据协议,18 名内阁成员,包括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双方各占一半,大呼拉尔主席(议长)、总理职务由双方轮流各任两年。

2004 年 8 月 20 日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任命“祖国—民主”联盟提名的民主党人额勒贝格道尔吉为蒙古国总理,9 月 28 日才最终成立了新一届政府。

然而反对派联盟执政不久就开始发生分裂,蒙古人民革命党再度在议会中宣称多数。民主联盟解体后,民主党成了民主联盟的代言人,实际上形成了人民革命党与民主党两党联合执政的政治格局。但是,一年后的实践表明,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民主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合作并不顺畅,共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积极性也相当脆弱。两党勉强维持合作,导致政府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2005 年蒙古总统大选,蒙古人民革命党主

席、前总理恩赫巴亚尔当选总统。

2006年1月1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10位内阁成员以对现政府工作不满为由宣布辞职。此举无疑等于宣告,由蒙古人民革命党和“祖国—民主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已经走到了尽头。

蒙古政坛突发的这场危机是由在内阁拥有多数席位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制造的。人民革命党在11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由于现政府已丧失了行使权力的能力,联合政府确立的既定方针无法实施,人民革命党表示,作为在议会中议席最多的政党,有责任与其他政党合作,组成新政府,改变目前政府工作的被动局面。

然而,人民革命党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却对这种“突然弹劾政府的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民主党认为,人民革命党弹劾政府没有充分的理由。人民革命党突然发力,冲垮内阁,显然是为了罢免政府,重新组阁,掌控政局。

蒙古内阁共有18名成员,根据相关法律,政府半数成员同时辞职,就等于政府集体辞职,政府将随之被议会解散。蒙古实行设有总统的议会制,政府由议会任命。政府即将坍塌的消息过于突然,让各派政治力量措手不及。一时间,各政党纷纷召开紧急大会,各大媒体不断发布消息,各界知名人士喊话呼吁,全国上下骤然弥漫起紧张不安的气氛。

2006年1月12日蒙古议会开始对政府辞呈进行讨论。议会成员共有76名,参加这次会议投票的39名议员刚好超过半数,他们全部投票同意政府的辞呈。然而,与此同时,一些民众却在街道上表达他们的另一种态度。首都乌兰巴托近3000人在象征着国家政治中心的国家宫前举行集会,集会者试图冲进国家宫,但被警方的人墙挡住。集会者随后冲进人民革命党党部大楼,并砸坏了一些门窗。

2006年1月13日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正式宣布,本届蒙古政府解散。这是议会两天激烈辩论后通过的决议。蒙古历史上首个短命的联合政府只维持了1年零3个月。

2007年12月6日蒙古国三政党组建新一届政府,前总理担任了副总理。自2006年初以来的政府危机暂时告一段落。

2008年选举事件

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反对党一直在伺机反攻,他们把2008年的大选视为重新执政的机会。

2008年7月1日因选举问题引发蒙古有史以来最大的骚乱,导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党部大楼被抗议者焚烧。

6月3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奥特根巴亚尔召开新闻发布会,预测该党在此次国家大呼拉尔选举中至少可获得40个以上的席位,获胜或成定局。当天下午,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现任总理桑吉·巴亚尔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前表示:感谢本党党员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如果选举结果真的如此,则该党根据有关法律将有单独组阁权。

7月1日反对派联盟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单方面匆匆忙忙提前宣布选举获胜的结果表示不满,宣称选举中有舞弊行为,组织起数千名抗议者在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示威游行,称选举被操纵,要求重选。示威者冲入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总部,并放火焚烧建筑物,向警察投掷石块。许多失业者及年轻人参与了这次蒙古历史上最严重的暴力事件。报道称,大多数骚乱的煽动者当时酒气熏天。极具代表性的破坏行动是蒙古执政党总部大楼遭人纵火,烧了一夜。警方则动用橡皮子弹、催泪弹和高压水龙来驱散示威者,并逮捕了700余人。时隔不久,释放了其中378人。

抗议活动随后演变为暴力事件和严重骚乱,共造成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恩赫巴亚尔总统随即宣布在乌兰巴托实行为期4天的“紧急状态”。这个只有200多万人口的中亚小国,历史上首次实行“紧急状态”。

蒙古媒体当天的报道说,民主党对一些选区的选举结果有异议,但将通过法律途径向蒙古总选举委员会递交有关在一些选区进行重新计票的申请。

7月2日乌兰巴托的骚乱渐趋平息,当日晚间,蒙古国总选举委员会宣布,据初步统计结果,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本次议会选举中获得了76个议席中的44席,战胜了获得27席的民主党,获得了此次议会选举的胜利和单独组阁权。

7月4日恩赫巴亚尔总统组织议会各政党主席进行协商,包括参与组织示威活动的民主党在内的各政党全都表示要保持团结,依法处理骚乱事件。议会各政党认为,应在保持社会安

定的基础上追究骚乱制造者、特别是致人死亡者的责任。

7月6日随着局势的基本平静,恩赫巴亚尔总统通过国家公众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首都乌兰巴托6日零时起解除“紧急状态”。

7月10日民主党就骚乱事件向议会提交弹劾政府案,称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政府在骚乱事件中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民主派的奥阳格日尔认为,蒙古总理这次没有倾听民声,没有和他们协商。认为暴力事件的责任应该主要由蒙古总理来承担,他是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席,事件发生后,他没有听取人民的要求和意见,这让人民更加愤怒。

2008年7月14日蒙古国总选举委员会在国家宫正式宣布,6月29日举行的国家大呼拉尔换届选举中,蒙古人民革命党获76个席位中的39席,民主党获25席,公民意志—共和党获1席,独立候选人获1席,其余10个席位因3个选区存在争议而将重新计票。

从当时计票结果看,蒙古人民革命党所得议席数超过76个议席的半数。因此,人民革命党已获本届议会选举的胜利。自7月1日因有关政党对选举结果争议而引发严重暴力事件以来,各政党经反复协商还是较快地对选举结果达成了一致。

从这次政治动荡在短期内迅速获得解决可以看出,蒙古政治转型以来,各派政治力量的民主素养有很大提高,宪政意识比较普及,非暴力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国家政治生活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很有希望。

对于社会转型过程和这次暴力事件的得失,蒙古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议会女候选人奥阳格日尔认为:“我们举行了很多次选举,许多政党建立起来,相互联合。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民主党最终成为蒙古的两大主要政党。以前,民主党和其他党组成联盟参与议会选举,而这一次,我们自己干。而蒙古人民革命党自1921年成立开始就参加了所有的选举。”

至于收获,她认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许多言论自由、个人自由、政治权利、学术自由。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然,要在所有分歧上

达成一致,需要时间,需要长时间的讨论。人民有权利知道一切,包括政治、经济事务。譬如有关国家矿产利益的问题,人民有权利和政府来探讨,达成一个共识。”

蒙古国的经济发展

自2006年1月蒙古国“国家团结政府”接替2004年议会选举成立的“联合政府”后,蒙古国在畜牧、矿产、旅游等领域发展较快。

2006年蒙古国经济增长达8.4%,人均GDP首超1000美元。

2007年蒙古国经济增长率为9.9%,人均GDP达到1470美元,外汇储备从1992年的460万美元增长到近10亿美元,蒙古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35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蒙古国经济开始进入较为稳定的增长时期。

激进改革模式对经济绩效虽然具有短期负面影响,但其“宪政转型”的长期正面效应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

2009年总统选举

蒙古国2009年5月24日举行总统选举。之前外界曾担心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会相当接近,若无法决出谁负,可能会引发暴乱,但选举结果化解了一场危机。现任总统恩赫巴亚尔25日承认落败,曾两度出任蒙古总理的民主党候选人额勒贝格道尔吉当选成为新总统。

2009年5月25日,蒙古国家选举总委员会宣布,蒙古民主党提名候选人、国家大呼拉尔委员(议员)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在24日的总统选举中以51.24%的得票率获胜。得票比恩赫巴亚尔高3.5万票。据蒙古国家选举总委员会公布数据,本次总统选举投票率为73%。

恩赫巴亚尔所属的人民革命党已宣布他落败,并承认选举公正。

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1963年生于科布多省,1988年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军事学院军事记者专业,2002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额勒贝格道尔吉曾三次当选议员,两次担任蒙古国总理。2006年额勒贝格道尔吉担任蒙古民主党主席,2008年辞去该党主席职务。

额勒贝格道尔吉在竞选中呼吁反贪污,承诺为国家带来变革。他的主要选民基础是城市居民,尤其是占全国选民总数逾半的乌兰巴托市

就国企问题答读者来信

● 何 伟

霍拥军先生对我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上发表的《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一文提出四点质疑(见《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我想类似霍拥军先生这一想法的绝不只他一人,故我在这里予以回答。

一,关于垄断行业高工资问题。来信对我文中讲到“垄断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而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的数据准确性有疑问。我就这个数字咨询过政府主管人士,他称“差不多”。而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当年全国职工工资的总额,最新数字已达60%。(见《民营经济内参》2010年8月6日)垄断行业的高薪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2007年薪酬高达6600多万元,2004年至2007年马明哲的税前报酬分别为1170.4万元、1413.5万元、2351万元、6616.1万元(其中有2000万元捐献给宋庆龄基金会)。(见《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2月16日)200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董事长高国富年薪为295.21万元,中国人寿保险董事长杨超年薪为199万元(见《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2月16日),某商业银行董事长年薪228.5万元(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4月12日),中国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税后年薪为267.83万元,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为191.61万元,深圳发展银行的洋行长韦杰夫年薪130万元(见《中国青年报》2006年4月13日)。广州某电力集团普通员工的工资加年终奖、公积金、福利和补贴,全年收入竟高达15万元。在深圳,某证券公司一个普通司机年收入12万

元。电力行业2008年全行业亏损,但员工年均工资为4.6万元。垄断行业高报酬拉大了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最高者与最低者相差10倍以上。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看门的也拿不少。”(见《中国流通经济》2006年第7期第12页)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在2007年5月公开表示,中石油将不改造、不新建办公楼,不买小汽车,以节省成本。然而2009年爆出太阳星城事件,中石油以超低价给员工购房,一时舆论哗然。(见《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3期第39页)如果央企“员工的收入并不高”、待遇不那么优厚,社会上意见不会这么大,国资委也不会出面限制这些行业高管人员的收入和职工的工资。垄断行业的工资也不是均等,你的工资不高,原因不得而知。

二,关于石油低价出口问题。来信说:石油出口价低是因来料加工,因而出口价低。国内销售价高,是因包括了各种销售费用。由于来料加工而出口价低,可查一下进出口石油之比,出口大于进口,多余部分不应属于来料加工,为什么也低价出口呢?国内销售价高。就按发改委最近披露,以93号汽油为例,消费者每升油支付6.19元,其中有1元是消费税,另1元为增值税、城建教育附加费等,税负占油价35%至38%,甚至上调40%,扣除销售费用,出口成品油价格仍然低于国内成品油价10%左右(见《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3期第39页)。“国外股东”会监管出口价格不应低于国际市场油价,至于国内高价出售、获得垄断利润,他何乐而不为。外资看好的是“国”

民。他在外交政策的立场上,对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较为开放。

2009年10月29日由人民革命党提名苏赫巴托尔·巴特巴勒德取代因健康原因辞职的桑吉·巴亚尔出任政府总理。

蒙古国现今的政治态势已经形成为:民主党与人民革命党两党既竞争又合作,分别执掌总统与总理职务的局面。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字头这顶红帽子,能获取垄断利润,一般企业是做不到的。石油垄断国内油价的涨快跌慢,人们早有怨声,形容是“涨若放箭,跌若拉纤”,民众意见很大。

三,来信认为国企享受国家投资优先权是“十分正常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企业应当机遇均等,一视同仁,否则就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破坏了平等竞争。国家投资是拿全国人民的纳税钱,国企为什么有特权先获得?国家的投资应从国家全局出发,应按行业来投资,不应按国企、民企来投资,优先投向国企是对民企的一种歧视,这样做是不公平、不平等的。何况今日国企已非昔日国企,“80%的央企已经成为上市公司”(见《民营经济内参》2010年8月6日),又如你来信所说:国企“还要接受国外股东的监督”,那么,这样的“国企”还有理由享受国家投资的优先权吗?

四,关于劳动生产率问题。来信认为不应拿中石油人均利润1万美元和埃克森美孚人均利润50万美元来对比,因目前中国劳动力大量富裕,“应该将企业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之一,而不应该再去一味追求人均盈利”。

首先,中国劳动力多是短期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否应成为我国一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国外同类行业的一个理由?

其次,石油行业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而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行业,还是国外上市的公司,在国内还获得垄断利润和许多特权,不能用中国劳动力富裕,来原谅它的劳动生产率低。

最后,以就业率对比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国企也没有民企贡献大。根据今年全国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披露:2009年“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5.3%,国有企业同比增长0.8%”。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到2007年在非公有制就业人员高达75.7%,全国四分之三就业人员在非公单位。(见《民营经济内参》2008年11月14日)可见民企的贡献大大高于国企。

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不应原谅国企效率低、贡献小的现实。

读者来信最后讲:“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脊梁的作用”,“国企还是国家处于危难时机时最可靠的经济保证”。我想四五十岁以

上的人都还会记得,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使我国走入“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时,国企的“保证”作用哪里去了?在这“危难时机”,不是国企——它是改革对象,而是民企拯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免蹈前苏联的覆辙,支撑了我国经济半壁河山,这才有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可见,只有国企和民企相结合,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才能“发挥了脊梁的作用”。

以上答复只是一管之见,仅供参考。

另有读者问及垄断国企职工人数,《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一文中提到:“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其中2833万人应为833万人。

何 伟

2010年8月

书屋 2010年第11期目录

学界新论	中华复兴的目标和进路 ——兼论中西文明的不同瓶颈及其突破	张远山
	反思启蒙:中国呼唤“逆先生”	李茗公
灯下随笔	一个个都是生命 ——重读百年战争观	顾 土
	间谍:让人感慨万千的名词	哈 米
口述历史	医学院的灵魂之旅	张大庆 彭瑞麟
	王国潼访谈录	崔裕康
人物春秋	李银河:一只只有教养的“牛”	韩志柏
	旧交心为绝弦哀——记杨公强先生	杨德豫
	熊希龄出生年考辨 ——谨以此文纪念熊希龄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周秋光
思史佚篇	1929:乱世夜空的那弯新月 ——八十年前的一场人权讨论风波	王士俊
	念兹痛史断人肠 ——冤死的烈士与夏曦	李 乔
	梦魇般的十年 ——陈漱渝学术自传《苦舟》中的一章	陈漱渝
	吴起杀妻案剖析	王 明
书屋品茗	何处是江南? ——对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历史反思	徐 鹏
	美的江山,美的书写 ——读刘刚、李冬君的《文化的江山》	胡松涛
	闲话《祝福》	顾 农
说长论短	全民皆X ——一个外星人的地球 J 国价值生态考察记	金 岱 袁传旭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老人出书
历史见证

两千元起编辑出版：回忆录、自传、个人文集！

-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家族先贤传、家史档案。
 - 4、家史传记：家族百年史、家族大事记、家族老照片、家谱族谱等。

基本价格：

“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一般32开本，“家史传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内文黑白胶印，胶装或线装。二百页出版50本两千至三千元。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家族出书
文化传承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家史传记、家谱族谱！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 相关说明：**
- 1、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办理出版书号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另行安排。
 - 2、出版附赠光盘，需要整理文稿、专题创作或录音摄像的另行协商。
 - 3、北京客户上门服务，外地客户来电咨询赠送样书。

服务热线：010—6892 0114 6252 5116

展示接待：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西大街64号、海淀图书城文化步行街雪芹书画社2楼大厅 邮编100080

编辑接待：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5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博越商务楼6106室 邮编100089

出书单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长途免费电话
400 633 2311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作品展示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业务范围：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出版：音乐出版、戏曲出版、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香港出版社出版，有正规版权页条形码与标价，但不能在国内主渠道等发行销售。
- C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三千元，300页出版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4千元，300页出版100本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较（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月编辑合作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传真：010-58608409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chubanfaxing.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10年第**11**期

吴象：朱厚泽和他的“三宽”

吴南生：特区应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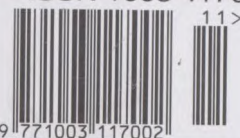
四渡赤水评价考

我向中央告省委

李慎之：对右派审改结论的意见

朱良：周总理与1973年廖承志访日团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